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11年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的蔡定剑

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

目 录

春秋笔

- 1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沈志华
9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 韩 钢

往事录

- 17 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王海光
24 北京郊区友好公社对外交往琐事 陈徒手
32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李海文
39 日本侵华时的间谍活动 孟 悦

一家言

- 42 “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 张绪山

怀人篇

- 46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的蔡定剑 李 蒙
51 胡耀邦与裴昌会信义相交 胡德平
53 杨士杰人生的两件大事 杨荣甲
58 国际问题评论员蒋元椿 钱 江

亲历记

- 62 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杨继绳
65 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周仰颐

品书斋

- 68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周瑞金
70 《大秦帝国》的“反动性”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人物志

- 74 陈丕显、曹荻秋反对大串联 金大陆
79 王夫和地道战 王端阳
81 张作霖与溥仪交往秘闻 康艳华

故纸堆

- 86 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孙冶方

古今谈

- 89 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 洪振快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执 行 主 编: 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昊霖必固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68525374 办公室: 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8.00元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 沈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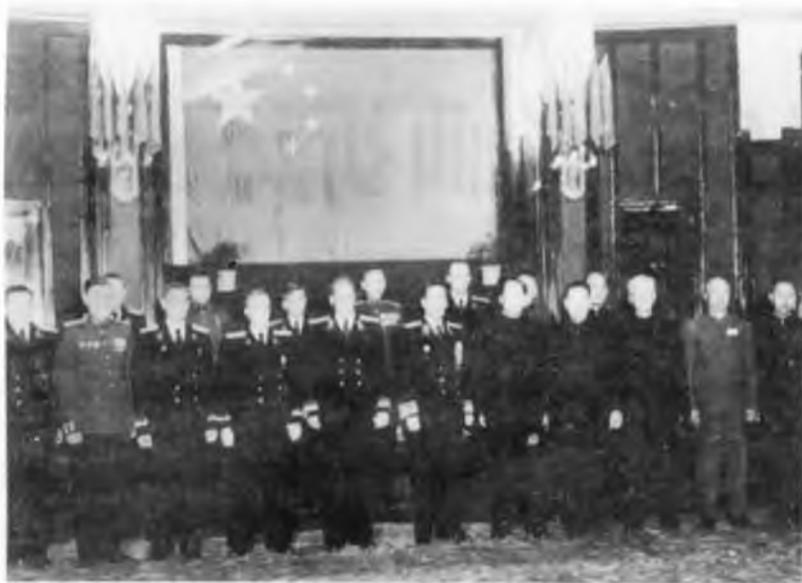
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F.Roosevelt)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项“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Service)见面，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

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当时，另一篇美国专家福尔曼(H.Forman)发自中国的报告还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A.Lincoln)在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Stilwell)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跟着，11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5日，苏联任命罗申为驻中国第一任大使。图为罗申向毛泽东呈递国书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聂荣臻等同罗申及苏联使馆人员合影。

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

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

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

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

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

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G. Marshall)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给杜鲁门(H. Truman)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

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

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晓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然而，莫斯科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 and 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A.Zhdanov)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J. Tito)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

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

中共的目标却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没料想，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国民党要求美、英、法和苏四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愿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让中共表明态度：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万没想到苏联会如此盘算。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泽东于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并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污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

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这表明苏共此时

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Stuart)，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在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就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尽量表现出对斯大林的顺从和依赖，但是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却不敢掉以轻心。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政府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做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予全盘否定，并很

快提交了中方重新起草的完全对立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联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送行。

总体地位”。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刚刚确定的对华新政策。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出让步。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

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重要的措施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在4月10-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斯大林1月30日突然做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可以认为，中共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

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这是毛泽东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一再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就是这个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做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有注释，见《炎黄春秋》网站）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

○ 韩 钢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

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

部长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但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也是指斥华国锋的错误之一。“跃进”自1980年代以后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从目前的解释看，有“宽”“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洋跃进”，指197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经济高速增长。狭义的“洋跃进”，指超出国力承受边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引进。由于批评者将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跃进”，又因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过的对外引进的因素，故称之为“洋跃进”。对“洋跃进”，政学两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以至于

对这个说法都有争议。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前提是弄清事实。因为事情本身比较复杂，这里只讨论最高层关于引进的决策层面的事实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页。）

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很肯定150亿美元的引进计划，认为没有什么危险。邓甚至提出，再过两三年，也许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邓的意见。华国锋也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55~62页。）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的谈话（1978年2月9日）。）按照华的

主张,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第279页。)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第298页。)与邓小平一样,华国锋也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3页。)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

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

大概是受邓小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国锋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日。))几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嫌原计划过于保守:“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从60亿到180亿,现在要搞到500亿美元。花一点钱。这是一个大决策,原计划是保守了。”(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同华、邓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叶说:引进技术,重点在欧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要吃饱,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观条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李先念说: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光进口,国内机械工业不提高不行吧?!(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日。))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做了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

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华国锋听取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初步设想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7月11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38~139页。）有材料显示，邓小平也有把引进规模扩大到800亿美元的考虑。（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尚不清楚的是，邓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想法，这是他自己的考虑还是对计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则仍然对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些担心。8月3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各部门汇报后，李先念谈了一些意见：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黄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李先念听取各部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8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40页。）虽然叶剑英、李先念都有些隐忧，高层最终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最近中央决定，引进工作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

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高指标，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这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国锋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这需要凭史料来回答。由于文献档案公布甚少，笔者只能根据所见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

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等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75年9月26日）。）1977年初，项南（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

前述华国锋在引进问题上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已经含有打破自我封闭的意义。在他看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很快搞上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好的经验，非常重要。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华国锋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引进成套设备计划汇报的谈话（1978年3月1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比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段云率领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华国锋听取林乎加、段云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一代领袖”向参加集会的群众招手致意，这是首次亮相。

汇报后的谈话（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页。）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在华国锋、邓小平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掀起中国当代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后，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凸显。对华国锋来说，改革的动因更可能是来自于中外现状的比较。华认为：“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但是国人尤其是干部却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有个思想束缚”，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点”。（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日）。）

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

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醒“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 1380 万吨，正常库存有 600 多万吨就够了，多了 700 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 年 6 月 30 日））注意价值法则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多少显露出后来经济改革的纵深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主张有某种前瞻性。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 年 6 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 年 6 月 3 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 119 页。）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

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对外关系不是华国锋熟悉的工作领域，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风格。特别是他很注意在对外交往中，考察外国的情况和经验，以为中国的借鉴，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

1977 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 1958 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时任中联部八局局长的朱良回忆，虽然 1975 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飏、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这年 8 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 年 3 月，中共高层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 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

8 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 1957 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

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

包容和宽厚的主持者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

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和多面的。这里不多作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参见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

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50页；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43~44、50页；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第14页。）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参见白相国、张植臣、丁铁石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时的发言（1980年11月9日、5日），《中央国家机关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的简报》总256、

1957 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 王海光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 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 1957 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

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源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 8、9 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

214 号。) 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 年 4 月、12 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 1981 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参见金凤：《血写的嘱托》，金凤、丁东编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年，第 242~246 页；《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 175~197 页。)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上册，1988 年，内部印行，第 247 页。) 这项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根本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 年的“打击政治谣言”，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1. 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其他地区的意见，也是大同小异。山东、安

徽、江西等地，虽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并无二致。再具体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虽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体感受不一样，结论却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如安徽一个农业厂的技术员汪朝元总结说：“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江西等地的民众说：“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吃青菜，还要劳动。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耕田（农民）马吃谷（干部）。”（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29页。）这种牛耕马谷的言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流传。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 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 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子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 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颡同黄鳝赛拉的呢？”

(3) 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

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 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

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 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

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泽东批小脚女人,掀起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论,直接批评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如山东的“右派言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

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

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 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

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交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 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 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

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2. 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 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

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北京郊区友好公社对外交往琐事

○ 陈徒手

一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初，依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等惯例，北京先后在郊区建立了 11 个人民友好公社，各自承担与 11 个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民间外事任务。各友好人民公社自从命名以来，每逢春节都会与相关国家使馆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赠礼活动。尤其在 1960 年春节正逢经济困难，为了加强对外宣传人民公社的意义，中方有意安排各友好公社主动邀请有关使馆到公社过节，并送了一些公社生产的鸡、鸭、鱼、鲜菜等礼品。没想到，各使馆大都以大使（或代办）为首，率领全体使馆人员参加。国务院外办对此举评价甚高，刻意在事后报告中加以提携：“整个活动气氛融洽热闹，反映良好。”

随着中苏两党争执的加深，所在地区不同、关系深浅不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在面向中苏两大党的困窘境遇中，表现了程度不同的摇摆和略显差别的偏向。1961 年后，在复杂微妙、不容差错的外交格局中，北京友好人民公社必须完成的对外交往就显得如履薄冰。与苏、东欧使馆的交往性质必然从热闹逐渐发展到扭曲，直至“文革”爆发，这种双方都无法忍受的来往总算告一段落。

二

1961 年春节正赶上莫斯科会议结束不久，中苏关系稍有缓和，中方决意再主动进行一些友好团结工作，让北京现有的九个友好公社仿照去年再邀相关使馆去公社过年。北京市外办 1961 年 1 月 28 日为此向国务院外办呈送上一份《关于北京市各友好公社今年春节对外活动的意

见》，内中称：“通过此次活动，以公社具体事例，进一步说明我党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如对方要求参观可以安排，由于去年农业受灾，副食品有些紧张，吃饭、送礼可比去年简单些。”

公社活动的费用可由市外事经费中报销，但如何掩饰公社的经济困窘确是一个难题（市外事办工作人员时常汇报：村里环境卫生较差、公社外宾休息室的厕所太旧太脏、会场标语横幅所用之布破旧、外宾拍摄穿破衣服的儿童、公社人员到使馆吃饭狼吞虎咽等）。但高层领导更担忧的是，如何把握住中苏两党关系乍寒时暖的适度。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 1 月 30 日用铅笔在市外办的报告上批复道：“同意。请市外办将有关部门、有关公社负责同志早些开会，交代政策，作出妥善安排。既要搞得热烈，又要很好掌握分寸，搞得适当。”

在中方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属于一条心、不必刻意回避的兄弟国家，双方之间顾虑较少，公社干部的心态就很容易放开。从市外办汇报的材料看，2 月 14 日越南大使陈子平率使馆 9 人来公社，事前越南代办就特意叮嘱不要大吃大喝，结果“简易会餐上谈笑风生，显得特别亲切自然”（中越公社干部语）；阿尔巴尼亚大使夫人、代办一行十三人在 2 月 15 日初一上午 11 时到达公社，照例就是双方表演节目、钓鱼、打枪，然后一起包饺子，其间活跃的使馆诗人恰奇一再提出要找时间到公社，专门对爱好文学的社员介绍阿的文化、文学工作，公社干部满心欢喜地答允；大兴中朝友好公社以九个凉菜、两个炒菜和饺子款待朝鲜客人，还放映了《人民公社万岁》的短纪录片，朝鲜代办还贴心地表示：“朝鲜也很穷，也必须苦实干，才能建设好国家。”

此次春节公社过年，来的客人级别最高的为

在京的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2月17日他带来使馆40多人,一下子让公社接待干部措手不及,显得忙乱,以致客人桌上的酒都倒上了,而炒菜还没有上。公社干部称,双方没聊政治性话题,只是说了一些家常话。2月15日保加利亚大使、来访的贸易代表团团长一行7人在公社吃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和饺子,但客人没有参与包饺子,只是参加一个座谈会。跟去的外事干部描述道:“到会的老人们对答得很好,都说‘吃了面,吃了肉,年过得很好’。大使问社员黄子全去年收入如何?黄回答说,收入600多元,加上供给共800多元。”

中德友好公社报来一个账单,供市外办报销:“送使馆鸭子两只、鱼三条、青菜8种20斤,合30元。使馆外宾来公社过节15人,陪同15人,按每人二元计算,合60元。另纸烟15盒,6.3元,茶叶2元,糖果3元,水果8.7元。以上各项合110元。”

从整体来看,此次春节公社过年基本上相安无事,双方有意减少争执的意味。唯独中苏友好公社给苏联使馆送礼时,使馆党委书记、代办苏达利克夫大谈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大力发展农业,开荒地,注意水利建设,养猪业也很发达,现有很多工厂正在为中国赶造机械。苏达利克夫还问公社干部,社员春节供应如何?吃几顿饭?收入如何?政治弦已经绷得很紧的公社干部敷衍答了几句,不敢多言语,就草草而退。

三

1962年春节,又遇上苏共22大闭幕后的复杂局势,中国声援阿尔巴尼亚批判苏联,苏、东欧国家不愿罢休。是否还要援惯例请使馆到公社过节,让外事部门踌躇了许久。最终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给各友好公社订下一个行事准则:“对阿、朝、越,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要搞得热情一些,对其他国家比往年略低一些,不要过分热情,礼到就行了。在接触中,仍应主动宣传三面红旗、公社优越性,防止泄密。有关中、苏、阿关系和反修问题,对阿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可主动表示支持和赞扬,对其他国家不主动谈此问题,如对方提出,对朝、越可多找共同语言,强调友好团结;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要提高警惕,防

止人家钻空子,如遇批评,要坚决顶回去,但不与纠缠。尽量避免接触群众,不主动安排参观访问等活动。”(见1962年1月27日市外事办《关于九个友好人民公社春节活动的请示》)

在市外办草拟的报告中,原是“如遇挑衅坚决顶回去”,国务院外办改为语气稍缓的“如遇批评要坚决顶回去”。外交部苏联司一位陈姓司长给市外办打来电话,说送使馆的过节礼物可降低一点,送些萝卜、白菜就可以了。市外办主任辛毅当即向各友好公社布置,除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三国使馆以外,其他使馆只送鲜菜三四种,不送鸡、鸭、鱼。使馆外交官到公社吃年夜饭时,阿、朝、越使馆可吃4个热菜、2个凉菜和饺子,其他使馆只能吃2个热菜、2个凉菜和饺子。

市外办再三强调,活动要突出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主动进行一些团结友好工作。吃饭时要注意节约,切勿铺张,防止去年备菜多、吃花生米聊天等现象。由于农村供应困难和混乱,辛毅还特别关照一点:使馆外宾去公社的路途中要尽可能避开集市,如实在无法回避,就请公社当日将市场管理安排妥当。

受中苏两党相互较量的影响,各党之间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出现了相当微妙的变化,连原本称“亚洲兄弟党”的朝鲜、越南在政治表态时也略显低调,1962年到公社过节总体就显得暗淡、压抑。2月3日越南使馆只派出了临时代办等5人到公社,首次未谈及政治话题。朝鲜使馆也只来了临时代办,放映朝鲜电影时秩序较乱,群众随意出入,使馆汽车门被小孩拉开也无人及时制止,吃饭时菜也凉了一些。在半年前举行的庆祝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活动时,公社书记赵彪按常态曾向朝鲜人员坦率地谈了学习六十条的情况,事后被上面批评为“不分清内外,随便向外宾介绍内部布置情况”。这次公社干部更是谨慎异常,只能说一番报纸上的用语。

热情无边、表现毫无拘束,只属于阿尔巴尼亚外交官。2月5日大使及夫人、参赞带了34人(其中有儿童17人)上午10时就赶到公社,参观鸡鸭场时送给外宾小朋友十几个鸡、鹅蛋。在席间由于缺少阿语翻译,双方交流不畅,只能用中阿语言合唱两国歌曲。兴奋的大使则信口开河,向公社干部谈了蒙古党中央会议内部意见不统

一、苏联驻缅甸大使压制缅甸群众团体成立缅阿友协等诸多事情，他还借酒劲骂道：“赫鲁晓夫很卑鄙无耻，他不会长久的，他的修正主义一闹，使一些兄弟党闹分裂，损失很大。”公社干部大都静静地听着，不知怎么应和。（见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2月27日《各公社春节活动情况》）

最拘谨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简短的祝酒词也要念稿子，几次出现冷场，他就会给公社干部递上糖和饼干，紧张地找一句话问：“看到报上讲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否和所有制有关系？”生怕给主人刺激，又急忙补充说：“以后有机会再谈。”

有意思的是，匈牙利大使、东德大使都主动谈到自己国家的农业困难，但最后都会不自觉地捎到中国几句。匈牙利大使说：“去年我们国家下半年较早，秋作物不太好，影响畜牧业的发展，有了一些困难。粮食不够，匈牙利国小，可以靠进口解决。中国国大，依靠进口解决有困难。”东德大使说：“我们都是兄弟国家，没有什么不能讲的。我们的农业有困难，有反动分子捣乱，柏林封锁后好转了。农业问题不简单，得一步步解决。你们国家的问题也是农业。”（见1962年2月各友好公社春节活动汇报材料）

四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使馆（尤其是苏联、东欧）在北京的各项活动都受到中方各种名目的限制，与中共和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联络多少都带上程序化和表面化，中方有了较高级别的内部防范、提防的意识，“严防泄密、内外有别”成了涉外工作中再三强调的首要原则。这样就给使馆外交人员与中方接触、了解中方增添很大的困难，在高唱友好团结的主旋律之下众多外交官在一般工作层面上竟会难以展开。

实际上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方就开始有意疏离与外国人的接触，巧妙地不让苏联、东欧的专家、留学生参与所在中方单位的政治学习，不许中方人员向专家、留学生透露学习内容，斩断了使馆了解高层动态、下层生活的耳目关系。同时尽可能限制中方人员与外交人员的来往，连中方基层单位向苏联相关单位发出的十月革命贺电都要由中央外事办审核，有一回事前已

认可但事后又觉得措词不妥，竟要求把几十个贺电连夜从北京市邮局追回。这样制造的紧张局势很自然使基层单位有了“排外”的本能，1962年11月国际电台对社会主义部欲做十月革命对苏广播专题节目，已获市外办同意，但北京有线电厂、第一机床厂等与苏联支援有关的工厂就坚决拒绝电台来人采访。

在友好公社参加对外活动的群众大都事先经过审查，教给一定的表达口径。从外事部门而言，要力求减少外宾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以防群众说话不慎暴露问题。1961年5月8日为庆祝捷克解放16周年，捷克使馆来公社放映《拉弹弓的人》，原订在小礼堂放映，但闻讯赶来的群众过多，临时决定移到大院放映，最后观看的人数多达上千人。就在这倒腾的时间段里，有20多位捷克使馆人员在公社院内休息停留。事后上级马上追查捷克人在此时是否与群众接触，有否发生泄密事故？责问主事者为什么不把外宾立即请到休息室与群众割开？责令公社领导要还原当时场景，一一核查清楚。（见1961年5月中捷友好公社汇报材料）

外国人订阅中方报纸的范围也在不断收缩，理由是“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市委1960年9月14日致中央外事小组请示报告语）。1960年5月5日中央转发中央保密委员会的规定，其中第9条是“地方的、军队的报刊禁止出口”。邮电部党组也随即通知，邮局今后不再办理地方报纸的对外发行。许多报刊、出版社纷纷通告邮局，他们的报刊不订给外国人。截止1960年9月，在京外国人能订阅的报纸只有寥寥可数的12种，杂志29种，报纸中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新华社俄文电讯报》，甚至有一份《广播节目报》。此举首先招到驻京外国记者的严重不满，使馆方面也要求解决限制订阅，纷纷派员前往邮局询问原因，邮局向上频频告急。之后马上出现一个事先未想周全的难题：一些外国人不能订阅的地方党刊如《北京日报》等，一般都在北京市场上公开出售，如果外国人去买，是否同意卖给？

到了1960年10月底，国务院外办也觉得邮电部的规定执行起来确有一定困难，而且“会使我国驻外机构和人员遭到报复并使我们在政治

上处于被动,给人攻击我们的把柄”(见1960年10月28日国务院外办致周恩来、陈毅的报告)。虽然周恩来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驻华机构和人员仍可准许继续订阅地方报纸,但经过此番折腾,驻华使馆阅览和收集中方信息的能力打了折扣,他们与中方联系的渠道变得狭窄和困难起来。

在这样交流阻隔的背景下,能有机会来到友好公社过节,亲身感性认识中国基层单位的真实状态,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使馆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不可多求的机遇。所以使馆外交官员到了公社后就会迫不及待地询问,求解他们所关切的具体问题。连像越南这样被视为“亲兄弟国家”的使馆人员1961年6月3日借到公社劳动机会,在种白薯秧时都会悄声问身旁的公社干部:咱们中央是否有一个12条新政策,这新政策都是些什么?越南人连问三人,不得结果。事后昌平中越友好公社汇报说:“我们根据领导指示,均没有吐露,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听说’,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毕竟人民公社如何运行?是否陷入困境?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多大?对在京外交使团来说还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团,是一个无法捅破的封闭大网。

从公社上报的文字材料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解渴一般的举动:

中德友好公社报告:

2月5日(初一),(东德)大使夫妇、参赞等13人11时至下午2时在公社参加活动。气氛较友好,强调团结,也提反帝斗争,没有挑衅等情况。但也明显看出,他们是有准备、有分工地摸公社的情况。大使、一秘问公社的规模、干部分工、收入是否增加?有的问社员在食堂还是在家里包饺子吃?公社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可以合作。

在外宾追问下说了以下两个数字:一是一个强劳力每年收入400元;二是每个工分值(好队)约一角。

中捷友好公社报告:

2月6日11时到,1时半离开,大使为首的16人吃年饭。边吃边问,有四五个人做笔记。大使反复追问体制变化情况,是否从今年改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什么要改?均未得到正

面答复,转而追问1961年小麦平均产量,书记张廷亮告以90来斤(实际上1961年只40多斤,1960年是90多斤)。其他问题均给了不得要领的答复。副书记李连桂在参赞的围攻下,透露了社员口粮是330~350斤,1961年种3000亩玉米,平均每亩200来斤。后来公社干部转守为攻,问捷克的情况,对方才稍有收敛。

北京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2月27日据此编出一期简报向上报告,把外交人员爱问话的行为上纲上线:“一般使馆都企图利用和公社联欢机会,想方设法地摸我农村公社的情况,捷、德使馆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摸我公社各方面的情况。”实质上外办早已将公社的成就和不足、农业六十条及整社等问题事先理好了对外宣传口径,在具体数字上也给了模糊化的回答余地,并且还提醒公社干部“准备进行必要时适当的斗争”、“如果污蔑我三面红旗,明显干涉我内政时应当当场驳斥”。使馆外交人员在这种境遇中已经很难摸到公社真实的情况,他们只能在“虚拟的语境”中满足一下探寻的心情。

五

从市外办下达的几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依据的是中央1961年、1962年“国庆接待指示”和1962年4月国务院外办《关于对外宾进行宣传的几点意见》等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的要点在于,保证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让各类敌对、不友好的势力获得把柄和攻击口岸,防止消极的不利影响,打造一个密不透风、维护形象的铁桶般世界。

驻京外宾最爱询问基层单位的生产数字,因为外国人觉得单纯简单的数字比存在的事实更易打听,也为中方接待人员容易接受。市委外事小组的请示报告中称:“如果不讲几个具体数字,往往引起外宾的怀疑。”因此中央专门下文指示:凡是可以推算出全面数字的、技术上保密的,以及对外公布会造成不好影响的(如生产大幅度下降),不要透露。国务院外办还补充说,有时可用相对数字,不必引用绝对数字。

市委外事小组由此为开放单位规定以下数字可以讲:一是厂矿企业的产值、产量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没有问题的可以讲,如果不便讲可

只谈设计能力和正常的日产量；二是人民公社的蔬菜粮食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社员平均收入；三是接待外宾人员个人的口粮定量，只限外宾问及时只讲自己，不讲别人。（见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9月29日致市委《关于1962年国庆节基层单位接待外宾工作的请示报告》）

到了1963年反修战火愈演愈烈，国务院外办更要求全国开放单位统一与中央“对表”、“对口径”，1963年5月下发了“对外宾宣传中若干政策性问题的解答意见”，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模拟了应回答的大致要点。

涉及人民公社、对外关系的部分有这样几条：

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两个过渡”，现在如何理解？

答：我们仍然认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将为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找到一个最适当的途径。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样的过渡，这决定于客观条件。我们在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等文件中所指出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问：目前农村人民公社为什么实行二级式或三级式集体所有制？基本核算单位为什么在原则上放到生产队？

答：这样的安排既适应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创造十分重要的前程，是为广大农民所热烈拥护的。

问：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是否继续对外宣传？

答：在外宾问及时，可说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因此有关活动由公社的有关部门分别执行。

问：过去苏联援助建设的企业，现在是否还要主动说明这一情况？

答：需要时可以一般地说明本企业是由哪一个兄弟国家设计并提供设备的，不要说这是他们对我们的“无私援助”，可以说明一切费用均按协议规定由我国负责偿还。

问：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是什么？

答：正在进行编制（不可透露任何意图）。

这些问答带有当年中国特有的政治风格，突

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回避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巨大的内在矛盾，用“言辞繁荣”来掩饰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这种钦定的问答内容很容易为友好公社接待干部所掌握，以后各友好公社汇报的接待材料大都充斥了这类僵化枯燥的内容，可以想象当年使馆外交官在现场的郁闷和无奈。在1964年、1965年的公社汇报中，时常可以看到有的参赞刚吃完饭不顾礼节就起身离去，有的听讲时不集中精力，有的甚至打起瞌睡。更有一位保加利亚参赞忍不住打断主人冗长的讲话，提了几个问题，主人不慌不忙地说：“您所问的问题，我在下面第×个小节时会讲到的。”有的外交人员直接说：“这是宣传口号、公式化”、“像录音机。”（见《1965年北京外事办公室外宾接待工作总结》）

六

1963年1月18日市外办向国务院外办请示，提出各友好公社仍可大体仿照往年惯例进行春节对外活动，对阿、朝、越、古巴要搞得亲切热情，对其他国家大体维持去年情况，即不要过分热情，礼到就行了，不主动谈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第二天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就批复同意，用红笔删去请示报告中“尽量避免苏欧国家使馆人员接触群众”一句话。

该年春节各使馆到公社过年，照例还是不停询问公社的生产情况。但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次他们主要摸我养猪的发展情况，很多使馆都对这个问题特感兴趣，问得很详细、很具体，如养100公斤重的肥猪需要多少饲料？母猪各有多少？母猪怎样喂小猪等？”（见市委外事小组1963年2月8日《各友好公社春节活动情况》）

波兰、捷克大使均对1962年使馆与公社之间的来往减少表示遗憾，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加强联系。苏、捷、波、德、匈使馆提出要在1963年多来公社参加劳动，苏联大使当场要派150多人去帮助公社干活。

从1961年开始，一些使馆曾陆续派出二三十人规模的人员到公社参加拔萝卜、种白薯等简易劳动，有时他们自己带来简单的午餐，再由公社配做一些菜和汤。像苏联大使提出百多人参加

劳动的要求，确实以前所没有过的，中方在关系愈加恶化的政治形势下自然会加以委婉拒绝。

1963年3月30日中央对外文委上报《关于庆祝东欧和蒙古国庆活动的请示》，邓小平、彭真阅悉，获周恩来、陈毅批准。报告中提出：“（东欧、蒙古等）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政治上是修正主义的人，但与苏联的指挥棒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矛盾，对我国的态度虽然总的说来都是不好的，而在程度上也颇有不同。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对我国友好的。”出于中央在国际反修斗争中搞大统一战线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对外文委希望在接待态度上对波、匈、罗、蒙可以略高一些，对捷、德、保可略低一些。

这样就决定对波、匈、罗、蒙可搞150人规模的酒会、友好公社电影晚会，由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参加；而对表现不佳的保加利亚只办80人规模的酒会，外交部只去一位副司长，态度更糟的东德、捷克只能弄友好公社电影晚会这样低级别的活动。

到了1964年春节，情况又出现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中方一再寄予厚望的古巴卡斯特罗此前访问苏联，发表的公报让中共高层颇感不快，认定为“内容不好”。但高层对此颇为无奈，考虑到卡斯特罗对中国友好，又坚决反帝，发表公报后也还没有不好的表现，因此指示中古友好公社仍应热情亲切，不能冷淡。外办田路还特别交代：“此次古巴遭灾，我方第一个援助，东西先到，影响很大，而苏联乘机要条件，不真诚援助。卡斯特罗这次又访苏，我们一定要理解古巴的处境，不能对古巴朋友另眼看待。”

这一年苏、东欧使馆的态度明显降温，也等等采取了“礼到就行”的应付措施。中德友好公社书记杜林等二人去使馆送礼，送的是十七八斤重的一小筐菠菜。杜林事后汇报说：“今年使馆的接待比去年冷淡，去年是八个人在大客厅接待，今年是四个人在小客厅接待。招待的东西也比较少，而且事先没准备好，大多是临时端上来的。香烟是在谈了半天以后才拿出来的。”

使馆外交官喜欢在饭桌上致即兴的祝酒词，这往往使公社干部紧张万分。保加利亚大使说了这么一句：“中国人、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汇集的智慧对人类的和平和文化也是有贡献的。”在

场的海淀区委张书记和公社周书记听了感到有修味，但又觉得不太明显，于是张书记致词时表示同意大使的讲话。事后外办批评张书记警惕性不高，没有听出祝酒词中的修正主义货色。

本来中方认定阿、朝、越三国反修更明朗化，更加强了（外办干部田路语），没想到1965年就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反差，这自然让中方基层外事人员很不受用，很不理解，在撰写工作汇报中就有一种潜在的不解、埋怨情绪：

随着越南抗美斗争的深入和反修斗争的发展，1965年十一个友好公社的对外活动也出现某些新的情况。中越友好社和越南使馆的友好往来次数最多，内容也充实，在接触中表现非常亲切的兄弟情谊；中朝社过去关系密切，来往频繁，1965年以来由于两党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观点不完全一致，反映到朝使馆和友好社的联系方面有明显的变化，1964年双方来往24次，1965年仅8次，在接触中话比较少了，气氛不那么亲切了；由于古巴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中古友好社从一个加强友谊的阵地，变成和修正主义者短兵相接的前哨。（见1965年市外办《活动组1965年工作概况及问题》初稿）

1965年春节过后，友好公社的诸项活动呈现疲惫、烦躁之态，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高层只能低调地指示：“对阿、朝、越、罗，尽可能找共同语言，扎扎实实地搞友好；对修字号的，则采取高姿态，坚持原则立场，抓团结旗帜，做人的工作尽可能向对方施加影响，对分歧问题我不主动挑起争论，但时刻准备着反击对方的挑衅。”

七

从1961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两党两国关系风云变幻甚多，形势缓急不同，经手领导安排的内容不一，各友好公社对外交往之中难免就会发生诸多充满戏剧性、夸张性的事情，构成了此时段民间外交跌宕起伏、难以确定、持续纠结的特征。

1961年4月28日波兰使馆突然打电话给中波友好公社，表示要去公社放映介绍波兰文化古迹的电影，公社接电话者说研究后答复。上报后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指示，请波使馆将片子

交公社，由公社自选时间自行放映，用毕退还。此时波使馆去外交部办理通行证，外交部也以公社农忙为由推诿一下，但波使馆坚持要去。公社给使馆电话回复，说这几天农活正忙，天气又不好，路又远，希望将影片借给，使馆就不必派人来了。波兰人又追问有无什么困难，公社说没有。波方就说：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今晚就去。

外交部曾副部长得悉后，责问公社为什么随便答复使馆问题，他说：“名义是友好，实际胡闹，散布毒素，这是政治问题，（公社）对友好有糊涂观念。”市外办赶紧派出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去公社具体掌握，确定以下原则：公社干部只一两人出面接待，观众不要太多，不议论影片，好坏一律不鼓掌。如影片有修正主义，我们表示看不懂，不感兴趣，如宣传大腿舞、摇摆舞，则表示不习惯，这是伤风败俗。如片子不好，必要时还可部分人中途退场。

但刚刚开始放映，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了紧急指示，说不必搞得太冷太僵，友好工作还是要做，是否鼓掌需看内容好坏。这一指示传达后，在摸清影片内容后公社又陆续增加了一些观众，散场时自然形成夹道鼓掌欢送的形式。公社干部称：“对方尚没看出开始我们曾做冷淡处理的布置。”（见市外办1961年4月4日《关于波兰使馆到中波友好社放映电影的情况报告》）

1963年使馆到公社办国庆电影晚会，基本上不做政治性的讲话，只是放映前由公社负责人宣布：电影晚会现在开始，请同志们观看我国彩色影片《红珊瑚》。结束后又说：晚会到此结束，让我们欢送外宾。1965年市外办做工作总结时也承认，友好公社的一些做法过于死板，变成了一套僵硬的死公式。

不仅友好公社了陷入单一的僵局，整个外事环境也已经变得极为刚性，同时也极为脆弱和神经质。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协定，1963年11月在农展馆举办“苏联七年计划摄影展览”，国务院外办廖承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采取苏方对我“人民公社摄影展览”相应的办法，即要求在两个月展出时间里，为了不出问题，每天组织100至250人参观，尽可能不让散客进场，参观时不批评，不表扬，不留言，不提问，不挑衅。外办还希望由公安局参与此事组织工作，以确保政治上的

绝对安全。

1963年11月苏中友协代表团到起重机厂、中苏友好公社参观访问，在起重机厂大会上代表团内一州委书记谈到：“苏联人民在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为实现22大提出的宏伟任务而努力。”整个会场无一人鼓掌，显出死一般的寂静，气氛急转而下，州委书记被迫未能讲下去。等到了中苏友好公社，苏方代表团团长在集会中说：“苏共坚持国际主义，维护马列主义，不允许任何人对马列主义进行歪曲。”群众也是无人鼓掌，满脸无表情，就是团长最后祝贺公社取得成就，也是全场静音。代表团知趣而退时群众既不鼓掌，也不握手。（见1963年11月2日市外办《关于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报告》）

其实无人鼓掌的方式还算客气，在1961年时苏方人员几次到友好公社和工厂，一谈到22大和赫鲁晓夫，场上就有不少人大声咳嗽，还有人故意把座位弄出响声。

1964年10月底苏中友协再次组团来华，巧逢赫鲁晓夫下台，中共对苏共新领导寄予厚望，于是决定庆祝十月革命的气氛应比去年热烈而隆重，少见地在机场向全体团员献花，临时撤除代表团所住的宾馆、旅途中所能见到的反修小册子。

但是苏共新领导的表现并不合中共高层之意愿。11月6日国务院外办紧急命令石景山中苏友好公社在当日参观活动中取消原定的下列安排：200多人的欢迎场面，少先队员献花，会场摆放的国旗、彩旗，麦克风扩声器。同时到会的250名社员缩减为50人参加，但开会前还应组织200名机动人员待命，万一中央临时决定恢复原计划，马上可以进入会场。外办如此安排的要点在于，要让苏联人明显地感觉到6日的气氛与5日的气氛不一样，安排得要有技巧，不让其抓住把柄。（见1964年11月6日《到中苏社参观的紧急通知》）

苏联人在友好公社看到用胡萝卜喂牛甚感惊讶，莫斯科州委书记梁戈列夫说：“在莫斯科不能用这样好的胡萝卜喂牛，我们只能把次胡萝卜喂牛，好的还留给人吃。莫斯科农庄的管理工作没有你们好，还需要向你们学习。”使馆参赞甘生则问到：“用这样好的东西喂牛，为什么牛不肥？”

在事先布置好的村商店，看到满柜的鱼肉，苏联人好奇地问：“为什么没有人买？”商店的几张油票没及时收起来，结果这么一个被疏忽的细节引来了苏联人对票证的追问。有的社员在炉台上偷烤白薯片，一位耳聋的老太太没被隔开而向外宾接触造成不便，穿着借来衣裤的小学生接过纪念章不会表示感谢等等，这些形象上的漏洞都让上层领导颇为不快。（见1964年11月10日中苏友好公社党委《关于十月革命节接待活动情况的报告》）

这种疏离、淡漠和无味已经成为苏、东欧国家来访人员对友好公社最鲜明的印记，同样深深地刻在公社干部群众的骨子里，已经成为他们对外自然流露的常态。

1965年10月底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天津演出遭到有组织的冷遇，周恩来接报后颇为震惊。11月1日凌晨5时他令秘书周家鼎写信急告总政刘志坚、对外文委李昌、文化部肖望华，要求迅速接受天津的教训，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认为：“红旗歌舞团这一批演员绝大多数在1952年来过中国，对中国有感情。这一次又是专程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来的，同时也恰恰是在我解放军歌舞团赴苏演出遭到冷遇的情况下来我国的，我们一定要多做工作，把工作做到家，两相对照，给他

们以良好形象，以便回国后在苏军中、苏联人民中扩大影响。”

周恩来当即决定自己和陈毅出席当晚的开幕式，要求对于节目内容要好好研究一下，对好节目要热烈鼓掌。周恩来本来要在大会堂楼上前伸的两侧安排军乐队奏两国国歌，结束时奏两军军歌，做到出乎意料之外。但在当日下午二时周又觉得过于突出，电话通知取消此项演奏计划。

正因为周恩来这种升温的措施，11月6日上午红旗歌舞团到中苏友好公社参观时，竟难得受到300多社员夹道欢迎的待遇，演出时可谓掌声雷动，尤其是临时加演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更是长达数分钟。市外办事后《中苏社和红旗歌舞团联欢的情况》中透露，这场活动临时变化较多，可能是使馆人员和歌舞团内的坏蛋在有意捣乱，想打乱我原计划，好让我出些漏洞抓小辫子。但总体组织较好，对外是成功的。

整整五六年的压抑和限制，红旗歌舞团的来访给双方都带来了无尽的欢喜和轻松，可惜这只是一次偶然机遇，只能说这是中苏关系的寒冬到来之际友好公社呈现的最后一抹暖意。■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西门子听力集团 德国西门子（德）有限公司 2009年 2009年 2009年 西门子听力集团 德国西门子（德）有限公司 2009年 2009年 2009年
注：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德国西门子（德）有限公司 2009年 2009年 2009年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 李海文

一、1968年北京高校发生武斗

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这是共产党的惯例，也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惯例。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后，高校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刘少奇、邓小平按照惯例派了工作组，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因为怀疑一切的个别师生反对工作组。为了控制局面，工作组在学生中抓“鱿鱼”、反革命，为自己制造了反对派。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几天调查，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师生自己搞。

7月24日毛泽东到中央文革驻地看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和大区书记，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工作组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的。”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半途而废的人也参加一部分。”7月29日召开万人大会，高校每个班都派一名代表参加。刘少奇、邓小平检查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宣布撤销工作组。

8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充分肯定革命小将，说“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从此，开始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并写进党的决议里去。（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革”这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离开了共产国际、中共的经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是个什么样子呢？谁都没有见过，谁都不知道。1967年2月毛

泽东总结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220页）“文革”就是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文革”初期保守派势力很大，占多数。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群众组织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分裂，各省、各地、各个单位都是如此。1967年夏，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派性、分裂上升为武斗，达到全面内战的程度。

派性是伴随“文革”的爆发而产生，派性、武斗是伴随“文革”的发展而不断加剧。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党中央不懈努力下，各地大联合，到1968年3月，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已有18个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形势逐渐安定。在各地煽动武斗、组织武斗、参加武斗的学生无法在当地生存，陆续回到学校。随他们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他们在各地武斗的“战友”。许多不愿参加打派仗的逍遥派从家里回到学校，准备复课。沉寂多时的校园热闹起来，学生们围绕着学校的问题争论起来。学生们本来就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这时他们已有在各地武斗的经验，很快争论、争吵就上升为武斗。

虽然各省革委会相继成立，但是各地两派长期对峙，武斗不止。1967年夏，毛泽东指出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克服派性。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的，以帮派形成气候，他们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支持我，我就拥护谁；谁批

评我，我就打倒谁。他们一路打倒单位领导、省领导、到中央、国务院、军委的领导。随着这些领导一个一个被打倒的现实，权威观念越来越薄弱，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虽然他们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但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置若罔闻。1967年8月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得到毛泽东批准，相继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击了中央文革，打击了中央文革支持的极“左”派。1968年3月林彪、江青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又提出批判右倾。这正合他们的胃口，马上乘势再起，破坏力更大。“文革”以来，两派一会儿你掌权，一会儿我上台，谁也不讲政策，谁掌权就打击对立面，对立面上台后又如法炮制。不断地翻烧饼，两派的矛盾越积越深，人们越来越情绪化，斗争越来越激烈。

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不想结束运动，在他们的指挥、操纵下北京高校的“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命名）和“地派”（以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命名）发生武斗。3月28日，北大“天派”聂元梓控制的“公社”用武力将31楼的对立面的学生赶走。29日学校发生武斗，双方100多人受伤。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两派说：“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江青表态支持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同上）武斗的结果使从劣势聂元梓转为优势，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个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天派”，纷纷效仿。

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28日前已发生数次小规模武斗，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对此一无所知。28日、29日正在学校。29日四五点钟被外面的喊叫吵醒，同学们惊恐不安，越快起身穿衣，从窗户里观望。当时楼的南边空旷开阔。不一会儿看见聂元梓和一小群人站在院子里，人群中突然发生骚动。有人喊：聂元梓被刺伤了。马上有人反驳：没有人刺她！一切是那么混乱，我惊呆了。快到早饭时间，传来攻打我们住的30楼。同学李宝洪好心地说：“你还不赶快走。”我才醒悟，赶快回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每星期到学校

看看情况。两派安营扎寨，修筑工事，楼与楼之间架起天桥，挖了地道。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声讨对方，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越演越烈。我改为一个月回校一次。

参加武斗的是少数，大多数不愿武斗，纷纷逃离。外地同学无地可去，投奔同学、同乡，搬到别的学校住。同学们用自行车驮，肩挑背扛，络绎不绝，行走在空旷马路上。谁知刚安顿好，4月23日清华大学也发生武斗，（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4页。）同学们只好再次搬家。

偌大的首都，何处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大、清华一直是中央文革抓的两个典型，就在中央的鼻子底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不制止，就看着他们这样毁坏校舍，为了打弹弓子，在墙上挖洞。为了联络，挖地道。雨季到来，雨水将地道泡塌，马路陷下一个一个大坑。

北大公社由原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领导，北大是文科和理科，武斗用的武器是：长矛、铁棍、护甲、用自行车轮胎做的大弹弓，打死几个学生。“团派”由二十几岁学生领导，血气方刚。清华是工科学校，有实习工厂，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他们自己造枪支弹药，甚至土坦克、土装甲车。武斗远比北大惨烈，双方打死18人，打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同上，第64页。）少数派被断水、断电、断粮、断炊，过着非人的生活，无法脱身，天天盼着解救他们。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手持长矛巡逻，气恼地说：“他妈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参加了！”（2003年采访郭庆山。）“文革”以来，人们一扫斯文，个个都学会国骂。

二、毛泽东决定结束内乱

北京各大学的武斗鼓励了各地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在北京的大学内建立驻京办事处，有的造反派在当地无法生存，就躲到这些大学里。在全国广西的武斗是最严重的。湖南与广西毗邻，“湘江风雷”自然不甘落后。

1967年时毛泽东预计：“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毛泽东南巡讲话。）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按计划应是扫尾，以

大乱达到大治。他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再持续下去，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支持、容忍、善意地批评的态度，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制止武斗，他要坚决制止全面内战。

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失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的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967年“三支两军”以来，先后已派了280多万指战员到全国各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其二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412页。）军队有保卫国家等任务，不可能再抽出更多的兵力参加“三支两军”。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十人曾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但是没有能制止武斗，其中一个原因人数太少。现在对群众的领导不能光靠思想领导，还必须要有组织保证。这个力量到哪去找？

干部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有组织的拿国家工资，便于指挥、领导的只有工人。北京的工人从没有形成左右全市局面的两大派。1968年初是戚本禹被抓后，周恩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将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基本清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66页）北京的工厂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农民是依靠力量，是基础，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树立无产阶级的优势。从理论上说人们也容易接受。

权宜之计，没有法子的法子，如同三支两军是权宜之计一样。随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的地位陡然上升。仅举一例。建国以来，人们打招呼，以同志相称。马上以“师傅”相称。工厂是师傅带徒弟。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年底工宣队撤出学校，回到工厂。时间过去近30年，虽然“先生”、“小姐”的称呼不绝于耳，仍能听到“师傅”的称呼。

三、工宣队和平进驻清华，伤亡惨重

北京各大学武斗，从3月打到7月，打了100多天。对全国影响甚大。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工宣队的领导由8341部队负责人担任，其中有8341部队宣传科科长迟群。3万人号称10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央会采取这种办法。

这时的红卫兵，已不是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毛主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红卫兵。现在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蒯司令。”（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上午9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只有几百人）向工人开枪。工宣队、军宣队只带着《毛泽东语录》，准备以政治攻势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团派”要血战到底。顿时，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同上，第31页）。

北京的各大医院住满了伤员。工人看着死伤的工友，气愤万分，急红了眼，打了个别围观的学生。其实，敢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学生都是反对“团派”的。工人们进城刷大标语，声讨武斗的学生。血染清华园消息顿时传遍北京，震动四九城。解放军不能阻拦工人，跟在后面覆盖。

“团派”学生要血战到底，工人死伤众多的消息惊动了毛泽东。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所谓的学生五大领袖，制止武斗。从凌晨3时半开始，一直谈到8时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谢富治、吴德。蒯大富迟迟不敢露面，大喇叭不断广播，不断做工作，7点多才来。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恸哭，江青也掉了泪。

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4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聂元梓等五人整理的记录。）然后让谢富治、吴德和蒯大富、韩爱晶等一起回清华，制止武斗。（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

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清扫据点，收缴枪支，抓获凶手，拆除工事，将学生召回学校，组织师生学习，稳定局势，工作走上正轨。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同上，第673页）因为有前车之鉴，没有人再敢反抗，进驻十分顺利。清华、北大局势稳定了，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都进驻工宣队。（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79页。）

四、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变化

7月27日清华流血事件，给毛泽东很大的刺激。

“文革”是由学校而起，学生们成立红卫兵，先在党校造反，而后冲向社会，冲垮多少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向披靡。红卫兵是“文革”的生力军。那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而此时，清华打伤、打死毛泽东派去的工人，证明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并不是“始终是正确的”。

“七二七事件”，证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设想没有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社会，反而局面失控。不得已又派军宣队、工宣队，这种做法和当年的工作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人员组成不一样。仍回到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仅仅两年时间，实践证明中共旧有经验是对的，目前超越不了。

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时，写下这段话：“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6页。）

面对严酷的现实，毛泽东的认识转了一圈又回到它的原点。十年“文革”中，毛泽东的思想在不断变化的，以工人占领上层建筑这种方式处理大学武斗就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这段文字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发生变化的最早记载。

毛泽东每采取一个重要部署，总要有相应的理论产生，以理服人。他在派工宣队的同时，让姚文元起草一篇文章。他3次审阅、修改。最后决定以姚文元个人的名义，于25日在《红旗》第2期

发表。

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讲话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工人，军队，工农兵，就是生产者。”他一贯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有劣根性，要不断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七二七事件”加深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1968年8月25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1968年第2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7~531页。）

姚文元文章一发表，人们明白了，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从此，文化大革命增加一个内容，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从此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

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第十二条。）以前只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现在无论是反动权威，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有贡献的，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是资产阶级；“文革”前只说解放前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连建国后17年培养的大专学生也都是资产阶级的，统统成为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17年毕业的大专学生有近200万。从此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并列，成为工、农、兵、地、富、反、坏、右、之后的“臭老九”。

对知识分子打击面之宽，是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毛泽东历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1939年专门著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

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领导是以工人宣传队的形式来体现，而不管这些工人平时的表现如何，是否有文化知识（王洪文的小弟兄陈阿大就是半文盲），掌握政策的水平。有的工厂将不好管教的工人派到工宣队中去。

其实，过于强调工人成分，中共上个世纪30年代就吃过亏的。中共的领导层基本一直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选工人为领导，工人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能力差，品质恶劣，被捕就叛变。延安整风后，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专门指出：“他们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种提法是否符合中共几十年的传统、经验？答：不符合。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不符合党章。党章规定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体现。清华的一个学生党员询问工人师傅：“我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怎么领导？”工人讲不出理，毕业给他发配到最穷、最苦的地方。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符合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不符合。

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19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后，成立了第三国际。中共就是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建立的，从一开始就遵循着列宁的建党原则。

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什么？列宁说：“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1920年4月，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4卷第209页。）列宁又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

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夏，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中共长期在农村，党员的绝大多数数量是出身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这是不是就改变了中共的性质呢？这在党内曾有过争论。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论党》专门阐述过此问题。他明确地说：“这种情况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刘少奇选集》（上）第324～32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刘少奇的阐述曾一度成为全党的共识。建国后，不断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强调出身，人们对刘少奇的论述渐渐淡忘了。久经考验的干部作为走资派基本上都被打倒了，在1968年大部分人还没有解放，还不能出来工作，还没有发言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林彪提出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是一致的，都是崇拜工人自发性。只是林彪将范围从工人扩大到群众。一方面反复强调阶级斗争，而群众是分阶级的；另一方面提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这实际是相矛盾的。林彪为了解决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才提出这个命题，带有很大功利色彩。林彪讲话简洁明了，易记上口，“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顿时传遍九州大地。

这个命题对不对？工人阶级能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列宁早有阐述。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列宁选集》第1卷第331页。）“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公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

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334页。）

其实林彪对这段话是很熟悉的。“文革”前他在讲话中就引用过。他为政治需要就能编造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这与他急用先学，学以致用观点是一致。

五、结果及影响

从此，毛泽东再也不鼓励“踢开党委闹革命”式的群众运动。而江青“四人帮”仍迷恋“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毛泽东的主张相背，背道而驰。由此引发毛泽东与江青“四人帮”之间的分歧，引起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从1974年起不断批评江青。

毛泽东派工宣队还有一个原因，全国28个省市，除上海（张春桥）、黑龙江（潘复生）、山西（刘格平）、山东（王效禹）北京（谢富治）、河北（李雪峰）、陕西（李瑞山）等7个省市外，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是军人。军人占百分之七十五或四分之三。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谁是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王洪文所代表的工人造反派，特别是王洪文上海小帮派。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最多、最集中。而上海是第一个夺权，建立革委会。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控制的。王洪文到中央，自然巩固、提高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王洪文到中央不久就形成“四人帮”。

姚文元文章指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为王洪文及小兄弟的上升铺平了道路。

九大，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马天水共六个人，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张春桥、姚文元因为领导工人运动，推动“文革”有功，进入政治局。其他省，如河南唐岐山，也以工人代表

进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11月张春桥说：“外事队伍不能都是知识分子”，“要培养工人外事干部，培养工人大使”。1972年上海审定113人，33名放在上海外事单位，80人送复旦大学培训。

十大，上海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除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马天水6人外，增加了于会泳、周宏宝等共9人。更重要的是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张春桥进入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政治局委员，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十大前后，随着王洪文地位提升，张春桥说：“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北京需要，全国需要，要选些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造反派的新干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上海革委会核心组经过精心审查、选拔，先后排出近30人的名单。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四人帮”要组阁，为了扩大自己的班底，从上海调到中央、国务院工作的有：全国总工会金祖敏、文化部于会泳、教育部周宏宝、公安部祝家耀，此外还有六机部、邮电部、建材部、卫生部、团中央筹备组等部门共9人。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掌握了学校的领导大权，后来解放、结合了一些原有的领导干部，也是副手。农村没有产业工人、解放军，就请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请转业军人到学校担任领导。当时在大城市的工人一般文化程度是初中或小学甚至个别是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在工厂都是干部，当然已作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打倒、被批判。中等技术学校建国17年来培养了500万学生，他们作为走资派的红人、黑苗子被批判，成为另类，基本不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派到学校占领上层建筑。而管理农村中小学的贫下中农中小学、文盲的比例更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改革，从来没有让小学、初中文化的外行人来管理高校，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这样做。

他们掌权后，很快实行高校新的招生方法，1969年3月清华大学试点，1970年7月22日，清华军宣队负责人迟群编造出《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大学而奋斗》经验，经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修改后定稿，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们

的经验是：“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到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将招工农兵学员作为教育革命的重要政策肯定下来，废除了从高中直接招生的老办法，实行从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并且不考查学员的文化程度，让小学、初中文化的人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军宣队受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自然拥护这个决定。

所谓“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就是全面地降低高等教育水平，将大学办成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文革”将高等学院办成职业技术学的同时，取消全国各种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共61626所。（《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0年第182页。）到1971年恢复1591所，1976年为2443所，1979年为3033所。（同上，第981页。）

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这些名词听都没有听过，更不要说培养了，统统取消。教师的职称评定全部取消。所以有人说：这不是教育革命，而是“革命”教育！

1968年12月，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斗批走”，凡是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不是反革命、不是凶手的一律分配工作。包括66级、67级、68级毕业的学生。四年制的大专院校只留下69级（即1965年入校的学生）。五、六年学制的学校还留下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当时六年制的系比较少，都是理工科、尖端专业。协和医学院是8年制。学校基本走了一大半或一半学生。1969年、1970年、学校到期，正常分配。在校生从66届到70届有近百万人。到1970年大专院校已没有学生了。

1968年分配方向：边疆、基层、农村、工厂，即“四个面向”。一般情况越是重点院校，分配方案越差。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分在甘肃的公社医院工作。分配到各地后，先在当地的部队农场或乡村劳动锻炼一年半，1970年春正式分配工作。毕业的大专学生进入干部、技术人员行列，发给未转正前的工资，四十几元，按地区分类。

中学生，从1966年到1968年的高初中毕业生，除少数分配工厂、参军外，其余都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劳动。他们年龄最大21、22岁，最小14、15岁，不到法定劳动年龄。10年内，上山下乡的插队知识青年达2000万。

从此红卫兵退出政治舞台。虽然中学的学生组织仍沿用红卫兵名称，但类似“文革”前的共青团。“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1969年春天召开的九大，代表中没有红卫兵，任何一派都没有。

只有聂元梓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她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红卫兵组织，但是她本人是老干部，与红卫兵还是有区别的。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这张大字报被毛主席封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她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随着学生离开学校、离开城市，红卫兵运动结束，城市恢复了部分的平静。

学生们从经济计划保证供应的城市，到了经济计划管不到的农村；从理想的天国，落在贫穷而坚实的土地上；从打倒别人的革命者，变为被改造的对象；以前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改善生存条件而奋斗。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带着派性，星散各地，融入社会。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撞击他们的心灵，他们开始反思，广大群众并不关心谁是修正主义，他们迫切要求的是：安居乐业，过上富足、舒心的日子。夺取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经过苦难的磨炼，他们由“文革”初期的拥护者、积极参与者，渐渐成为“文革”的反对者，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群众基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日本侵华时的间谍活动

○ 孟 悦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在这些血腥阴谋的背后，隐藏着形形色色的间谍活动，它们为日军的侵华部署和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间谍活动

日本军队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可追溯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1872年9月，日本留守内阁派遣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从上海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到奉天“旅行”，勘察出“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支那肯定土崩瓦解，这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好机会”。1873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实地勘测，绘制了一张精密的台湾地图，日本在1874年侵略台湾使用的就是这张地图。1874年7月，日本佐贺浪人山口五郎太偷渡到福建省，不久就和当地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外交武官小泽豁郎、曾根俊虎分别于福州、上海进行间谍活动。山口和小泽以经营福州照相馆——庐山轩作为日本间谍活动据点，即当时日本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福州组”。

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到中国刺探情报。在他之前，虽然日本间谍已经深入到中国的许多城市，但荒尾精是个转折点，他第一个理清在华日本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将日本参谋本部与大陆浪人有机地纠集在一起，使日本间谍更加疯狂，也更具谋略。

1886年，荒尾精在汉口开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日本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堂分店。1888

年，日本“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派出一批青年参加汉口乐善堂谍报组织。他们先在上海城内学中国官话，然后加入汉口乐善堂工作。这样，乐善堂表面是百货商店，内部却是紧张地搜集、研究中国情报的秘密组织机构。荒尾自任总管，将成员分为内员、外员两部分。外员负责到中国各省探查人物（分为君子、豪杰、长者、富豪等），中国秘密会道门以及各省的土地、被服、运输、粮薪、兵制、制造、山川地理、人口、风俗习惯和贫富善恶。乐善堂把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随着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情报的强烈需求，日军间谍情报网也在逐渐扩大。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湖南支部、四川支部、北京支部先后设立。为了便于侦察、搜集情报，他们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俨然以一个中国人的面目出现，并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流窜于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

1890年9月，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并以此为基础据点刺探搜集中国的情报，为日后的侵华战争服务。不久，他又以经商为名成立了间谍机构——“瀛华广懋馆”。

1894年夏，日本以重兵胁迫朝鲜。根津一受令再次潜往中国，目的是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做临战准备。当时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日本间谍机构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暗语系统，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兵”；“中等品”指“大连湾附近之兵”；“谷类”代表“步兵练勇”；“杂货”指“炮兵”；“买卖不如意”意为“北洋舰队不出威海”；“草帽辨行市如何”指“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

攻击”；“近日返沪”指“威海舰队之防御移至旅顺”等等。此外，日本间谍以外交官、商人、学者、医生、旅行家、侨民、妓女等身份为掩护，深入宫廷官府、穷乡僻壤，探悉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的内幕，“从而确信中国之不足畏，增强了必胜的信念”，这些间谍活动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有3项谍报活动最为著名：一是神尾光臣侦得清政府军机处情报；二是石川伍一搞到高升号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宗方小太郎侦察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这3项情报活动为日军获胜起了重要作用。1894年7月，宗方小太郎在上海接到日本大本营命令，要他侦察威海卫中国北洋舰队动向。当时威海卫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北洋舰队禁止该地与外界通信，封闭甚严，被日本谍报机关称之为“死地”。宗方数次冒充中国人穿越“死地”进入“死地”，终于探明镇远号等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8月19日经上海传报给日本大本营。日本海军获悉后，便集中联合舰队，于9月17日在黄海拦截并击溃北洋舰队，夺得制海权，并最终赢得这次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又在“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于1918年前后，编制了《支那省别全志》分别陆续出版。1943年前后，又重新修订出版了《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为日军考察中国地志搜集了大量详尽的资料。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军部将中国的东北作为对苏作战的出发地和战场。满铁调查部是昔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侵略机关——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智囊团”，它直接向关东军司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和详细的东北兵要地志，如《东北三省（满洲）土匪研究》等。此外，满铁调查课也对预定及临时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收集各种报纸制成剪报和资料卡，为日本侵略中国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之所以针对中国的兵要地志研究这样细致，是与其军国主义扩张需求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侵略战争预谋是如何处心积虑。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间谍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加紧战争准备，大力开展对华间谍活动。

1928年6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在高级情报参谋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军阀张作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与此同时，关东军情报机构还组织了4次从事间谍活动的“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实地侦察，筹划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支队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被中国军队缴获，查有日文和中文军用地图各一份，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

通过各种侦察，日军基本上搞清了东北的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翌日占领整个沈阳城。就在占领沈阳不久，日本关东军即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沈阳情报机关，其头子即是被国际新闻界称为“满洲间谍大师”的土肥原。土肥原早在日驻华使馆当助理时，就开始了对华的间谍活动。他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能说4种中国方言。利用语言之便，土肥原一方面网罗一帮中国败类提供情报，一方面在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开设妓院，设立情报据点。当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这样谈到土肥原：“历史将清楚地证明，在中国制造事端、寻机挑衅是日本军队的既定政策。而土肥原大佐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他手法高超，不断地在中国人之间制造纠纷，为侵略铺平道路。他只要在任何地方稍稍一露面，无论把话说得多动听，都是要出现事故的前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九一八”前，日本间谍头子土肥原参与策划的各种阴谋，收集各种情报，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日军

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其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另外，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是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的特务组织，其触角和耳目很广，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1932年，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在其存在的4年多里所完成的调查、计划和资料总共达1882件，其中起草方案829件、资料1053件，并分门别类编辑成册。除此之外，还出版了《满洲经济年报》、《满洲经济统计》、《满洲经济统计图表》、《满洲劳动事情总揽》、《关东洲及满洲国盐业统计》、《北支那外国贸易统计年报》、《满洲农产物收获高(值)预想》、《满铁调查月报》、《满洲经济统计月报》、《劳务时报》、《满洲劳动统计》、《统计时报》等刊物。

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日本间谍活动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速决战的幻想破灭。日军被迫改变战略，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即从反蒋转变为拉蒋，企图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为此，日本加紧对华的间谍情报活动。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二是“全力以赴加强对成为华北治安致命祸患的中国共产党及共军的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遍及大半个中国。满铁扩大了调查部，积极配合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为侵略机关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和决策参考。“在十五年战争中，满铁调查部经常出现在战场的第一线，为军方的决策和调查而献身”。〔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三次十年史[M]，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8。〕除应军方要求进行专项调查外，主要进行了如下综合调查：（一）“支那（中国）抗战力调查”，此项调查以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为中心进行，旨在通过对中国抗战能力的调查研究，为日本军方的军事侵略和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制定行动

方案与政策提供依据。（二）“日满支（华）集团通货膨胀调查”。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专门举行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认为，“组织锐利周密的情报网，触及敌人抗战能力的核心，至为重要”，要求“进行讨伐的各级指挥官，更应关心情报工作，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必须在粗大的特殊情报的网眼之中，配备严密而机械的谍报网，必须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会议制定了以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为其情报工作重点，建立谍报网。为此，方面军的谍报机关增设了特殊情报班。与此同时，日军加强了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工作。

1942年，日军参谋本部做出了“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工作的有关事项”的决定，指出大本营陆军部主管部门应首先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努力侦察重庆方面的动向。随着形势的演变，适时地从谍报工作转入迫降工作。日军在诱迫国民党当局投降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政策。日军的间谍和宪兵机关则专门从事收集情报、策反以及逮捕、侦缉、迫害抗日人员和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1942年2月，中国派遣军召开驻中国宪兵队情报会议，调整了情报网，命所属各宪兵队专门组成对中共的谋略谍报网。此后，配居第一线各兵团的宪兵，分别部署在200个主要县城，构成有组织的情报网。这些情报网的建立对日军进行侵华战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利用其侵华时期的间谍活动，通过多方位细致的情报调查为日本军队和政府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决策咨询和参考，充当着日本侵华的先遣部队与参谋，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作者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

○ 张绪山

“权力腐败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他对这种思想的另一种简洁明快、铿锵有力的表述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就是为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所普遍接受的“权力腐败论”。

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是对权力本性的深刻洞见，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阿克顿看来，任何权力“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在这里，他的分析对象是“一切权力”，使用的是全称称谓，即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具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共性，这种共性并不因为掌权者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改变；其次，任何权力在它演变为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绝对权力”时，其内在的“趋向腐败”(tends to corrupt)则演变为绝对的无可避免的腐败。换言之，任何一种权力，不管它以何种名义出现——是“神授”的权力，还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也不管掌权者怀有何种美好的理想，只要它失去约束，就会由“趋向腐败”变为绝对的“实在的”腐败。

阿克顿“权力腐败论”的立论前提和着眼点是掌握权力的人，换言之，“权力腐败论”所要告诉人们的，是人与权力结合时人性必然发生的变异。这一观点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的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

才休止”。

启蒙运动以来，“权力腐败论”这种政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演化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为政治学的基本公理，普通民众的政治常识。爱因斯坦在《我的政治理想》中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可以说，对于民主制度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权力腐败的高度敏感和警惕意识之上的。

在美国总统位置上的小布什于2002年从政治家的角度特别强调：“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这段文字可以算得上当今政治家对“权力腐败论”做出的最形象的诠释了。

然而，以当权的政治家身份阐释“权力腐败论”，对民主化改造尚未完成的民族而言，是难以想象的。近代以前世界各国毫无例外地盛行“君权神授论”。权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如其说基于法理，毋宁说基于神道(天道)。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主权在民”思想，彻底剥去了君主和神圣家族身上的神圣光环，使权力正义性的根基由“神意”转移到“民意”。但是，基于“主权在民”思想之上的权力制衡制度的正常运作，需要一些不可或缺的

条件；对于权力本质的认识，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权力腐败论”所揭示的权力腐败本性，即权力运作过程的“腐败律”，是权力制衡理论和制度设计的内在前提和逻辑起点：“将统治者关进笼子”，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乃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命题本身的应有之义。“权力腐败论”成为现代政治伦理信条，既是近代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体系建立的必要前提，又与之相辅相成，互为支持；没有“权力腐败论”的深入人心，就不可能使整个社会对“制衡制度”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现代民主制度为何以“权力腐败论”为政治铁律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自传《无畏的希望》中，回忆当年他受在任的布什总统邀请，与其他新当选的参议员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面的情形。在这次会见中，布什对奥巴马极力表现出和蔼可亲的姿态，但当他向新当选的议员们介绍他的执政日程时，其行为举止变得有点吓人。奥巴马写道：“突然，好像密室里的人按了一个按钮。总统的眼睛开始凝视，他的声音变得激动，语速加快，变得既不习惯也不欢迎其他人打断他的话，他的亲和被一种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固执所取代。……我意识到了权力带来的那种危险的孤立。我明白了开国者设计制衡制度的智慧。”奥巴马虽没有明确提到“权力腐败论”，但他强调的“制衡制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权力腐败论”。

奥巴马所谓的美国“开国者的智慧”，在本质上应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智慧。孟德斯鸠基于对“权力腐败律”的深刻认识，认为只有“权力制衡”才是解决之道，用他的话说，就是“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权力腐败论”和“制衡制度”理论的系统发明和阐述，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贡献。美国的开国者的贡献，是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建设。

但是，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权力腐败论”，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化遗产和基督教宗教理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重放光芒，其政治思想也重新获得生命力，通过启蒙思想家的重新阐释和发挥，演变成为近代政治的基本伦理要素。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欧洲，逐渐强大的中产阶级，面对中世纪后期王权对民权的肆意侵犯，从古代文化遗产中受到启发，逐渐形成近代的权力制衡理念和制度设计。

与此同时，基督教宗教伦理对于欧洲民众接受新政治伦理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作为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一的“原罪说”，以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说明人类恶性的由来，从而也说明了人类恶性（或“兽性”）存在的缘由。进入近代以后，人本主义者更提出，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而居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其自由意志使之能够自由发展自己和战胜自己，可以堕落成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以“自由意志论”为前提，人性“善恶两存论”得以成立。“半是魔鬼，半是天使”这句谚语广为流布，成了当今人们普遍承认的对人类属性的界定。基督教“原罪说”是近代“权力腐败论”的直接思想源头。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分析人性，但同样得出人类具有“兽性”的结论。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么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反杜林论》）

人性的“魔鬼论”（或“兽性论”）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人类客观存在的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与动物客观存在的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并无本质的差异。这些人与动物共有的欲望主要有生存欲、性欲、权力欲和贪物欲等。在这四种欲望中，生存欲、性欲主要涉及生存和繁衍问题，在这两种欲望上，人与动物完全没有二致。权力欲表现为对同类的支配欲望，贪物欲是对物的占有欲望，这两种欲望的表现形式，在动物身上远比人类简单：在动物那里，权力欲的实现完全不像人类一样，借助于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而赋予其正义性与合理性；贪物欲在动物那里则只是对食物

的优先享受权,且只以饱食为限,不似人类那样巧取豪夺、贪婪无度。在人与人结成的社会中,这些无时无处不在的欲望的膨胀,与权力的增长成正比:普通民众虽有欲望,但没有权力,欲望受到的限制最多,其欲望释放的可能性最小,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最小;相反,权力越大,欲望所受限制越少,释放的空间越大,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亦越大。掌权者之所以“欲望横流”、“欲壑难填”,以至于“为所欲为”,其原因在于权力为掌权者提供了不断扩张欲望的空间。正是由于这样的事实,现代民主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必定以权力可能导致的欲望泛滥为前提建立“制衡制度”,这就是“权力腐败论”所体现的“有罪推定”。

然而,以“有罪推定”为前提建立制度,并不意味着否认人作为“半是天使”的向善倾向。在强化制度设防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更加注重对善性的呵护、培养,更注重对善行的鼓励,更真诚地树立和维护善行和美德的榜样。用美国民主政体的奠基者的话说,就是:“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但是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嫉妒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286页)

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有“权力腐败论”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政治角度,吏治清明的时代屈指可数,寥寥无几;皇帝淫糜昏暴,吏治腐败无能,官员贪婪狡黠,几乎是各朝各代的常态。孔子那句“苛政猛于虎也”的浩叹,几乎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然而,诡吊怪异的是,两千余年皇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吏治溃烂,并没有促使中国社会创造出“权力腐败论”,更没有催生出有效制约权力的制衡制度,相反,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之后,大行其道的仍是“君权神

授”、“天命所归”观念下的“权力神圣”。

尤堪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历程的当今中国社会,仍隔膜乃至绝缘于“权力腐败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官场如何腐败成风,也无论官员腐败到何种程度,一成不变的流行观念是:官员队伍中尽管有少数腐败分子,但整个官员队伍是好的。这实际上是拒绝将权力整体视为一个潜在的腐败力量。时至今日,“权力腐败论”不仅不为民众所深刻理解,而且也不为正统意识形态所接受。那么,中国社会为何古今至今只有“权力神圣观”而无“权力腐败论”?

由于当今中国还没有摆脱传统政治伦理,对“权力腐败论”缺失这个事实的分析,只能求助于对文化传统的考察。在我看来,这一考察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政治伦理本身是否包含导向“权力腐败论”的内在因素;二是传统政治伦理所赖以存在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结构是否允许这种政治理念存在,换言之,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一个阶级力量为“权力腐败论”张目。

政治伦理以人性论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性善论”对中国政治伦理产生过巨大影响。儒家最重要的政治伦理信条,是“惟有德者宜高位”,认为执国家权柄之人都应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有德之人,如传说中具有至上美德的尧、舜;这样的人对“天”负责,秉承上天意志,为民立极,化育苍生,具有“大公无私”的至上品德。汉代董仲舒总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不仅以“君权神授论”为“君权神圣”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也强化了君主代表最大“善”与“美德”的观念。这种思维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借助于皇权制度的强力灌输,成为人人接受的信条。

儒家政治伦理中这种以“应然”为立论基础的“君主向善论”,造成国人政治伦理思维上的逻辑倒置:不管夺取权位者道德如何败坏,只要夺取大位,就天然地证明其具有“美德”;也不管掌权者如何由原来的自我克制必然地走向腐败,只要继续控制大位,就天然地证明其一成不变地具有“善”与“美德”,以及执掌政权的天然合理性。于是,“天王圣明”成为当然的政治思维起点,不可怀疑的信条。在“天道”观念支配下的政治伦理中,不仅“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具有神圣性,

就是代表皇帝意志行事的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也具有神圣性。两千余年来，儒家“权力神圣观”与皇权专制制度就这样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传统政治在本质上是“外儒内法”。谭嗣同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可谓不易之论。所谓“秦政制”所体现的政治伦理的最大特征，是对君权的神圣化。君权的腐败倾向，即所谓恶之“势”，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是无从谈起的；不仅如此，君权实际存在的恶德与恶行，在神圣化中被强化为天然特权，权力集团的权力也被强化为天然特权；其次是将“人性恶”作为制度设计的伦理前提，彻底抛弃了对人性善的信任。所以，以法家政治伦理为治国要道者，无不奉行严刑峻法、暴行酷政，从根本上对民众行为实行“有罪推定”。“外儒内法”政治伦理的最大特征便是，坚持“权力神圣观”的同时，极力坚持对民众行为的“有罪推定”。

“权力神圣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互为支撑。中国前现代的农本社会是以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等级为社会主干的。在这四个等级中，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构成“劳心者”阶级，而其余三个等级（农、工、商）构成“劳力者”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构，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形式。在这个以稳定为追求目标的社会结构中，工商等级在传统“重农抑末”基本国策下难以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而存在，而只能是与农民处于同一阶级范畴的力量，其情感伦理与农民阶级大同小异，同属于一个范畴。因此，严格说来，传统农本社会的阶级力量，无非是“治人”的皇帝与士大夫阶级，与“治于人”的农民阶级。

在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皇权”，皇权不仅在权力集团看来是神圣的，而且在被统治者眼里也是神圣的，都是“神圣权力”。生活在皇权统治下的民众，一旦位置转换，落到自己头上的皇权也必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物。朱元璋与李自成、洪秀全的功业在结局上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理想是完全相同的。

被统治者尚且如此，统治者更不会轻易放弃美化神化自身的努力。所以，1946年2月6日

《新华日报》社论抨击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提出了充满现代意识的主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制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

“权力神圣观”对抗“权力腐败论”：当今中国社会改造面临的难题

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性善论、性恶论及“无善无恶论”（善恶共存论），三种学说表面上看似相去甚远，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观察。儒家看到了人类具有同类相惜、相互顾恋的一面；法家看到了人际关系中，人类所具有的“自我优先”本性，即人类本能欲望的存在。告子的“无善无恶论”的着眼点则是人性变化的外在条件，实际上包含性善论和性恶论两种观点，故也可称为“善恶两存论”。

实际上，较之性善、性恶二论，“善恶两存论”更符合道理，也更符合实际。告子的比喻：“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与基督教所谓人性“半是魔鬼，半是天使”的观点，可称作互相映照的精妙之论。《大学》所谓：“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说的正是人性的可善可恶。

承认和接受“善恶两存论”，人们可以很自然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的蔡定剑

○ 李 蒙

宪政就是民主法制

2010年11月23日，蔡定剑辞世的第二天，程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给蔡定剑的手机发出了一条短信——

“定剑你好！《财经》给我信箱的头条是：‘世上已无蔡定剑’。我说：不对！你在世间永驻，高举宪政的大旗！定剑你走好！”

得知蔡定剑逝世的消息，已经74岁的全国

地接受“权力腐败论”，明白和认识到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在这种“腐败力量”面前，即使是以道德高尚而为民众推举出来代表公众利益的人，一旦与权力结合，也必然面临权力催生的欲望扩张，从而产生腐败；人类后天养成的“德性”，虽然可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在大敌当前）成为对抗欲望扩张的因素，但通常情况下，“德性”不可能成为抵抗欲望洪流扩张的坚不可摧的力量。孔子说“未闻好德如好色者也”，说明后天养成的德性无法与与生俱来“天性”所对抗。

作为潜在腐败力量，控制权力的任何人或集团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一种神圣力量，都没有资格断言自己是永远正确的力量，更没有资格强迫民众承认它与腐败无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开眼望世界的历程。在率先建立近代社会制度的西方列强压迫下，存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及其文化面临空前未有的挑战；20世纪初叶以来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文化自觉运动，以蔚为世界潮流的“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展开对旧文化传统的强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怀着凄怆的心情要去参加蔡定剑的遗体告别仪式，嘱咐告知他蔡定剑逝世消息的一位同志，一定要及时通知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地点。可到了11月26日中午，程湘清上网才发现，蔡定剑的遗体告别仪式已经举行完毕，他很遗憾。他是很想最后送别这位老同事、老部下、老邻居，这位在宪政研究领域拼搏不息、始终不渝的好朋友。

不久，程湘清和同事一起去看望一位多年从事法制建设的老领导。一位老同志问这位老领

烈批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伟大事业。然而，传统政治思维中的“权力神圣观”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对于被当今世界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限制官员腐败行为的阳光方案——财产申报制度，虽有人大代表呼吁多年，至今仍难于推行。我民族两千余年“权力神圣观”传统政治伦理的熏育，养成官员对“权力腐败论”以及由这种观念派生的任何制度约束的近乎本能的排斥与抗拒。

作为皇权制度下的政治伦理，“权力神圣观”对我民族而言是一份极为沉重的负面遗产。可以断言，若“权力神圣观”一日不消，则“权力腐败论”无由深入人心；若“权力腐败论”不能深入人心，则权力制衡制度就缺乏法理依据和群众心理基础；若“权力制衡”制度不能确立，那么，权力的嚣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遏制。在嚣张的权力的面前，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则断断不可能得到保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完成，固然需要众多必要条件，而“权力腐败论”的确立和深入人心则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导：“您还记得有个蔡定剑吗？他最近去世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老领导说，“我记得这个人。”他详细询问了蔡定剑英年早逝及社会各界对他隆重悼念的情景，为之惋惜。有位同志提及，蔡定剑的临终遗嘱是“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可现在有的人对“宪政”这个词很敏感，怕别人提“宪政”，说提“宪政”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老领导说：“不要宪政就是不要民主法制，宪政就是民主法制。当然宪政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要的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宪政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

提及“宪政”，程湘清说，“在我个人的理解，民主的内容有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民主的形式一般没有阶级性，有共性。不能因为民主内容的阶级性就反对民主形式的共性，就忌讳民主，忌讳宪政。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

初到全国人大是理论研究的佼佼者

1985年，程湘清从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刘政也是两个月前刚刚从北京通县调来的。副主任还有张虎生和萧榕。张虎生后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萧榕即是邓小平同志的小女儿邓榕。

研究室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建议建立的。他说，常委会的工作班子主要是三个，除秘书处负责会务以外，一个是法律室，系统地研究法律；一个是研究室，研究法律理论和实际情况以及立法经验等。所以一到研究室，刘政、程湘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广揽人才，充实队伍。当时的思路是，要从大学和科研机构引进研究生，年轻人朝气足，条条框框少，敢想敢干敢写。

研究室原来只有三四个人，经过人才引进，一下扩充到78人，这些人都是优中选优精心挑选的。蔡定剑是1986年引进的北大法学硕士，被分在政治组，引进时对他的评价是“理论修养高，写作能力强”。

程湘清介绍说，当时研究室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四项：第一是调查研究，为常委会审议议案和

领导决策提供调查和研究报告；第二是起草领导交办的重要讲话、报告和文件；第三是为“三会”（人代会、常委会会议、委员长会议）服务，主要是做好会议简报、快报工作；第四就是对人大工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理论研究。其中二、三两项是领导交办、限期完成的“热任务”，一、四两项是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自己安排的“冷任务”。研究室对理论研究很重视，认为理论研究如果开展得不好，大家的理论水平提不高，那交办工作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好。“冷任务搞不好，热任务也难完成”。程湘清回忆说，当时研究室理论研究的气氛非常浓，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都很活跃。经常为一个问题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争论时根本不管年龄大小，职务高低，最后谁对听谁的。平时也不许称职务，如程湘清与蔡定剑就是“老程”“小蔡”相称。在这种环境下，年轻干部包括小蔡很快成长起来，既出研究成果，又出人才，这是刘政和程湘清最高兴的事。因为鼓励大家读书、调研、辩论、写文章，所以当时研究室大量出文章出书，而蔡定剑是其中非常勤奋的佼佼者。

蔡定剑到全国人大不久，就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当时在常委会内部，对《村委会组织法》持反对意见的不少，后来拿到代表大会去讨论，反对的意见更多，认为农民不能搞选举，让农民自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政府的任务就无法落实。蔡定剑带着任务下去调研，最后的结论是，村民自治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是应该的，是发展趋势。

彭真同志对这部法律十分重视，他曾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靠两大制度，一是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是基层的人民群众自治制度。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村委会组织法》终于顺利通过。蔡定剑对彭真非常爱戴和景仰，2010年初，他患胃癌病情已经发展得很快，还抱病写出了《彭真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贡献》一文，作为对彭真同志最后的纪念。

理论研究成果斐然

1993年，刘政升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程湘清接任研究室主任，蔡定剑被任命为政治组组

长(研究室设政治组、经济组、信息组和国际组四个研究业务组和一个办公室)。作为政治组负责人,蔡定剑当时承担的工作担子是很重的。在人代会期间,研究室负责编会议简报快报。每次会议要出数百期简报,主要靠夜战,工作人员常常是凌晨四五点才休息。但与事务性的工作相比,蔡定剑更长于写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经常得到领导表扬和大家钦佩,认为他的研究理论性、系统性、完整性都很突出。

蔡定剑的报告一般都比较长,多是洋洋万言。长的有一万八千字,甚至更长。有时还会作数量统计,制作不少图表。程湘清记得,当时研究室有一个专门刊登调查报告、理论文章的内部刊物,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材料》(以下简称“《研究室材料》”)。1993年,《研究室材料》共出了33号,每号刊登一篇文章,蔡定剑就占了4号,超过百分之十二。当时研究室的立法制度系列研究,是由蔡定剑负责抓的,他本人也承担了相当重的研究和写作任务。

1993年,蔡定剑写的第一篇是《研究室材料》第5号刊载的《对表决计票方法的看法》,约两万字。当时,在一次常委会会议上,在表决一个专门委员会顾问的人选时,没有达到通过票数。原因之一是会议缺席人数较多。我们的计票方法和表决制度,要求的是绝对多数。前面提及的那位老领导有一次谈及此事,曾说,我们的“门槛”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有很高的威信,党的主张变成议案通过比较容易,所以门槛高一些,体现了对民主制度负责。

针对这个问题,蔡定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计票方法和表决制度,意味着不到会、弃权和按表决器这三种情况全都成了反对票。他建议,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应年轻化、专职化。缺席率高,主要是因为许多委员岁数大,有的因健康原因难以参会;而兼职容易造成委员忙于其他工作,参会也有困难。他还建议,特别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议案,应当绝对多数通过,一些普通议案,可以考虑相对多数通过。论文中还附录了好多国家在计票方法和表决制度设计方面的图表,资料非常详实。

蔡定剑写的第二篇是1993年《研究室材料》第8号刊登的《立法解释——立法问题系列研究

之三》,约一万五千字。他就立法解释的概念、作用、体制、内容、程序和技术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探讨。第三篇是《研究室材料》1993年第20号刊登的《地方立法研究——立法问题系列研究之四》,也有一万五千多字,对地方立法的体制和作用、特点和经验、立法权限和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论证。第四篇是1993年《研究室材料》第23号刊登的《立法监督——立法问题系列研究之五》,该文长达两万字,全面论述了立法监督的概念、内容、方式,并对如何完善立法监督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转过年,蔡定剑又在《研究室材料》1994年第17号,发表长文《我国立法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成就》,这个报告应该是对立法制度系列研究的一个总结,具有相当高的理论和应用含量。

仅仅是完成这几个报告,其工作量就是艰巨的,但这只是蔡定剑一年工作中的一部分。

精释宪法功垂后世

蔡定剑勤奋努力,学术研究成果突出,被世人誉为“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1993年,程湘清跟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曹志去日本访问考察,在日本议会大厅,议会的工作人员拿出一本书给他看,是蔡定剑的《中国人大制度》。程湘清非常自豪地对曹志说:“您看,作者就是我们研究室的小蔡,他的书已经成为国外了解中国人大制度的必备书了。”

2000年,程湘清曾让蔡定剑搞一个统计,研究室这些年到底出了多少书。蔡定剑统计了理论著作部分,是39本,并写了目录。程湘清又将其他方面的著作进行了统计,共计63本。

其中,程湘清特别提到《中国宪法精释》这本书,是由研究室政治组编写的,蔡定剑任主编,蔡定剑、汪铁民、高国政、胡维翊撰稿,最后由蔡定剑统稿。

这是一本不足300页的小册子,封面设计非常一般,色彩也颇黯淡,1996年5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版,只印刷了5000册。似乎毫不起眼,但在程湘清看来,要想研究新中国的历次宪法修改,这是一本很珍贵的书。

此书由程湘清作序,他在《序》中写道:“本书

以比较翔实的史料公开披露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精心设计、精心制定我们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程,以及其后宪法随共和国的发展而修改的历史沿革。”“本书以当时制定或修改宪法的原始资料,对宪法条文的意义和特定背景,以及条文中的重要和关键性词、句进行立法原意的解释,因而对准确地理解宪法本意乃至实施和执行宪法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这本书引用的资料,相当多来自中央档案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档案室,以至于许多资料的来源注释因为需要保密而都没法加注。在程湘清看来,蔡定剑钻研问题比较深,比较透,胆子也比较大,他曾说过“这没什么嘛,既然是要对宪法进行精释,要让人们了解宪法的本来意义,自然就应该从第一手资料谈起。既然宪法不保密,制定宪法的过程也没必要多么保密。”

这本书披露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细节。例如1982年《宪法》第五条有一句话:“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书中解释这句话时写道:“为了使这一条的内容更加完整,就在全国人大通过宪法的前一天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增加‘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句话。”当时是刘志坚将军提议要增加这一句话,彭真委员长在《宪法》即将通过的前一天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将这句话写入《宪法》。这其实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提供了充足的宪法依据。

2009年程湘清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曾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中的七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1982年宪法具体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度”。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在《中国宪法精释》一书中,对此有非常清晰的阐释。它写道:“民主集中制这一提法,在我国用了几十年,但它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前几部宪法都没有一一列举。”此书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此书在阐释1982年《宪法》第57条时,提及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执政党的关系,并引用了毛泽东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曾把全国人大形象地比喻成“如来佛”。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书中写道,“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它必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加以领导,以便带领全国人民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但这种领导只能通过提出正确的主张和政策,使人民群众包括各级国家机关接受这种主张和政策来实现。在极‘左’时代,这种领导被理解为党直接对国家发号施令,代替国家机关活动。”这段话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宪政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加强党的领导重要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说明,党的领导并不脱离宪政。

如果当时蔡定剑等人不编写这本书,书中的不少史实资料可能至今还鲜为人知,历次制宪修宪时的原意和讨论一些条文的主要意见,可能就很难为公众知晓了。此书对宪法条款中重要的和关键性词句的精确阐释,也为后来的宪法学研究夯实了基础。可以说,这是一部阐释宪法的难得著作,后来有关宪法的各种书籍包括教科书,往往都是以此书为参照蓝本的。

参与立法起草和支持违宪审查

程湘清回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法工委来完成,研究室具体参与的只有两部法律:一是人大监督法,二是人大代表法。《监督法》直到2006年才出炉,但是,蔡定剑率政治组参加起草初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执法检查规定》”)在1993年已获得通过。执法检查是各级人大进行法律监督的主要方式,这是人大监督方面一项重要的单项法律。

对于2006年出台的《监督法》,程湘清后来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的学术研讨会时,与同样受邀参会的蔡定剑相遇,两人交换过意见。他们都认为,这部《监督法》确实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法律在制定阶段应

该充分地讨论,大家都发表意见,而一经生效,就应该认真组织实施,应该多找优点,看到优点。程湘清认为,《监督法》有三大亮点,一是规定了监督反馈制度;二是对计划预算监督规定了重点审查;三是第一次对“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备案审查。这三个优点当时得到了与会者的公认。

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是实施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强调“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在新一届党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安排学习宪法时,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加强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坚决纠正各种违宪现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与此同时,全国瞩目的孙志刚案发生。作为一名在职公务员,蔡定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观点,支持三位北大青年学者提出的违宪审查建议。蔡定剑有一个观点,“宪法是拿来用的”。应当启动“违宪审查”。程湘清认为,违宪审查的核心,在于通过纠正违宪现象确保宪法的有效实施。加强对违宪行为的检查监督,待条件允许时依法进行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必要的。

成就品德垂后世

从1986年到2003年,蔡定剑在全国人大长达18年的工作历程,为他毕生的宪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湘清认为,在全国人大这么长时间的经历,使蔡定剑具备了一般学者很难历练出来的学术眼光,看得更深、更透、更远。他思考问题的视角要比一般学者更宽广,更切合实际。

全国人大的各项立法工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使蔡定剑每天都能接触到国计民生中的实际问题,使得他的研究总是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得很紧密。

在全国人大“苦力”般的常年超负荷的工作和研究,使蔡定剑养成了非常勤奋的习惯;人大工作无小事,任何细小的失误都可能酿成不小的政治事故,因而也培养了蔡定剑非常严谨扎实的

学术品格;也只有在全国人大机关,他才能直接接触到那么多第一手的立法资料,获得了一般学者无法拥有的学术研究条件。

当然,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如果没有蔡定剑本人的勤奋努力,那也肯定不行。在全国人大,日常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如果坐不下来,钻不进去,那就出不了成果,必须有决心坐冷板凳,下苦功夫,思想活跃,还不能出格,才能成大器。如果蔡定剑没有在全国人大的这段工作经历,他的学术成果,他的理论水平,他的影响,肯定达不到今天的高度。

2004年,蔡定剑离开了全国人大,去了中国政法大学。程湘清说,像蔡定剑这样长于理论研究的宪政学者,当初来全国人大,是适逢其时,是历史的机遇和个人的幸运。而在工作了18年后离开全国人大,也是“得其所哉”,因为作为公务员,一般不太允许发出个人的声音,带有个人的色彩,而到政法大学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蔡定剑的学术个性就可以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后来,程湘清参加学术会议时遇到蔡定剑,对他离开全国人大后的研究成绩表示赞赏。同只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学者不同,蔡定剑的研究都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像拆迁问题,就业歧视问题,公共财政预算公开,公民参与立法,都与宪政研究有关,也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参加蔡定剑遗体告别仪式的上千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与蔡定剑素不相识,有的人打出一张纸,写着“蔡教授走好,拆迁维权人士感谢您”,“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贡献”,从中就可看出他与一般学者的不同之处,也是他的感人之处。

程湘清说,在全国人大时,蔡定剑是一位学者型的公务员,而离开全国人大后,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心系国计民生的学者。从事宪政、公法研究的学者,如果没有勇于担当心忧天下的情怀,没有脚踏实地推动制度建设的实践精神,终日闷坐书斋,苦心孤诣,或者脱离国情,盲信国外,都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也是难以感动人民、走入历史的。蔡定剑逝世后引起的巨大轰动,就是人民给予他的高度赞誉,也必将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 萧 徐)

胡耀邦与裴昌会信义相交

○ 胡德平

我在四川省南充市生活过两年，从1950年到1952年夏天。那时共和国初建，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工作的老同志都十分亲热，工作夜以继日，建设百废待兴，马上的军旅生涯还未完全结束，马下的建国任务业已开始。老同志中有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军将领，也有晋绥根据地的地方领导。原南充地区的老同志四十年间和我家来往最多的就是裴昌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一位原国民党起义将领。

裴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青年时投军孙传芳的队伍，后被上官云相赏识提拔。抗日战争中驻军山西、河南，和陈赓、陈锡联、孔从洲（原名孔从周）的队伍均有合作抗日的佳话。

1949年12月23日，国民党七兵团裴昌会中将司令官率部在四川德阳起义。第二天，耀邦同志和裴昌会将军即有一次倾心的、互有魅力的对话：

胡：“我们的来意，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心扉吧！”

裴：“没有什么疑难求教，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觉得在秦岭、广元、剑门关三次起义不成，有负你对我的期望，推迟了三个多月，似有非到兵临城下不低头之嫌。”

胡：“这没有可嫌的，你在蒋胡嫡系队伍中的处境，我们都谳知，早已向你传过口信，请你慎重相机行事，不要过于冒险，这话你应当记得。现在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

在父亲的眼中，裴将军一旦认清光明的前途，就愿向正义之师输诚，承诺起义，便绝不失信！以后又引出刘伯承主席一段知人善任的故事。当裴将军要求到地方工作时，刘帅亲切地说：“你同耀邦同志熟悉，就到川北行署去工作吧！”

从此俩人便结下终身友谊，成为真正的同志。

据我所知，父亲对裴老的工作、经历和要求有三次遗憾，甚至是痛心疾首的遗憾。

一次是1952年，四川地区四个行署撤销，父亲调往北京工作。裴老时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工作愉快，与党员副厅长韩培义合作极其融洽，现在则分配到西南纺织管理局工作。分手之际，父亲对裴老说：“现在组织上分配你到西南纺织局做局长，按你的级别是安排低了。”“你管纺织不是内行，要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要做到做什么，就爱什么，爱什么，就要做好，做到底。”以后两人每次在北京相见，父亲总要问裴老：“党要对你负责到底……是否想到中央来，我可以替你转达。”裴老则一直说：“我纺织没有学好，还不愿离开。”

第二次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年初，裴老来京参加四届人大。昔日身体修长、有着军人仪态的裴昌会在“文革”中严重致残，走路蹒跚，行动不便，但仍笑容可掬。父亲还未彻底“解放”，没有工作。他仍丝毫不介意地请裴老吃午饭，虽然他的处境比裴老还不如，席间居然还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裴老也听之欣然，答之陶然。散席后，父亲对我和妈妈说：“文化革命，对人不起，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真对人不起！不要说哩，裴老是旧军人，有些旧军人还有些旧道德哩！知道做人的道理。他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有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感叹唏嘘之余，又忍不住说了好几句“真对人不起！”

第三次是1987年，裴老萌生了到香港探亲或定居的念头。因为1949年裴昌会驻军秦岭一带时，蒋介石把裴全家劫持空运到台湾作为人质，裴老一家骨肉分离，长期无法团聚。一个有着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共同祖国的民族是不能长期被人为分割的。1983年，裴老夫人的八妹立下

遗嘱后，从台湾回祖国大陆探望裴老。有关部门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她。裴老小姨的祖国大陆之行很快在台湾的军政系统传播开来。裴老此时想到香港探亲，既为亲人，又为民族。但他拿不准。特意请他的孙女裴丽珍带话给我，让我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又似沉吟，又似成竹在胸地说：“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文革’时，很多人搞裴老的外调材料，找到我，我一直这样说，解放前的裴昌会死掉了，起义后的裴昌会一直跟党走。他有亲人在台湾，他们可以在香港见面嘛！”

1997年10月10日，裴老孙女裴丽珍同志到重庆渝州宾馆看我，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双方谈起往事，我了解两家的交往远没有她多。她告诉我，耀邦伯伯有次和她谈话，谈到长辈们的交往，耀邦伯伯说：“为何和你爷爷是好朋友，而且长期保持友谊呢？因为我们俩人都守信用。你爷爷起义，我和他见面最早。当时，我就向他表示，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我作为中共代表一定对你关心、负责，并要关心负责一生。我作为共产党员说话算话，包揽到底。而裴老自从起义那天开始，就没有说过一句反共的话，一直跟党走。他也守信用。不管哪党哪派都要守信用。”

还是丽珍同志告诉我：“国民党部队中，有个叫李振的官长，他是叶剑英元帅策划起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写了信，交给裴老，请裴老转交耀邦同志。裴老郑重把信面交耀邦同志后，首先打破沉寂说：‘耀邦同志，怎么党组织到现在也不考虑我入党的问题，是我不够条件，还是死后追认我？’耀邦同志说：

‘开玩笑，怎么不够条件？你早已是自己人了。作为你来讲，有国内外的影响，都是党内的人对事业不利，你在党外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我会想到这事。’”双方的谈话似乎在开玩笑，但谁都没有笑。

对裴老关心的老同志很多，据我知道的就有杨得志、余秋里、廖汉生等人。

1989年，四川省委在杨汝岱同志主持下，批准了裴昌会同志的入党要求，并报中央组织部备案。国内外报纸对此均有报道。这为两位故去朋友的守信用、讲信义的交往作了最好的注解。■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二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528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杨士杰人生的两件大事

。 杨荣甲

早年的革命活动

我的父亲杨士杰，1911年生于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杨只东村。1930年考上了官办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师范学校虽为国民党政府所办，里面却有不少共产党员。1931年“九一八”之后，父亲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于1932年正式转为共产党员。在校期间，父亲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同反动势力斗争的学生反帝救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导致发生了震惊全省的“二师惨案”。惨案发生时，父亲因放假正在家里，听到学校的革命同志受困的消息，立即赶回了学校，积极参加了上街示威游行、营救被捕同学的活动。与此同时，父亲还参与了在定县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并于1932年被任命为定县第一任县团委书记。1932年11月，他带领党团员在县城配合中共定县中心县委发动的两万余人参加的反帝、反封建大示威（《中共河北省定州组织史资料》，第32页）。1933年5月，他又带领全县党团员开展了扫盐斗争，发动数十万群众把扫盐斗争推向高潮，迫使国民党的县长撤销了禁盐令，允许农民有刮盐土、熬硝盐、食硝盐的自由（杨士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定县的建立与发展》，载《定州市党史资料》第一期）。该年6月之后，国民党政府对京、津、保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大清剿活动，父亲受到通缉，只得离开家乡，辗转于几个城市。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父亲返回了家乡。9月，他代表定县党组织与115师骑兵营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便赶回宿家佐，在他的战友李济寰家参加了定县县委会议，传达了接头情况，研究了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11月，父亲与地下党员杨银山组建

了一支抗日武装，该武装发展很快，被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命名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四支队”，主要活动在定县、唐县、望都等地区，开展了动员参军、收缴地主武装、摧毁敌伪据点等活动。1943年1月，父亲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副书记兼易县中心县委书记，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曾消灭敌伪多人。在李济寰及父亲等同志主持工作的定县一地涌现出了杨银山、甄凤山、郝庆山、刘文正等多名威震全省的抗日英雄模范。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父亲调任晋察冀第一地委书记兼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政委（司令员杨成武，后为肖应棠）。

1949年1月，父亲调至张家口市，任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后任省委第一副书记（省委书记杨耕田，后病故）、代理省委书记及省军区政治委员，开始了解放后的政治生涯。

关于“鞍钢宪法”

1955年的秋末冬初，父亲正在山西省委第三书记的任上（第一书记陶鲁笏）突然被中央调至辽宁省鞍山市任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去主管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鞍山市当时远比今天的地位重要，钢产量约占全国钢产量的一半左右。此时的东北，正值中央处理了“高、饶反党集团”之后，鞍山市的领导层受到了波及，几位主要领导已调离了岗位。在鞍山工作期间，“他经常深入厂矿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带领机关干部下厂参加劳动，他不仅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还提倡培养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刘澜涛、杨成武、陈野苹、刘杰、孙敬文、杨克冰文：“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楷模——回忆杨士杰同志”，《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9日，第五版。）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中共中央决心自己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来。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杨克冰：《追求与奋斗》，280~281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杨当时是市委书记处书记）。“6月21日，毛主席说：干脆，今年的钢铁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8月17日至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并号召全党全民总动员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同上）。毛主席在会上还说：“三令五申，凡完不成任务和有铁不拿出者，要执行纪律。”（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对中央的决定，以父亲为首的鞍山市委，在当时必须贯彻执行。

鞍山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超负荷工作，完成了1958年、1959年的生产任务。但“大跃进”之后遗留的问题不少，使生产受到了影响。“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主张大搞群众运动，提出发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会克服生产技术中的任何困难，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必须广泛地深入地发动群众”（杨克冰：《追求与奋斗》，285页）。1960年3月，“在杨士杰主持下，经过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集体讨论，由鞍山市委向辽宁省委和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的具体执笔者是市委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罗定枫和两位市委副秘书长傅树仁、殷恕。“报告中总结了运动的三个特点。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运动进展很快。二是广大职工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重大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三是促进了生产持续跃进……报告同时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二是放手发动群众。三是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四是自力更生与大协作相结合。五是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同上，第286页）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1960年3月22日，他对报告做了600字的批示，将报告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并将管理工业大

企业的方针主要概括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之相对应的是毛泽东称作的“马钢宪法”，即前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钢厂实行的“一长制”。

上世纪50年代是党的指导思想变化很快的时代。就在几年前，毛主席还叫鞍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毛泽东：《给鞍钢全体职工的一封信》，1953年12月25日。）。但几年之后苏联那一套就全错了。凡是坚持以前的作法，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不同意高指标的人就会受到批判。对鞍钢领导层中个别领导的不同意见，父亲曾根据上级的指示对之进行了批评和斗争，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不应该的。父亲在鞍山工作的七年间，大刀阔斧，做了不少事情，也在“反右”、“大跃进”等问题上执行当时“左”的方针犯有错误。经过了“文革”，经过了深刻的反思，父亲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道：“进城后到1961年，搞了几次运动，有的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我是坚决积极的执行者。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我是首当其冲主要负责的。”（杨士杰：《整党总结》，1985年3月8日。）

几年前我看到，有人曾撰文称，“鞍钢宪法”是毛主席对鞍山钢铁公司的报告做的批示，不提鞍山市委。毛泽东的批示一开始就明确写道“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等等。

“鞍钢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前按照毛泽东思想及党的一贯方针对管理大工业企业经验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

1958年前后，在那“大跃进”、“以钢为钢”的年代，我党、我国曾干了大量违背科学的蠢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经济的倒退，但对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说那又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火红的年代”。就以父亲为例，他态度坚定地执行了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第二炼钢厂蹲点，每周参加半天劳动。市委书记处的书记每人也都下一个厂矿去。每逢除夕、年关，父亲都是在高炉或平炉旁与工人在一起，为当班的工人包饺子，一同吃年夜饭。在家里的办公桌上装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直通中南海。在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彭真同志几乎每天都打

电话来询问前一天钢、铁产量的具体数字。其紧张的情景，就如同战争年代正在进行一场命运攸关的大战役一样。工人们在当时表现出的冲天干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令人难以忘怀。这种干部联系群众、工人以厂为家的人文精神及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办法，曾颇受国外一些同行的赞许与仿效。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将一个工作总结提升到“宪法”的高度，显然有其个人的用意，即他要坚持“大跃进”以来的“左”的路线，要继续不断地反击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国家继续沿着“左”的路线发展下去，导致后来发生了更不应有的悲剧。

在历史关头冲锋陷阵

多年的劳累终于导致父亲大病一场。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昏厥了过去，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几个月不能动。到“文革”以前，父亲以顽强的毅力，每日坚持锻炼，终于能走上几里地了。

“文革”初期，父亲还是带病之身就被中组部贴大字报给“轰”了出去，被揪到鞍山接受审查，挨批斗、住“牛棚”、下干校。到1970年中，经审查无问题后又回到了北京，成了由中组部管辖下因病休养或待分配的老干部支部中的一员。“文革”的倒行逆施教育了很多人，父亲也不例外，他对“文革”中“四人帮”害党、误国的罪行深恶痛绝。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各地、各部门“文革”中追随“四人帮”的各种势力却仍在负隅顽抗。特别是在中组部，以郭玉峰为首的部领导听令于“四人帮”和康生的指示，干了大量的坏事。例如，“文革”中，他们曾把1133名八大代表、候补代表中的697人、115名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的61人、159名

四届政协常委中的85人都打成了“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他们对“冤假错案不纠正，对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不解放，不启用，被流放到外地的老干部也不接回”（袁任远：《征途纪实》，223～22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引起老干部支部（父亲是该支部的支部书记）的极大不满。袁任远同志后来写道：“1977年3月，我和杨士杰、张策三人联名给华国锋和叶剑英写了一封信，通过一位可靠的同志将信交给叶帅，要求中央派人调查中央组织部的问题，改组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但信送出后未见回音，一连写了三封信也未见答复。”（同上）

1977年5月，中组部确定了部内11大代表的名单，老干部支部对其中有的人表示坚决反对，将意见又写成信件上报，仍不见回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拿起了大字报这个武器。又是袁任远、杨士杰、张策三人商量后由张策于9月9日写了第一张题为《向郭玉峰同志进一言》、



中共中央为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发出的部分通知

揭发郭玉峰问题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还有曾志、蹇先任、曹菊如、郭述申、吴岱峰、王学文、曾碧漪、彭镜秋、孙以瑾等十多人。老干部支部一动，带动了另外两个支部，即中组部待分配干部支部和大院内的中监委待分配干部支部，共有近百人。前一个支部的书记是张志杰，副书记是林彬；后一个支部的负责人是李冀、贾素萍。他们很快就写了支持老干部和揭发中组部领导的大字报。三个支部很快拧成了一股绳，成了一个颇有战斗力的集体。老干部中的袁老、杨士杰和后两个支部的四位负责人每周在袁老家秘密碰头一次，商量分工合作写大字报的问题。与此同时，父亲联系了人民日报社的王泽民，由他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为六部分写成特刊直送到了最高领导那里。

直到这一年的12月中旬，这时距父亲等人给中央写信已过了9个多月，距他们写第一张大字报已过了近100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华国锋主席将材料批给了汪东兴，让汪代表中央负责处理此事。12月11日，汪东兴先接见了郭玉峰。之后，他又接见了袁任远、杨士杰、曾志、郭述申。汪对四人说，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已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今后，还要依靠你们出大力（杨士杰：《对照检查》，1984年6月29日）。

大约是12月15日，中组部的广大干部终于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中央决定免去郭玉峰的职务，任命胡耀邦为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组部的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准备了大标语，贴到了组织部的大楼上，外面很快也知道了，外电很快做了报道。大家敲锣打鼓，放鞭炮（聂荣臻夫人张瑞华等不少人买了鞭炮），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热烈拥护胡耀邦同志来部主持工作”（笔者于2010年8月31日与张志杰的谈话）。

胡耀邦上任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人们，使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使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动力。

在“右派改正”问题上打先锋

胡耀邦入主中组部之后，父亲也被任命为副部长。1978年春，在山东烟台召开了专为解决

“右派问题”的会议。会议由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这时，部内新的领导班子刚刚组建不久，胡耀邦委托父亲去参加这次会议。父亲立即带了临时作为秘书的陈文炜同志去赴会。

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不久，当时中组部的一些领导和干部就察觉运动中存在不少问题，对一些报上来的材料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少定案的材料有断章取义的情况，且打击的人中不少人是有能力、有水平，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的人。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后因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使这一认识和与此有关的工作又拖了3年），当时的中央终于在1962年对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等同志提出的“关于安置已摘右派帽子的人员和右派分子的意见”做出了回复，决定“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1962年8月17日。）

在烟台会议上，绝大部分与会者不无理由地持上述观点，但父亲在会上的发言独树一帜。他特别强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对过去定的“右派”，凡是搞错了的都应当予以改正，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应当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他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过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他还补充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表示，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党的财富，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财富，在对他们的问题给予改正和摘帽后，更应给予妥善地安置，以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这次会议，虽不是一次很高级别的会议，但影响很大。由于会议的结果涉及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政治前途，据说会场外面经常聚集着不少关心会议进展情况的人。父亲在会上的发言很快传了出去，人们将他

的发言内容油印出来到处传送，家中有被打成“右派”的人或亲属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父亲在会上的讲话和者甚少，反对者甚多，甚至有人说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会议结束时，只以牵头的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汇报提纲”，提纲坚持1962年“回复”所做的结论。对这个“汇报提纲”，杨士杰和公安部的凌云表示保留意见。

烟台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回到北京后，在一些同志（袁任远、胡绩伟、安岗、王泽民、付真等同志）的支持和建议下，由参加会议的陈文炜写了一个反映烟台会议情况的材料，经杨士杰签字后直接送给了统战部。与此同时，杨、陈二人又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表示完全赞同材料中的看法。之后，胡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研室的同志以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报告，请中央就此问题重新定断。（同上，第10页）

报告上去了三个月之后，又经多次询问，上面终于有了回音，决定还由烟台会议参加的五大部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会议开始时也展开了一场争论。会上有人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一一清账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甚至表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是就忙得乱套了吗？杨士杰在会上认为，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正过，都是分清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同上，第11页）

民族饭店会议总的说开得比烟台会议顺利，父亲等人的意见很快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支持，较快形成了一致看法，中央高层肯定了会议提出的意见，导致产生了1978年9月17日的中央第55号文件，决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一文件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它使差不多数百万人（“右派”及其亲朋等）在20年后终于脱离了苦海，迎来了新生。

“右派”改正工作是冤假错案平反这个“大工程”开场的重头戏。在此之后，父亲还协助胡耀邦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他曾建议：十年“文革”积案如山，等待审查结论的干部每

个部都有千人以上，许多干部审查了十年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问题。要采用现在的审查方式，靠专案组一个一个地审查，再审十年也审不完。这种方式必须改变。要相信95%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充分发动群众，先让受审查的人自己讲自己的问题，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没有问题的应立刻解放，分配工作。十年没查清的，先分配工作，不能让他们再等十年，就算有问题，将来查清楚了再处理也无妨……父亲的思想打破了旧的框框，加速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

在为“右派”改正的工作期间，林希翎曾找到家里，她质问父亲为什么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大闹一通”。我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父亲提出这一问题，父亲避而不答。我对父亲说，即使林当时说过很错误的话，我们给人家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已经20多年了，人家的大好青春完全葬送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不给人家改正呢？更何况，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本来就不应当以人的言论和思想定罪嘛！父亲听了我的一番话，没有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是她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为她改正。”我不再说什么了，我知道，父亲的组织观念很强，他不会透露上面决策的情况。我后来也了解到，父亲同意并支持了上面在“右派”改正问题上的总的指导精神。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30年，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然停留在原地未动。

父亲不是完人，工作中有了错误，只要认识了，就会勇于改正。在他主持为“右派”改正工作时，他曾不止一次要鞍山来的同志回去以后一定要代表他向在他主持工作时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特别是市委内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真诚的赔礼道歉。父亲从不为家人和身边的人谋私利，从不为名、利、地位所累。据说，凭他的资历和职位，退下来时，中顾委的榜上有名，但他将自己的名字划掉。在他去世后，他的老上级刘澜涛曾对人说，杨士杰是晋察冀、华北的老同志中最值得尊重、怀念的同志之一。■

（责任编辑 萧 徐）

国际问题评论员蒋元椿

○ 钱江

半个世纪前朝鲜停战谈判阶段，署名“江南”的新华社新闻述评，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报界人称：“作者为江南才子。”这些著名述评的主要作者，是新华社国际部资深编辑蒋元椿。改革开放后，他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导师。

因停战谈判新闻述评出色，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同样报道出色，蒋元椿被新华社授予当年“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年新华社社内报纸《前进报》这样介绍蒋元椿的勤奋和高产：1953年，蒋元椿担任朝鲜停战谈判报道组组长，平均每日签字发稿3.7万字（其中经他本人编辑稿件也达2.1万字）。他还平均每月撰写1500字以上篇幅的文章（主要是新闻评论）20余篇。此外还撰写一定数量的新闻报道。

这些评论和报道，有相当部分经过总编辑吴冷西修改，再送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总理签字的清样退回之后，蒋元椿下班，常常已是清晨3点或4点。那时的蒋元椿从来没有休息日的概念。

在才子荟萃的新华社编辑部中，蒋元椿是出名的快手，文思敏捷，下笔成章，一时传为美谈。1955年初，原任周恩来总理新闻秘书的杨刚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她点名将蒋元椿和李慎之调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评论员。新华社总编辑吴冷西不放，经过一番周折来了个折中，李慎之留在新华社，蒋元椿来到人民日报社。没有想到，这成了蒋元椿一生的转折点，两年后他被划为“右派”，蹉跎20年。

“江南”才子浙东来

蒋元椿，1920年10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父亲早年在汉口一家银行当小职员，薪酬仅够糊口。后来，父亲当上了家乡一家商店的经理，又与

人合作经营一家绸布店，家境慢慢好了起来，但供不起3个儿子同时上中学。在3个孩子中，老三蒋元椿学习成绩最好，于是两个哥哥小学毕业后去当学徒，蒋元椿进了中学。

蒋元椿功课优秀，由于成绩好，学期结束时他得到了作为奖励的几元钱书券，用来买下的第一本书就是同乡鲁迅的《彷徨》。

1937年初夏，他来到上海读高中，他的心灵被抗日救亡运动触动了。正在这时，抗战爆发。在政治对比当中，蒋元椿最终选择了共产党。1940年2月，他在浙江丽水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久后“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丽水的中共党组织受到打击，蒋元椿失去组织联系，辗转来到广西，当了两年的中学数学教师。他于1943年在桂林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

两年后抗战胜利，蒋元椿和女友孙卉一起北上，于1945年10月来到河南南部的新一军李先念部，投笔从戎。

1946年6月，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原部队鏖战突围。蒋元椿编入战将皮定均旅，向东突围。皮定均的指挥非常成功，全旅官兵建制完整地进入了华中解放区。但蒋元椿的恋人孙卉在突围激战中不幸牺牲。

在华中战场，蒋元椿走进了新闻记者队列，曾任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线分社编辑。1950年底，蒋元椿从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调到北京的总社，在国内军事组编辑来自朝鲜战场的稿件。1951年夏天调入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专门从事朝鲜战争报道。

一开始，蒋元椿以编辑工作为主。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他越来越多地撰写国际评论。1953年6月，非常赏识蒋元椿文笔的吴冷西要他专用一个评论员笔名。恰好蒋元椿正用着一支“江南”牌钢笔，就取了“江南”这个笔名，集中发表关于

战俘问题、政治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重大事务的述评。这些新闻述评在当年影响重大，蒋元椿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

墙报文章《论“圣旨口”》

1955年4月，蒋元椿调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视野变得更加宽阔。5月，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蒋元椿前往华沙报道了会议。归国后不久，他担任了国际部东部部主任，主管中东事务报道。1956年底到1957年2月，他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埃及、叙利亚。这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最后一次出国。

中东归来不久的蒋元椿，迎来了1957年春天的“整风”。这年4月10日，毛泽东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说以邓拓为首的编委会犯了错误，其中包括执行中央决策不坚决，这就促使人民日报社投入整风“引蛇出洞”而特别加大了“鸣放”力度。

蒋元椿本人在长期工作中察觉和积累了不少对新闻报道的意见。和他一起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社、此时任副总编辑的黄操良有许多看法和蒋元椿相同，黄甚至出主意，在国际部办公区走廊里办起了墙报，起名为“呼风唤雨”，本意是响应党的整风号召，帮助党整风。黄操良找到蒋元椿，要他“带头”为墙报写文章，提出意见。

看到《人民日报》5月2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述了关于开展整风的决心，再加上报社已于5月6日成立了由社领导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看来这回的运动必然向纵深发展。蒋元椿本来就善于思考，此时更是有感而发，于是一气呵成写就一篇《论圣旨口》，写出后即交给黄操良过目。

黄操良看了非常满意，说墙报正等着稿子，立即吩咐把文章贴到5月20日“呼风唤雨”墙报的第一期上。

文章贴出，一时间观者如堵。这篇文章文辞犀利地写道：

皇帝老子是没有了，“圣旨口”却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

所谓“圣旨口者”，就是只有他说了算数，不由你分辨，也不容人提意见。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20世纪80年代，蒋元椿在印度

在我们这里，照我看来，大大小小的“圣旨口”不少。

并不是有人存心想当土皇帝，做“圣旨口”。不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味道是很足的。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个人崇拜，盲目崇拜权威，使得某些领导人被捧成了“圣旨口”。

只要某个领导人嘴一动，大家就洗耳恭听，急忙记在笔记本上，向来照办无误，不管这位领导人的意见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灵活处理，反正来一个死搬活套。据说，这叫做“组织纪律性强”。

蒋元椿事后多次说明，这篇墙报文章的主旨，是主张领导应该管大事情，其中包括对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人胡乔木提出的意见，希望不要在小事上管得太死，要消除那种只有领导说了算的做法。

他在《论圣旨口》中写道：“这种凭‘圣旨口’办事的作风，已经大大挫伤了下面同志的积极性，鼓励了那种不动脑筋，不独立思考，没有进取精神的懒惰思想。这种懒惰思想，从上到下都有。在我们报社内部，造成了暮气沉沉，而由于一切都等‘圣旨口’，我们就总是等着‘圣旨口’，等他下命令，把编辑、记者和读者的意见，一股脑儿都忘记了，把必须自己来研究政策方针如何通过报道来报道，也都忘记了，这就使我们的报纸落到

了‘紧急状态’的田地。”

蒋元椿还写道：“我觉得，凡是自觉不自觉地当了‘圣旨口’的同志，现在应当适当地封口，除了政策方针以外，不要对芝麻绿豆之类的事情都来插手。第一是要相信群众，第二是不要滥用自己的威信，到处布置清规戒律，第三是要谦虚些。下面的意见，可行者行，不可行者可以争论，可行不可行者不妨试试，犯了错误，也是一场活教育，不要一概抹煞。”

经历了岁月淘洗，当年“江南”的文章，看来大部分确属“新闻易碎品”，后人不复提起，这也是新闻的一般规律。但这篇《论圣旨口》，肯定是作者最重要的篇章，肯定被历史学家征引。

“文章满纸书生累”，用邓拓这句诗形容蒋元椿此后的命运非常恰当，《论圣旨口》带给作者难以言述的苦难和整整20年蹉跎岁月。

文章初上墙报，听到的是一片赞许和支持之声。但是，半个月后风云突变，“反击”开始了。《论圣旨口》马上被看做“向党攻击”的代表作，说文章直接指向胡乔木，因此受到猛烈批判。作者陷入了追查思想根源和检讨错误的大会小会之中，层层加码批判和斗争，一步步将作者推向绝境。

一开始，蒋元椿声辩自己毫无反党之心，对胡乔木也是熟悉的、尊重的，自己是响应领袖号召才落笔的。他承认措辞或有不当，但本意是希望党的领导更加完善。报社领导人，包括6月间刚刚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他原先和蒋元椿一起在新华社工作，对他非常赏识），还有副总编辑杨刚、黄操良，都极力为蒋元椿说话，力保他免入“右派”的行列。因此，直到1957年10月中旬，蒋元椿的名字还被排在报社内定的右派名单之外，被当做“疑右”看待。

但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恶化，“反右”运动在这年初秋迅速向党内蔓延，原来极力保护蒋元椿的领导，其自身也岌岌可危了。10月6日晚，点名将蒋元椿调入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杨刚自杀。蒋元椿命运的一道屏障倒下了，他在当月就被确定为“右派”，再也没有回旋余地。1958年4月，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随即被宣布为“右派”。他的罪状之一，就是支持蒋元椿写了《论圣旨口》，并在事后包庇蒋元椿。

1958年2月10日，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做出

将蒋元椿划为“右派”的决定：

经过5个多月的揭露和批判，证明蒋元椿是一个混入党内十余年之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的党内右派分子。他对党心怀二志，反对民主集中制，和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严重抵触情绪，并在鸣放时期同情和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进攻，反右斗争中态度又很不老实。凡此，说明蒋元椿已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

处理意见只有一句话：“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

蹉跎岁月中的坚持

蒋元椿被开除党籍，从行政11级降为16级。他的妻子张黎，也在新华社被打成“右派”。

1958年4月下旬，人民日报社的大部分“右派”被集中起来，送往河北唐山的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在盐碱滩上的苦风凄雨中劳作了3年。他的难友们后来回忆说，蒋元椿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是，劳作之余，他总是尽可能保持整洁的着装，决不蓬头垢面。

他还希望身边的难友也同样保持尊严地生活。他告诫年轻的同事方达：“不要乱检讨，要实事求是。”当看到女难友刘衡瘦弱的身体难以支撑强体力劳动，他向农场方面反映，对女性要有一点照顾，不能故意把她们的身体搞垮！

毕竟他是有资历的干部，1961年“摘帽”之后，蒋元椿回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专管印度支那报道，可以撰写一些不署名的评论文章了。从1962年起，他开始用“南枝”的笔名撰写有关印支问题的新闻述评，后来也用“何江”的笔名写过一些札记。这说明虽然身为“摘帽右派”，身边的人们还是高看他一头。

到了1964年，情况进一步缓和。夏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点名通知，要《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潘非和蒋元椿一起到钓鱼台周恩来办公处参加会议。

蒋元椿又一次坐到了周恩来身边。这回，周恩来并没有对蒋元椿说一句话，但是蒋元椿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这说明，周恩来没有忘记自己。又过了一天，报社领导同意蒋元椿参加农村“四清”，并暗示这是为他重新入党创造条件。

1966年6月，他结束“四清”回到报社，史无前例的“文革”扑面而来，厄运又开始了。

不过，“右派”已经是“死老虎”，蒋元椿在“文革”风暴席卷之时还算没有多受皮肉之苦，因为造反派顾不上他。但他的政治处境又一次落入谷底，抄家、挨批斗都成了家常便饭。

一番折腾之后，他被送往河南干校，再度躬耕陇亩。他在干校的生涯似乎遥遥无期，别人回北京了，他却留着。直到1970年，女儿蒋千红要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此离开北京，报社才批准蒋元椿回京和女儿话别。

这年8月，蒋元椿将满50岁，正是知天命之年，和心爱女儿的离别必定使他非常痛心。回到北京，他突然血压升高，引起脑血管痉挛，导致半身瘫痪。幸好发现及时，医生救护得法，才把他从更加苦难的深渊边上拉了回来。

两个月后，蒋元椿恢复得可以稍做走动。回顾人生，他觉得自己已经穷途末路，来日无多，一场大病使他内心凄凉到了极点。他卖掉了所有的书籍，烧毁了很多珍贵的照片，想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一刀两断，然后准备轻装远行，被流放到人所不知的地方了此残生。这是蒋元椿一生中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后来深深地为此愧疚，多次向后辈提及，希望他们永远不要这样做。

一年以后，蒋元椿渐渐恢复了健康，只留下一点不易察觉的后遗症。他的人生信念同样恢复了，于是坚持锻炼，还摸索出一套适宜于自身的保健方法。他觉得，或许还有那么一天，前度江南才子东山再起。

对“这一天”的等待漫长而渺茫。身体大致恢复后，他被安排到国际部资料组剪贴报纸，整天与剪刀糨糊为伍。到1975年，报社新成立新闻研究所，蒋元椿被接纳，每天看看旧报纸。后来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空虚的时期。

好在他希望的“那一天”终于来了。1976年10月，平地一声春雷，“文革”以“四人帮”束手就擒为标志结束了。蒋元椿的新生随之开始。

留得晚霞照桑榆

他回到国际部担任“亚非组”副组长。1978年深秋，《人民日报》率先落实中央55号文件，宣

布蒋元椿第一批“改正”，恢复党籍和原级别。

这已经是11月的事情了。12月，中美两国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邓小平即将访问美国。蒋元椿来不及欢庆自己的新生，就被编入了随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团队，采写了见证中美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

重大新闻。

邓小平访美新闻通讯署上蒋元椿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发表，熟悉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祝贺“江南”重生！这时的蒋元椿59岁了，不禁慨然长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访美归来，蒋元椿担任国际部副主任，随即升任主任。

这是他后半生中最忙碌的时段。他修改、审阅了大量文稿，向国外增派常驻记者。还以“何江”笔名撰写了一些国际评论。他的笔又一次繁忙地挥洒起来，但是，当年的“江南”才气却已从笔下悄悄溜走了，作品数量远不及当年，或许文采也不复旧观。

不过，他有了新的工作内容。从1980年起，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导师，着重培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这批研究生桃李芬芳，此后堪当重任。

1984年，蒋元椿被评选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次年，他离休了，向新闻工作——这个为他带来光荣也带来过苦难的职业告别了。他的新闻研究在继续，参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外新闻部分，并于1986年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讲学。

蒋元椿著有散文集《沂蒙山》、通讯散文集《黄樨集》，译有「苏」西蒙诺夫《战斗着的中国》等。1996年4月22日，蒋元椿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新闻前辈何燕凌老师指点，蒋元椿的儿媳安效卓提供了有关资料和照片。谨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 杨继绳

1972年夏，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中发1972年[28]号。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是转发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第一篇内参题为《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第二篇是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第三篇是反映驻军退出民房的情况，第四篇是写退房后军民关系改善。后三篇反映的情况是中央看到第一篇稿件后采取纠正措施的结果。这个文件在中共中央转发内参的按语中要求天津驻军迅速改正错误，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条当时称为“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在一个苹果园里不吃园里的苹果，说不吃是光荣的，吃是可耻的。毛泽东旁敲侧击，用吃苹果的事来说明军队占用民房可耻，退房子光荣。

这四篇稿件中，第一篇是我执笔的，后三篇是马杰执笔的。

这几篇内参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而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人物的子弟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子弟。在下乡知青中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上学，老子百姓儿务农。”当时我年轻气盛，下决心揭露大学招生“走后门”的事。我到南开大学主管招生的部门了解学生来源，还直率地提出了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没有这回事！”我要求查招生资料，他们搬来了一大摞，我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盖上了大红图章。哲学系60多名新生，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都是手续齐全，无法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我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看到西康路60号门前军人站上了岗，这里的房子（当时

大概是建筑设计院，上世纪80年代为天津城市规划局）最近也被军队占了。联想到“五大道”的小洋房大量被军人占用，我眼前一亮：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大学招生走后门抓不着，军队占房是滑不掉的！

第二天，我所在的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我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调查军队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之嫌。这个题目政治风险是很大的。没想到贾文英、阎晶昌、虞锡圭、李荣昆、孟子君等同事一致表示支持。李荣昆提议，军队是马杰分管的，马杰应当参加。我上楼把政文组的马杰叫了下来，马杰大力支持，积极表示参加这个调查。阎晶昌说：“真是得道多助哇！”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在公用局（当时市房管局并入公用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高仲林、孙国荣、李子荣、侯树民、乔虹等人。据他们介绍，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其中，私人住宅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著名泌尿专家林菘私宅睦南道81号，被公安局军管会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全国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歧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有。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根据座谈

会上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例如,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一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位团级干部说:我不能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一位女房管员还带我外面远远地看了几处被军队干部占的小洋楼。接着,我调查了市卫生局,接待我的是张玉昆,他介绍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我还调查了东风大学(即天津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马杰调查了教育局,有些幼儿园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事后据“落实中共28号文件办公室”向我介绍,在天津驻军20个单位即六十六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05部队、海军航保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天津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万平方米。)

材料齐了以后,我很快写出了稿子,郭宝树打印后交给分社负责人任丰平,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签发给总社,他冒风险承担了政治责任。

几天以后,从总社传来了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让新华社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振奋。也有好心的人告诫我:别高兴得太早,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他的告诫是有根据的,揭露权倾一时的军队的问题,还会有好结果?事实上,正是周总理主持的这个会上部署解决全国军队占用民房的问题,并由此纠正军队在“支左”中因权力太大而产生的不正之风。

军队占用民房不仅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一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

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前,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事先对天津驻军进行了工作部署:首先让天津驻军领导人向新华社记者表态(总社通知我们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我和马杰到六十六军时,刘政军长笔挺地站在传达室门前,见了我们立正,行军礼,说他已恭候多时);又让天津驻军立即退房,保证在“八一”建军节前退完;还让退房后组织拥军爱民活动。这些活动也让我们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说:“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还要求各级“退出水平,退出风格”。同时借此机会对全军进行爱民教育和纪律教育。家属准备来队探亲的,打电报不让来,请假的也推迟了。7月19日,六十六军带头,动用两个连队把军部从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址(百货大楼后身)。搬家的部队车水马龙,十分壮观,群众夹道拍手欢呼。为了保证六十六军搬回去,天津市有关部门组织了300多人的修缮队伍,还有200多名战士,日夜奋战三四天,7月18日零点完成了对新华路28号的修理,保证了六十六军7月19日搬回。

对于军队即时退房我是很高兴的,但对于军领导人的自我批评和拥军爱民活动我心存疑虑。例如在东风大学六十六军举行的拥军爱民盛会上,天津市一些领导人(如市委书记解学恭和九届中共中央委员蔡树梅、王淑珍)的发言,对军队占用民房没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反而对军队大加赞扬,好像欢迎从前线凯旋的部队一样。看到这些情况我心中不平,想站起来说话,坐在旁边的任丰平把我按住了,但对写后几篇稿子持消极态度。多亏马杰识大体、顾大局,由于他的努力,才完成了后三篇稿件,实现了中央的意图,形成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立即退房,全国所有驻军都突击大搬家,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民房近百万平方米。新华社总社让全国各分社写当地驻军退房的情况,从各分社的内参稿中可以看到,各地军人搬家都颇有声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在“文革”中权力部门大量扩张办公用房,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

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 8.25 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 2.6 万平方米。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也有的军队一时退房困难,搬家拖了一段间。如被 4688 部队占用的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没有退,后来地方给了三处房子,才换了出来。第二炮兵司令部占了中国人民大学,上世纪 80 年代初还没有退出来,直到引发一场学潮,“二炮”才不得不另迁新址。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军队占房问题?当时市委领导人、毛泽东的亲戚王曼恬说:“这不是腾几间房子的问题,意义深远。”意义在哪里?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意。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泽东对“文革”中军队势力过大有些担忧。

“文革”期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一时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派解放军“三支两军”。军队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 21 个委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届中央委员(170 名)和中央候补委员(109 名)中,军人占 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军队干部共有 4035 人,其中有 3172 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全市区、局党委书记 60 人(60 个单位)中,军队干部 44 人,占 73.3%,市级机关一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 11 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 10 人,占 90.9%。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表明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毛泽东向林彪和黄、吴、叶、李、邱那个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抛石头,挖墙脚”就有抑制军队的意思,1971 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后,毛泽东更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 1972 年 28 号文件,应当是解决军队问题的余波。

驻军迅速退房使天津老百姓过高地估计了新华社记者的作用。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

认为新华社记者可以帮助他们申诉,纷纷到分社上访。那时新华社还真有点威望,有时给上访者单位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上访的人就更多,在睦南道 150 号分社所在地人满为患,有时一天上访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小花园都挤满了。上访的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化名人和企业界知名人士。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传达室生连起老头每天发十几个号,有人为了拿到号,头天晚上在分社的围墙外面墙根底下等候。分社安排阎晶昌、孟子君等人专门接待来访,帮助上访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在接待来访中触及大量“文革”中的问题,引起当时市委不满,市委副书记、六十六军军长兼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政批评分社超越权限,管得过多。这样,分社只好停止了接待群众上访。■

书屋 2011 年第 3 期目录

| | | |
|------|------------------------------------------------------------------|-------------------------------|
| 书屋讲坛 | 误读革命,抑或创造革命? ——《惨世界》内外的思想与政治 人啊,你是如此复杂 | 尤小立 蔡蓬溪 |
| 人物春秋 | 既清又浑的总督曾国藩 “开国元勋”蒋翊武的高风亮节 | 张宏杰 袁南生 |
| 灯下随笔 | 舔痛牙的舌头 沦为匕首的语言 动物权力之辩 | 赵刚 祝勇 王晓华 |
| 思史佚篇 | 恰似祖师西来意? 读书人的担当情怀 说宰相 | 刘伟波 杨福音 周树山 |
| 流年碎影 | 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台前幕后 怀念朱劭天先生 | 胡克庆 王炯华 |
| 书屋品茗 | 鲁迅:中国人有信仰吗? 尘外孤标——吴小如 马湘兰:多情未了身先死 历史还可以这样来写 看法各异的招隐诗 | 魏韶华 肖跃华 王鹤 贺樟榕 顾农 |
| 艺术天地 | “世上只有一个程砚秋” 曾纪鑫戏剧论 | 许石林 田文广 |
| 域外传真 | 一只猪的死和一部经典童书的诞生 | 李钧 余凤高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6.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 周仰颐

1957年，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1958年初，即与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国营机械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普及全国的“三面红旗”运动，对我们也有波及。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一是制订每亩产棉指标。当时有的分场胡吹竟提出亩产皮棉4000斤，在我们大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比较实事求是的意见占了压倒的优势，订百亩产皮棉80~150斤。大队部的几位领导同志想探究一下每亩到底能产多少斤，就种了大约一亩试验田。按照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提高密植度，又上了许多豆饼，结果棉桃坐果不佳，收成最差。每亩订80斤皮棉的基本达到了指标。

第二件事是，全国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后不久，几位农民把家里的几个柜子、八仙桌之类的家具运到我们的打谷场，声言多少给几元钱就可以出卖，不然就可能被别家共产了。我们下放劳动的几位教工只是远远地看了看，没人答话。我们知道这是当地农民对人民公社还存在误解。

1958年的8~9月间，学院来人通知说教育要大发展了，学校的人不够用了，你们下放人员得赶紧收拾回校了。按照学校开的名单，大部分下放人员又回到了学院。

刚回学院，学院各方面工作还十分混乱，学生上课极少。学院领导决定结束这种混乱状态，积极准备于1959年9月正式开学上课，我也回历史系上班，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课主讲。这门课是高校新开的，没有现成教材，按当时教育革命精神，学校领导决定让师生一起编写教材，而且要高、精、尖，理论联系实际。没有上过这门课的学生却要参与编写该课教材，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只好下苦功夫大量

研读马列主义经典。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研讨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在我国进展的状况。我发现，1953年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有一定的主观性，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相一致的学说不怎么符合。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必然要作必要的变更和调整，但我们则是提前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发展空间，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在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又过急，并采取搞运动的方法，使人民勉强接受，不免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有关方面不断调整、整顿，但总的来看，还是太快了。到1956年，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八，都参加了高级社，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农业生产埋下了相当重大的危机。

在我们积极编写教材并进行教学的时候，武汉的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日趋紧张。我们1958年下放期间是放开肚皮吃饭，各个饭量都很大。回校后，严格按照定量吃饭，食堂还要扣下一点，以便应付可能的更大困难，经常感到吃不饱，甚至还得了肝肿大和浮肿病。年轻轻的教员有时不得不坐在椅子上讲课。我到医院去看病，总能看到许多乞讨者和流民。他们说河南和安徽的农村太可怕了，到处无吃的，到处都有饿死人的。少数人来自湖南。他们竟说在鱼米之乡的洞庭湖沿岸，农民照样吃不饱饭，照样在野外找草根之类可以塞饱肚子的东西。这些情况使我深深地思考其原因，但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关信阳事件的文件及相关消息不断传来，我才逐渐弄清原委。由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

1959年7~8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做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这以后,全国的“左”倾社会主义思潮更加汹涌。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据流民们讲:食堂几乎天天喝稀汤,喝的人一个个浮肿得走不了路,干不成活。再不逃就走不出来了。庐山会议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并大力组织挖粮队,凡完不成征粮任务的大、小队干部,就当地主分子斗,当小彭德怀斗。一时打人成风,不打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据说,嵯牙山被打的大、小队干部至少有300多人。在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食堂解散前,信阳地区被公安机关逮捕、拘留的上万人中,约有半数死在拘留所中。当地民谣说:“到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在我去医院看病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到很多乞讨者和流民,另一方面,不断听到武汉电台声嘶力竭地对秋后算账派的批判声。这种批判让人十分讨厌。我就想把自己对国家形势的思考和电台放空炮式批判的看法向系领导反映一下。

有一天,我和我们系的贾青波主任(兼学院党委的宣传部长)做了一次长谈。我首先对他说:现在武汉电台几乎天天都在批判所谓的秋后算账派,却不愿认真地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及其由来,这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也不是马列主义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气愤。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真诚地希望党能认真地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快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使党更加正确、更加伟大。贾主任说,你这个出发点和态度是很正确的,还有什么看法,可以更具体的谈谈。

我说,我下面想谈的问题,仍然是武汉电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第一,当前的经济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是天灾是人祸?我认为人祸而非天灾。因为据我们所知,近几年没有大的旱灾或水灾,而当前的经济困难却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还得同样的病,这是政策造成的,完全不像过去那样,东方不亮有西方,黑了南方有北方,可以互相支援、互通有无。现在是到处困

难,谁也援助不了谁。

第二,造成当前困难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我认为不是什么胜利冲昏了头脑,也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是我们在实践上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到处都在讲“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是唯意志论,执行这样的思想路线,工作必然失败。

第三、武汉电台问:1958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我认为,错误是主要的。全国到处粮食供应紧张,到处浮肿病流行,不少地方饿死人,世所罕见。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正如白瑞西院长听说:“一两金子一两铁”,这叫什么成绩第一呢?从1959年起已经开始纠错,我认为纠一分错,就算有了一分成绩。但是看来纠错十分困难。

与贾主任谈到最后,我说:我希望把我的看法,向上级汇报,如果能对改进工作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万幸了。

没有多久,民院党委就派人来约我谈话。那阵势十分严肃,像是对犯人落实口供一样。我想了一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总不至于提一点改进工作的意见,就引火烧身吧!于是我就把与贾主任谈话内容重说了一遍。“文革”中,民院办了一个展览,我当年与贾主任的谈话竟原原本本地写在常委会的记录本上。

自从我的看法反映到民院党委以后,先是组织团支部过民主生活会对我进行批判。一些同志说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对党政大事说三道四。有一位老点的同志说我像“刀笔吏”。我回答说:“我不像同志们那样冷静,我太冲动了,只会说心里话”。

“文革”开始后学院领导借红卫兵之手将我隔离起来,在我的隔离室里写有一条这样的标语“周仰颐是李达的孝子贤孙”。对此,我想了好久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心想:1957年从武大毕业后,很少见过李达校长,怎么会有这样一条标语?后来,一位监管同志告诉我:李达在东湖宾馆跟毛主席吵了一架,大意是,李达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不对,是唯心论,跟你老弟的说法十分一致,所以就把你和李达联系起

来。听了这番解释,我对李达校长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勇气充满了敬佩,也感到自己的看法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思想轻松了许多。

对我的迫害还不止这些。有一次全院开调工资大会。1957年毕业来民院的都调了一级,单单不给我调。当晚我约白瑞西院长在他的办公室谈话。我对白院长说:升一级也只得5-6元钱。我不稀罕这点钱。我不明白的是:对党和国家的工作

提一点意见,为什么就这样抓住不放?白说:这样我们才好对王书记(王任重)交代。白又说:你的那些看法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不是一般的又红又专问题,请你明白。我又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只考虑自己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他的就顾及不到了。最后,我借卡斯特罗的一句话作为谈话的结束语:“历史将恕我无罪”。■ (责任编辑 萧 徐)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 费 |
|-------------------------------|----------------|--------|-------|
|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 梁漱溟 | 43.00 | 8.00 |
|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 杨奎松 | 88.00 | 10.00 |
|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 何 方 | 39.80 | 7.00 |
|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 28.00 | 6.00 |
| 党员、党权与党争 | 王奇生 | 48.00 | 8.00 |
|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 白永达 | 22.00 | 6.00 |
|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 肖复兴 | 25.00 | 6.00 |
| 国家记忆 | 章东磐 | 98.00 | 10.00 |
|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 乔云华 | 58.00 | 8.00 |
| 王光美私人相册 | 罗海岩编著 | 42.00 | 7.00 |
|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 38.00 | 7.00 |
|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 丁三著 | 32.00 | 7.00 |
|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 张聿温著 | 32.80 | 8.00 |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 49.00 | 8.00 |
|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 金以林著 | 48.00 | 8.00 |
|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 尹家民 | 95.00 | 10.00 |
| 历史:何以至此 | 雷 颐 | 28.00 | 6.00 |
|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 徐 孔 | 29.80 | 6.00 |
|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 沈志华主编 | 148.00 | 12.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6.00 | 7.00 |
| 三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四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张闻天在1935~1938 | 张培森主编 | 17.00 | 6.00 |
|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 张培森著 | 20.00 | 6.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 杨天石 | 60.00 | 8.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 杨天石 | 38.00 | 6.00 |
| “中间地带”的革命 | 杨奎松 | 54.00 | 9.00 |
|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 张 琦主编 | 48.00 | 9.00 |
| 牛棚杂忆 | 季羨林 | 29.00 | 7.00 |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 林贤治主编 | 38.00 | 7.00 |
| 南海人物春秋 | 顾保孜 | 78.00 | 7.00 |
|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 李立宁 孟新 | 48.00 | 7.00 |
|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 孟庆春 | 49.80 | 7.00 |
|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 侯井天 | 98.00 | 11.00 |
|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 马识途 | 38.00 | 7.00 |
|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 朱 正 | 26.00 | 7.00 |
|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 杨继绳 | 39.80 | 8.00 |
|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 李 锐 | 29.50 | 7.00 |
| 庐山会议实录 | 李 锐 | 18.00 | 5.00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 锐 | 22.80 | 6.00 |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吴 思 | 28.00 | 6.00 |
|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 吴 思 | 28.00 | 6.00 |
|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 邓 鹏 | 97.00 | 10.00 |
|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 徐庆全 | 45.00 | 7.00 |
| 国史札记(史论篇) | 林蕴辉 | 38.00 | 7.00 |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 28.00 | 7.00 |
|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 李新著 陈铁键整理 | 39.00 | 8.00 |
| 官场怪圈定律 | 李茗公著 | 46.00 | 8.00 |
| 走出个人崇拜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 薄一波 | 88.00 | 11.00 |
|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 张秀山 | 43.00 | 7.00 |
| 夹边沟记事 | 杨显惠 | 34.00 | 7.00 |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 沈宝祥 | 39.80 | 8.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 煌 | 21.00 | 5.00 |
|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 于光远 | 36.00 | 7.00 |
|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 张广友 | 32.00 | 7.00 |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潜规则》 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30年前的讨论内幕。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出生在20世纪,旁观北伐,见识蒋介石;红色年代里也曾经受过锻炼和改造,作为历史的参加者和见证者,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的个案素材,供读者检视和剖析,同时也反思历史。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底层的叩问 立足现实的批判,坚持文化的言说,本书以鲜明的立场、尖锐的目光、泼辣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触及当下社会经济与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泥人也有土性,小草也会呻吟,来自底层的叩问,来自民间的立场,来自弱势群体的目光,触动读者的心弦,让正义、良知、悲悯、同情……许多美好的词汇,不仅仅成为漂亮的书面语。

古人曰,知屋漏者在宇下。今人说,得民意者得民心。肖复兴的这本书为百姓的民意作了很好的代言。

国家记忆 本书收录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影像,首次独家、清晰、生动地展示了中缅印战场上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和历史真相。本书附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原始影像DVD光盘。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13路、21路、32路、65路、68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50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 周瑞金

今年是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 100 周年。或许是对百年共和纪念的先声，或许是百年革命与改革成果的一种盘点，最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近来在多个场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在深圳特区成立 3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并表示“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温家宝总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也相当引人注目：“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进一步断言，改革的“停滞和倒退”是“违背人民意志”的“死路一条”。

如此个性化的、峻切且急迫的语言表达，在我们党的最高决策层中并不多见。

媒体也高调跟进这一话题。9 月，《南方日报》迅速刊发整版的政治体制改革系列评论，冠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其他各项改革》的醒目标题。10 月，《人民日报》又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署名郑青原的长篇评论《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时间，引发舆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热议。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数家之言都无异议，表述的区别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和推进方式。

就在这样时刻，读到贤友华炳啸先生凝结了他 15 年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越发有了极深的感慨。

可以这么说，作者用煌煌 58 万字、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层面反复论证的“宪政社会主义”，有振聋发聩之效，点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要穴。

《超越自由主义》一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独自的思考，有学者的谨严，又有政治家的眼光。他既不赞同闻“自由主义”色变、死抱着斯大林集权主义模式不放的唱衰改革者，也不盲目附和一切唯西方自由主义马首是瞻的食洋不化者——这和吴敬琏先生《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观点，不谋而合。作者热切呼唤一个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新改革时代”的到来！他坚信，“中国能够实现对于自由主义的‘盛大’超越，走出有中国气派的民主新路。这就需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精神饱满’地加紧努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为后人开路、铺路，为社会主义宪政改革默默积累和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沉下心来、倾 15 年人生“默默积累”、“甘于铺路”，这种精神令人动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也有 30 年了，其间坎坷不断、争议不休，甚至到了剑拔弩张、血雨腥风的地步。虽然时间各种“主义”和“思想”打架，各路“激进”与“渐进”论辩起伏，但是争吵了半天，鲜有人沉下心来，从厘清最基本的概念入手，拨云散雾，呈现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和具体方案的清晰面目——也就是说，30 多年改革，我们相当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而没有“基础理论”，一切改革主张都是流沙上建的高塔，立足肯定不稳，自然也就没有登高望远的可能。比如，猛然问一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都可能会让高声争辩的双方一时语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盲人摸象式的口水战，于事无补，反而乱了阵脚，坐视政治体制改革的迟滞与茫然。

《超越自由主义》一书，就填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

此书最突出的贡献，是通过大量中外历史分析、思想梳理和现实观照，向读者郑重提出了宪政至上原则。作者鲜明地提出，只有宪政能救社

会主义，宪政制度高于并绝对规制人民主权、党权、政府治权与司法治权。而且，“没有成熟、理性、法治、自治的公民社会，就没有宪政社会主义”。

诚哉斯言，大哉斯言！

特别令人钦佩的是，这部书并非那种故作艰深、钻故纸堆的高头讲章，而始终着眼现实，注重于实践。他另辟蹊径的学术研究创新思路，是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存在的内在缺陷与困境中，获得了开创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新路向的重要启示。

他对西方两大民主政治流派——基于众意、承认权力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多元主义民主和基于公意、认定人民主权一元化和利益一致化的一元主义民主——进行了细致而科学的梳理，发现在“多数人的同意”的背后，是基于私利的“少数人的决定”——这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悖谬与合法性危机之所在。对此，西方学者从对西方民主自我修正出发，提出了“新宪政主义”和“新共和主义”。受到深刻启发的作者认为，宪政社会主义可以在汲取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找到一条基于公民自由的、更适合中国实际也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民民主模式的“竞争性选举民主”道路。

我对类似下面这样一些表述相当有兴趣，他说“基于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理由，宪政社会主义反对三权分立制度，而是主张议行合一的、具有‘统合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嵌入宪政框架之中，坚持宪政治国，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实行分权制衡制度，以保证人民民主宪政不受任何专制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侵害……”

本书研究成果的精彩之处还在于，这样一套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符合立国之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也呼应了中共早期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在现实操作层面，对原有的根本性政治制度安排不具破坏性，更容易在一个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赢得共识，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公平正义、百姓自由发展的宏大目标。

贤友华炳啸的这番研究心得，固然还有待

完善，但他开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好头，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不容低估。我们要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约的今天，部分权力的堕落和百姓对腐败的愤怒，都已经到了严重地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而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超越空喊口号、乱揪对方小辫子的时代，进入系统性基础研究与现实操作的层面。

其实，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近代中国政党的发轫，始自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宪政”二字，就是从那时开始叫响的。然而，时隔一百多年，这“宪政”二字，依然难识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所谓宪政，就是以一种宪法大于天的超然力量，对现存各种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的一条科学路径，也是中国志士仁人奋斗了上百年，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以求的救国、兴国之策。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认为腐败的泛滥，使执政党面临巨大的合法性挑战，而剪除腐败最有成效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衡。他郑重地说，“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温家宝总理这段话，就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种高度认同。在体制内，近来不乏高层官员发出旨归相当接近的表述。在最近的世界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致辞颇具轰动效应，因为他明确宣示对法治文明的认同，表示要“遵循法治文明的一般规律”，要“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社会主义宪政，显然就是法治文明的核心构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一骑绝尘 30 年之后，权力、资源、资金过度集中趋向垄断的现象，在共和国历史上达到令人难解的严重。

然而，听到决策层如总书记总理，学界如华炳啸、吴敬琏、江平等这样一些声音的渐次嘹亮，让我们对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掀开大幕之前的底气和信心。贤友华炳啸喜欢的一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还要加上一句“关山重重终须越，前赴

《大秦帝国》的“反动性”

○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一、我为什么要再次回应

这里说的“反动性”，是指一种反启蒙、反现代，对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潮。这种“反动性”弥漫在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的心里，也往往表现在言论、文章和一些文艺作品中，以“秦家店”核心价值对抗民主、科学的精神。小说《大秦帝国》就是如此。读这部小说，既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又得不到人物、故事欣赏的愉快，识别力差的读者还可能接受一些思想的毒素（如暴力崇拜等）。文学界和学术界对它的冷淡是应该的。2010年年初，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上海《文学报》把它推出，才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我就在《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与博士生高子文的对话，对它提出批评。

此后不久，看到了作者的反驳文章。本来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是因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小说作者孙皓晖把晚出很多年的秦朝文化说成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陈辽的批评文章（《创作理念的误导，作品自诩的反差——评〈大秦帝国〉》，《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文学报》接下来却又登了几个版面的文章对小说进行赞扬。其中，一篇是吹捧秦始皇的（李衍柱《嬴政：“中国的恺撒”》），一篇是讨伐《大秦帝国》的批判者李建军的（程步《四十年不散的阴魂》），这些颂“秦”挺“法”的文章重复着“文革”时期“评法批儒”的老调，宣扬“秦家店”以皇权专制、暴力崇拜为核心的反现代、反启蒙的文化价值观念，

这就不能不引起关注了。《大秦帝国》伪造出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大秦帝国”，（“大秦”之“大”，“帝国”之“帝”，纯属作者妄撰，于史无据也——董健按。）否认秦王暴政的历史事实，鼓吹“铁血”之“强力”，充满文化民族主义的喧嚣。《文学报》，作为一份严肃的报纸，居然一而再地对它进行赞美，而且不发表任何反对的意见，令我十分吃惊。

走向自由、民主，走向现代文明是一种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浩浩荡荡，正如孙中山所讲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来关注人们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现，《大秦帝国》颂“秦”挺“法”，从根本上说，是對抗现代性，對抗当代意识的。李慎之曾在他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了区分。“传统文化”指的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和文化成果，如“经、史、子、集”中的各种著作，纷繁复杂，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可以在区分之后，加以批判地继承；而“文化传统”则指的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上面所形成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在民族心理中，从古代一直影响到当代。秦汉以来，“文化传统”尽管过了两千多年，却没有中断。李慎之认为秦朝以来的“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绝对地抛弃。秦朝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正源所在，但它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上倒确实是作了系统化的“奠基”工作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专制主义的思想对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会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大秦帝国》的批儒立场，在当前“儒学热”、“国学热”已经引起国人反感的情况下，可能会得

后继赖后生”。

完全可以肯定，只要从上到下人人有责一起来做社会主义宪政的铺路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为此，我向海内外广大读

者郑重推荐华炳啸先生的心血之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大家读后一定会有“投石冲开水底天”的豁然开朗……■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到一些读者的共鸣。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会通向皇权专制主义，尽管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很不一样。儒家的出发点是“人”，但它的“礼”又是“治人”的；而法家则更偏重治人之“法”与“术”，把人作为试“法”之工具，作为为统治者制造政绩的材料。权谋与暴力是法家的看家本领。后来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合流，共同支撑皇权专制主义。相比之下，儒家学说中与现代民主相通的因素要比法家多一些。《大秦帝国》颂扬法家，却不辨析法家思想中所含的专制因素（法家之“法”绝不等于现代法治），也不辨析儒家思想中的积极价值。小说丑化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不仅把孟子写成一个守旧势力的代表，而且丑化其人格。事实上，孟子在儒家思想家中最具有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一位。我曾在《春末随笔》中谈过孟子思想在今天的意义。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藐视权贵，正气凛然，这话孔子说不出，今天很多人也做不到，真是了不起。朱元璋把他请出了孔庙，还下令对《孟子》作了删改。从专制统治出发，朱元璋感受到了孟子思想，也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对他的威胁。

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应该对《大秦帝国》再次予以质疑。

二、历史主义不是根基是陷阱

喜欢放过历史罪恶的人，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总喜欢搬弄“历史主义”这个概念。孙皓晖反驳文章题目叫做《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也把历史主义搬了出来。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主义”并非完美。我最近读了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的一篇演讲（《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文汇报》，2010年9月25日），他正好回答了孙皓晖的问题。

俞教授认为，历史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历史起点和历史过程的崇拜。就源头崇拜来说，孙皓晖不可谓不坚决。他居然把晚出的秦地文化说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历史主义的源

头崇拜本身就有问题，而孙皓晖连这个源头都弄错了，真是错上加错！说到对历史过程的崇拜，《大秦帝国》的作者也犯了同样错误，他对秦统一六国的全部历史过程的描述，连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都达不到。如书中所写的六国分秦大会这样的大事件，全是对历史的伪造，连《史记》等多年传下来的典籍的记载都推翻了，还谈什么历史主义！俞教授指出，所谓客观性就是人们认识的普遍性，至于那纯粹的历史的客观性是找不到的。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史料，接近历史真相。从这一点来看，对秦国历史的记述，司马迁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大秦帝国》的作者却认为司马迁不可信，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历史资料，而是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做翻案的文章，将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加以美化。在虚构历史时，他们主要是用了“文革”当中“评法批儒”的一些观点。他们喜欢引用毛泽东晚年颂“秦”挺“法”的一些说法，须知那是为了推动“文革”而发表的一些并不正确的说法。

俞教授讲的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历史的虚构和历史的泡沫非常感兴趣。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是将一些通俗的情爱故事插入历史，以激起阅读和观赏的兴趣。他举了金庸的小说作为例子，金庸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小说主要来自传说和虚构。我曾谈到，《大秦帝国》这个小说在艺术上很粗糙，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评法批儒”的论文，一部分是武侠小说。所以整个小说结构松散，充满了大量的历史泡沫。例如写嬴渠梁（秦孝公）去神农大山墨家城堡那一段，纯属“关公战秦琼”式的编造，嬴渠梁（秦孝公）既不会出现在那里，墨子更不可能见到他。作者对墨家弟子的描绘，完全是用了武侠小说的手法，他们被描绘成一个武林帮派，与历史距离很远。《大秦帝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白雪，也是缺乏真实感的，对她的虚构只是为了替商鞅的“寡情”作辩护，同时把言情纳入作品，增加感情戏以吸引读者。但在这方面作者的才华远远不及金庸。金庸的小说只是借用了“历史”的背景来描绘他的武侠故事，他并不以展现历史，评价历史，甚至去寻找什么文化源头为目标。因此，我们不需要写文章和金庸商榷元朝的、清朝的历史的评价问题。但孙皓晖不同，他不把自己的小说放在一个纯虚构文学作品的位置，而是

将其作为一种为历史辩护的文本，以此改变人们对秦朝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尽管在序言中作者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他对重新描述与评价秦朝历史的雄心，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最多的还是历史泡沫与对历史的伪造。

历史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某些历史“实事”的“厌倦”。他们往往会有意避开与当前现实生活有关联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虚假的历史泡沫那么感兴趣，但对“不方便”的东西却厌倦，要把它避开。俞教授举了“大跃进”的例子，当时的那种主观唯意志的种种“革命”创举，饿死了几千万人，今天那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人们就不愿意再提及了。这叫做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大秦帝国》在对待“焚书坑儒”这件事时，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态度。原本重要的史实被作者轻而易举地带过了，“焚书”之事只是在根据李斯的意思而颁布的所谓《文治整肃令》中加以简要地评析。小说对焚书的状况与当时知识分子及百姓的生存环境不作任何具体的描绘，却把重要的篇幅用在所谓的儒家弟子密谋策划复辟的详细虚构中。秦始皇的“坑儒”因此而显得像是一个正义的举动。“焚书”之事关系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在任何时代都绕不开的问题，但显然作者大感“不便”，于是有意回避。在小说中，他把这几章的标题定为“铁血板荡”，“铁血”这个词让人非常自然地想起了德国的法西斯。更为荒诞的是，作者在文章中声称秦没有暴政，认为秦的政治非常公平合理，这是对基本史实的逃避。讲到战争时，他甚至认为很多国家被秦国统一时都是和平解决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这就是笑话了。

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不与“当代意识”相结合，它只是一个陷阱。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主义的意思是，一切发生过的事都是有道理的，否则不会发生。但从当代意识看，可以对发生过的事做出不同的评价。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说，当我们描述和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时，我们的思想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经过了当代意识的过滤的。历史主义告诉我们，不懂历史就不懂今天。但是当代意识告诉我们，不懂今天就不懂历史。这两句话加在一起才是比较完整的理解历史的途径。如果我们把现代启蒙

运动确立的一系列以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抹掉，那就回复到前现代、前启蒙的蒙昧状态中。没有当代意识是看不懂历史的，《大秦帝国》的作者正是在这方面缺了一课。我本人也缺这一课，愿与他们一起补课。

反过来看，小说作者缺乏当代意识，是否就是一个书呆子呢？是否他正在寻找客观、真实的历史呢？又不是。如果他尊重历史的话，那他应该相信历史资料记载的暴秦的史实。他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或者说，他受到了一些反现代、反启蒙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当代意识是指一种引导人走向现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意识。孙皓晖在《大秦帝国》序言中所暴露的文化观念是反现代、反启蒙的。“爱国”是一个中性价值，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希特勒也鼓吹“爱国主义”。在皇权专制者的心目中，朕即国，爱国就是爱统治者。小说作者甚至鼓吹一种荒谬的“文化出身”论，认为谁找到自己古老悠久的强势文化源头，谁就在国际上有“发言权”。其实并非如此。美国现在很有发言权，它的文化的本源在哪里？即便找到也很年轻。日本的强盛是起自明治维新，似与“文化源头”无关。这种“文化出身论”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它试图用“文化源头”上专制主义的合理性来证明当今专制主义的必要性。

三、暴力崇拜和国家主义

《大秦帝国》作者一再强调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与强势生存这一点。他心目中的强势并不是指真正文明上的发达，而是指某民族能打仗、能农耕，通过暴力来达到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势。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暴力崇拜。法国当代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描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信仰暴力，认为唯有暴力才能塑造未来。”他认为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往往并不更好，反而更坏，不能迷信一种新的政权就一定是好的。放在秦朝这个具体的政权上来看，如果真如孙皓晖所说的那么好，它就不会那么短命了。回到战国历史，在当时的七个国家中，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来看，秦国的文明程度比齐国、魏国都落后得多。而秦国以一个弱

小国家,通过商鞅变法提高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后通过暴力击败了先进国家。我曾说过,“地处西部的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之国,它以暴力与恐怖强国,又以暴力与恐怖灭了六国。虽然实现了大一统,但也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的黑暗时代。”

秦国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本身从弱小到强大,没有产生过一个思想家,商鞅、吕不韦、韩非都不是秦国人。孙皓晖在历史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他说秦国统一了六国,所以它是先进的,要寻找文明的源头,就从秦文化中去寻找。事实上,法家文化源头并不在秦。就像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付诸实践,取得了胜利,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从文化源头上说,只能到德国或英国去寻找,而不能在俄国寻找。要寻的话,也只能从俄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那些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变了味的文化因素。读读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在秦文化是否是中华文明正源这一点上,同样如此。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这一点,马克思有过精彩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过去我们常常庸俗地理解了历史的“进步”问题,例如物质和精神之间有联系,互有影响。然而经常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文化落后的国家民族却打败文化先进的国家民族。秦国的胜利,就是这样实现的。类似的事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很多次。比如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满族入侵建立了清朝。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是否仍可行,很值得怀疑。现代战争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肉搏,而是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的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搏斗。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此仅有激情和斗志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很难再取得胜利。从道义上讲,我们更不希望落后的国家通过战争来实现对文明国家的统治。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统治的结局只有两个,其一是在文化上反过来被征服,如罗马和满清;其二就是秦国这样的二世而亡。孙皓晖拿历史上落后战胜先进这样的例子来鼓吹暴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严重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对弱秦称霸的描述和颂扬,完全可能被读者对应到今天的现实上。中国是一个后起

的大国,正处于强势崛起之中。按照《大秦帝国》传递出来的信息,就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理解:“我一旦强大,就要用暴力把你吃掉。”这样的想法在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很令人担忧。他们的言论为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专制主义者总喜欢以“集体”、“国家”、“民族”的名义,推行统治者的意志,剥夺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暴力崇拜也往往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孙皓晖在他的回应文章中说:“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抗击外敌侵略,领导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个国家要发展国防,要修建大型国防工程,国家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工程也死伤了很多民众。”这里我们要指出来两点:一,秦朝所发动的统一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防御战争?二,秦朝所修筑国防工程,以及同时修筑的秦始皇陵墓,究竟是来自一个专制君主或专制集团少数人的意志,还是来自民众的集体意见?难道在一种国家主义的旗号下,使用暴力就显得很正当吗?这里面的问题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究竟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考虑,还是在为实现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考虑?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有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所谓的民族振兴和无数民众的死亡,这之间的代价是怎么算的?以生命为贵,以人为本,还是以国家的进步为上?如果大多数民众受苦受难,那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按照《大秦帝国》对秦朝的理解,陈胜吴广当时的起义就是破坏了国家和集体了。对于这一点,小说作者只能回避,毕竟陈胜吴广起义的正义性还是大家承认的。■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高子文: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 刊 启 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陈丕显、曹荻秋反对大串联

○ 金大陆

一、揭发与藏匿

1967年5月26日，已反水的马天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4月结合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在“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大会”上站出来，列举了九条事例，揭发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文革”运动中“出了很多坏主意”，以至指认陈丕显“是扼杀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检查该九条事例，可发现第二至第六条共五项与红卫兵大串联相关：

二、北京小将冲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时的情况，他（指陈丕显，下同）是十分清楚的，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苏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每天向他汇报几次。并对曹荻秋具体指示不要出去接见小将。

三、组织工人到中学干预学生运动，就是他出的主意。

四、署名杨富珍（全国劳动模范）的电报，也是经过他同意后搞出来的。

五、控告红卫兵南下兵团打人的电报，也是他决定发出的。

六、向中央发电报，建议国庆节后停止学生串联，这也是他的主意，还督促了我几次。

同一大会上，王少庸（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7年4月结合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在题为《打倒阎王》的发言中，也证实“陈丕显躲在幕后，对情况是很注意的，随时有人向他汇报，所有重要问题，都是由他决定的”。

来自内部人的横向一刀，把陈、曹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底给戳穿了。这种公然抵制“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行径，成了陈、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证”。后来，陈丕显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在保险箱里搜查出了他所藏匿的反对大

串联的对联，譬如：

一、名串联，实反党，令人发指
既恶毒，又下流，臭名昭彰
横批：反动透顶

二、借串联，结狐群，反党反人民
用辱骂，耍流氓，进行反革命
横批：遗臭万年

三、假串联，真破坏，千里奔跑
想变天，搞颠覆，到处放毒
横批：臭名远扬

四、实指望、这次南下，能捞到一点油水
又谁知、到处碰壁，没抓到一根稻草
横批：可恶可悲。

一个当任的市委书记，不仅从民间收集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对联，还藏入保险箱内，说明上海市委与红卫兵大串联之间的冲突。

1966年7月的时候，中共上海市委对上海开展“文革”运动的大体规划是：“7月底以前进一步深入揭发，8月开始逐步转入重点批判斗争，9月以后进入群众自我教育和整改阶段”。这即是说，按市委理解和部署的正常程序，上海的“文革”运动最迟在1966年第四季度应该结束了。然而，恰恰是“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各地的红卫兵纷纷进入上海，上海的红卫兵又蜂拥外出，整个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了。

二、处理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的态度和举措

当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地高校学生和中学选派部分代表赴京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市委深知整个局势的走向不可更改，但由于市委的态度一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以致在向向下布置时，仍强调“初中学生尽量说服他们

不去北京”、“各区委要分别开家长座谈会，要他们向自己的子女做工作”等。

8月22日晚，上海火车站聚集近2000名中学生要求去京串联。在铁道部同意免票增加一班列车（铁道部已有“学生串联不要阻拦”的指示）后，又经教育部请示国务院，在得到国务院秘书长要求上海市委出面做工作，“最好不要去那么多，派少数代表去”的答复后，又继续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反映，并请示“如果都不要买票，上海去北京的学生人数可能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究竟如何掌握？”。此三问（先铁道部、再国务院、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可谓煞费苦心，明知故问，不仅拐弯抹角地将难题踢出去，更隐约其词地申明了看法和意见。待中央通知正式传达后，市委只得安排运力，组织大批在校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赴京串联。当时，也有部分大学生贴出大字报，举行辩论会，甚至到车站阻挠串联队伍出发。后经证实，正是曹荻秋“指使高教局去组织交通大学的一些学生写了一份‘我们不主张外出大串联’的倡议书，广为散发，企图阻止革命大串联的开展”。

至9月上旬，全国各地滞留在京的串联人数已达三十多万人，周恩来委婉地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负责同志出面，动员在京学生早日回去”。至9月中旬，因全国铁路运输已十分紧张，周又提出“现在除了保证各地师生到北京和北京师生去各地参观学习进行串联、交流经验以外”，“各地师生在国庆节前不要到其他省市进行串联”，在保证各地红卫兵进京路线畅通的前提下，又遏止了各地红卫兵在全国的流动。上海市委接报后，立即向全市各有关单位发出电话通知，并在9月19日召开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指示向群众传达，提出“国庆节后，可能会有新的精神，形势可能缓和”的判断。

在此，“国庆节前后”被划定了一条界线，整个9月下旬也确实阻遏了上海籍红卫兵外出串联的势头。国庆节刚过的第二天，上海市委办公厅一室即电话通知所有接待人员（供答复时用）：“除大中学校仍按规定去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外，其余要去其他省市进行串联的，要等中央、国务院通知下达后，按通知执行”。其实，上海市委并不是要刻意地拖延些天数，而是在盼等中央可否在交通、生产困窘的情势下，在各省市均有所反

映和催促的情况下，能够改变大串联的路数。

岂料，中央非但不收缩串联，还“决定十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要铁路部门按进出北京各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的学生人数安排运力”。周恩来只得指示谷牧“搞三个方案，把方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会讨论决定”，并忧虑地说“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5日，曹荻秋在市委书记处会上通报情况，抱怨说：“革命大串联，影响了工业生产，预计十月份的问题更大。全国普遍反映要求停止串联，中央难道不了解这个情况吗？是了解的。但了解得是不是和下边同志那么具体，这很难说。所以中央决定还是要搞串联”。

最高决策层坚持红卫兵大串联的意志不曾动摇，但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毕竟存在着程序上和空间上的距离，尤其是两个方面对问题和事理的判断存有歧异，于是，从决策层到执行层的指令传达，及其执行的力度，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和走样。

请看10月6日晚上海市委办公厅分别于10时15分与11时45分发出的两个电话通知：

10:15 电话通知：

关于中学生外出串联问题，中央有个精神，原则上限于本省范围内进行（上海限于江苏省）。目前可以先按十分之一的比例选好代表，根据交通运输情况分期分批，有计划，有组织地出去。中央有个文件很快就要下达，具体按中央指示执行。

11:45 电话通知：

再：上述精神实在顶不住，可以讲：上述精神是国务院的精神。这个精神如与以后下达的文件有抵触，以文件为准。另外，县以下农村仍按过去精神不能串联。

很明显，与中央“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的精神相抵触，上海学生外出串联在地理上被局限了，在人数上被缩减了，在程序上被延迟了。应该承认，尽管上海的电话通知表述得比较含混，其前后的照应和里外的呼应也处理得比较技巧，这种抵触终究是对中央精神的违背，终究需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尤其当时上海各学校参与接待了大量的外地串联学生，例如交大原有学生

6000人，入住外地学生最多时达7000人；戏剧学院原有学生400人，入住外地学生1000多人，上海市接待办还不断开放中专、完中和有条件的初中为接待站。这般态势便引发了上海籍学生的种种疑惑和追问。拖到10月19日，上海市委办公厅再次下达了“关于去外地串联”的接待口径：

应该积极支持。目前可以不受代表名额的限制，不要阻止，不要硬堵，以免产生对立。但不要主动动员。目前交通紧张，因此，近的地方提倡走路。乘车、乘船由学校介绍信到车站、码头登记，由交通部门统一安排。现在不能出去的，晚几天再走。以上只供内部掌握，可以根据这一精神针对来访群众所提问题进行口头解答，切勿将上述精神全文照读。

表面上看，10月19日的通知是一种改变，但实际上，在操作层面的规定，一、不主动动员；二、近的提倡“走路”，远的需要“登记”、“等待”；三、只针对问题解答，不照读全文。开放是名义的，限止仍旧是切实的。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等都将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十月间，全国各地的串联师生浩浩荡荡地涌向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至中旬已聚集百万人。此时北京的“气温急剧下降”，“接待能力已达顶点，食宿、交通、卫生医疗等都已发生极大困难”。15日，国务院以特急电（国密字246号）通知全国“切盼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但通知仍声明“等现有的外地革命师生离京后”，再“有计划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即当下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周恩来在10月2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说：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联，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

周的心思是复杂而沉重的。据上海10月至11月上旬时的统计，2万多支援三线建设的职工无法外运。上海外运物资积压15.6万吨；外地28万吨煤、木材、生铁等原材料无法运沪，以致上海的生铁库存只有12天。这种局面直至11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为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质运输”，“到明年春暖季

节，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一律暂停乘火车等来京串联”的通知才告缓解。

三、处理外地红卫兵在上海大串联的态度和举措

再看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等处理以北京为首的外地红卫兵在上海大串联的态度和举措。

考察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上海接待外地红卫兵的整体过程，不论统计到达人数、组织规模，还是评析活动能量、社会影响，均是以北京红卫兵为领袖，为主导的。根据北京红卫兵南下，及其在上海开展活动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轮次：

第一轮：8月中旬至9月10日，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汇聚上海后，掀动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8·31”、“9·4”事件。

第二轮：9月10日至9月30日，组织南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开展了一系列抄家、破“四旧”、武斗“黑五类”等暴力的行动，国庆节前返京。

第三轮：10月至1967年2月，以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为首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直接参与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

在这三个轮次中，除了第二轮没有集中性地发生政治事件，第一轮的“8·31”、“9·4”事件和第三轮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康平路事件等，均属于上海“文革”史的重大政治事件。只是相比之下，第一轮的“8·31”、“9·4”事件与大串联相关；第三轮的诸事件完全与大串联脱钩了。本节的叙述将略带过上海市委处理“8·31”、“9·4”事件的内容，着重围绕国庆前后大串联的态势，展示上海市委应对和处置的态度。

回到本文的起首，应该承认当年马天水、王少庸在全市大会上，揭发陈丕显、曹荻秋“反对北京红卫兵大串联”的事实是确切的。据当时有关的揭发材料，陈丕显曾针对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形势，对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说：“市委书记处要坚持下去，不行了就要常委坚持下去。常委不行了，就要市委委员坚持下去。最后剩下一个委员也在坚持下去”，并指示苏向书记处传

达部署。陈还对市委办公厅属保守派的群众组织说：“你们的主任、处长倒了，就让科长顶下去，科长不行了，就你们自己干”。陈还说红卫兵“是一帮猴子，不好惹”，但“总有一天，大串联搞不下去”。曹荻秋也在《检讨》中承认：“我就对他们（指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下同）抱着极大的反感，认为他们的言论偏激，行为粗暴，怀疑他们当中有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整他们”，“我主张上海的工人、学生同北京红卫兵开展辩论，我还布置过一些干部参加辩论”。“8·31”、“9·4”事件发生后，曹荻秋坦言“我支持受旧市委蒙蔽的机关干部写所谓澄清八月三十一日事实真相的大字报。布置受旧市委欺骗、蒙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五好工人发电报给中央、毛主席，并把这些电报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我组织了一万五千工人，加上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机关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旧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由此可见，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反对红卫兵大串联”不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更断然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地行动，以阻抗大串联的蔓延和深入。

“9·4”事件后，根据市委的指示，上海各高校清理了一些“不利于同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加强革命团结”的大标语、大字报。如交大一张十五个“滚”字的大字报，改写成了十五个“欢迎”等。但这种退让只是求得暂时的和缓，并不标志市委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时，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生产陷于混乱，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时，曾提议起草有关文件，明令学生不要去农村、工矿企业串联，并特意指示陶铸先以个人名义向华东局打招呼，听反应。请注意：该文件于9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修改通过。9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汇报。9月14日，毛泽东才批示“可印发”。然而，早在9月7日，上海市委已将陶铸“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话通知，转换成沪委（66）第91号文件正式下达：

市委各部委、各区委、县委、党委：现将中央紧急电话通知即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通知各工

厂企业、学校和公社党组织，根据这个通知精神进行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
1966年9月7日

紧急电话通知

中央要搞个指示，决定几条，主席已同意了。指示正在写，陶铸同志先电话通知，要各省市马上通知地（市）、县委和工厂、企业单位。主要内容为一、农村，县以下不要去串联。二、学生不要去工厂串联。总之，要把县以下和工厂稳住。外地的学生去了，要同他们讲道理，劝他们回来。各省市要找外地和本地的学生开会，讲明中央指示不要下农村、工厂串联。有意见，可以派少数代表座谈、送大字报。干部要挺起身来，讲道理，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什么也不能搞。讲这是中央决定，指示马上就要下达。

1966年9月7日下午1时

上海市委制止大串联的心情是急迫的，处置方式也是急迫的。幸亏后来毛泽东批示了这个文件，否则真是闯了大祸。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大会上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下午二时半，市委立即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单位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职工认真学习讨论”。看来，政治信息传达力度，取决于传输方与接受方的认同度，认同则通畅、快捷；否则便滞后、走样。

9月10日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到达上海。临行前，这个兵团领受了周恩来的嘱托；到达时，这个兵团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欢迎和关照。或许就此勾联了一份默契，尽管南下兵团对上海的“文革”形势十分不满，却始终没有公开地炮打上海市委，而是揪住了地富反坏右穷追猛打，用武斗在上海祭起了“红色恐怖”。期间，华东局、上海市委数度电告中央、国务院，要求决策层体恤下情，匡扶危局，在全国停止大串联，或将大串联限制在局部进行。

为了说明问题，现引证几条“揭发材料”：

1. “1966年9月上旬,大叛徒魏文伯和韩哲一亲自分别同华东各省通电话,煽动各省走资派向中央发电报,抵制革命大串联”。

2. 9月24日,经魏文伯同意,曹荻秋签发,中共上海市委给中央拍发电报。电报说:“从八月下旬以来,在组织生产上出现了若干比较严重的健康因素:主要是由于全国学生革命大串联,对工业生产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如任其继续发展,正常生产势难保证”。

3. (应为9月25日之前)“陈丕显眼看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把矛头对准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就出主意抓住打人的事,要市委连写两份电报,向中央告红卫兵南下兵团的状,使得他们调回北京。陈丕显坚决这样做,对向他建议电报不要发的人,大发脾气,这是出于他的阶级本质”。

9月25日,中央终于向华东局、上海市委并红卫兵南下兵团下达了“国庆返京”令,即指令所有在沪的北京红卫兵于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如此计算,除了华东局魏文伯、韩哲一于9月上旬,要求华东各省市向中央反映情况外,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起码向北京拍发了三次电报,一次强调工业生产形势危难;二次反映北京红卫兵武斗惨烈。

再看知情人某某某的揭发:

“韩哲一、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共同密谋策划后,旧上海市委向华东各省发出召回上海去各省串联学生的电报,魏文伯、韩哲一又亲自同各省(华东)通电话,要他们也向在上海串联的本省学生发来电报,要学生回本省、本校搞斗批改,竭力破坏革命大串联”。“韩哲一打电话给安徽李葆华、江西刘俊秀。魏文伯打电话给浙江李丰平、江苏江渭清,并商量用华东局名义建议中央除中央计划规定大串联外,在国庆节后各省、市学生不再互相串联”。

接着,上海与华东各省市间进行了一系列地运作。检索9月26日、27日,上海市委转发的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四省委的电报,都是同一个路数,同一个语调:先是问候,再是要求,后是希望。在此,问候和希望都是虚的,只有要求才是真的——那就是要求这些外出的红卫兵在国庆节前离沪回省。那么,华东局、上海市委恪尽厥职的

努力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一览表》显示(以国庆前的9月17日和国庆后10月9日、10月20日的统计为准),自国庆前的9月17日,上海已累计接待外地串联学生134500多人(其中北京3万多人,华东六省6万5千多人);至国庆后的10月9日,该累计接待数已达374851人(其中北京4万7千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这说明国庆前后,外地串联学生大量涌入上海。与此同时,本表显示国庆前的9月17日,外地串联学生在沪人数约为5万人。而至国庆后的10月9日,该项统计人数约为6万人,基本保持着平衡的状态。比较而言,一面是累计接待数直线上升;一面是在沪人数基本稳定,这充分证实了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所采取“回省过国庆”的动员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至于为什么同表显示10月9日至10月20日的10天间,上海的累计接待数陡然升至713197人,而在沪人数竟也翻番地高达202620人,那是因为华东局、上海市委穷竭心计的努力,终究抵挡不住国庆以后中央高层继续在全国开放大串联的意志。再看一条揭发材料:

“国庆后,曹荻秋打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留沪的北京红卫兵已完成任务,无事可做,继续留下与上海群众的矛盾要扩大,要求将留下的红卫兵也调回北京。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回电:不同意调留下的红卫兵回北京,并要求上海市委要保障北京红卫兵的安全”。

就此,可以断言陈丕显、曹荻秋等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所有举措,包括限制上海红卫兵外出和动员外地红卫兵回省,尽管一路如履薄冰地走来,确也有所收效。但这种收效主要显现在国庆期间,十月上旬以后,这种收效及其整个局势就全面溃退了。■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有注释,见《炎黄春秋》网站)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公告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 105元

2010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 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王夫和地道战

○ 王端阳



民兵在地道中转移

2010年9月2日河北省委宣传部、保定市委和市政府举办了冉庄地道战纪念馆新馆启新仪式。为此他们特邀了曾在冀中战斗过的吕正操、程子华、黄敬以及左权等将领的后代，我有幸也在被邀请之列。

在参观完新馆之后的座谈会上，我对县市委的领导直言不讳地说：谈地道战不能忘记王夫。

抗战初期王夫是蠡县的县委书记，是他最早发现了老百姓为躲避日本鬼子，将“蛤蟆蹲”发展为地道。王夫认为这种形式不仅可以藏身，还可以打击敌人，于是在全县推广地道。开始还只是在野外挖个藏身洞，后发展到村里，并由一口发展到多口，由院院相通发展到街街相通，直到村村相通。地道也由单纯的藏身发展到与地雷战、掀帘战结合起来，开始形成“战”。当然它的主要功能首先还是保存自己。

蠡县的经验很快影响到周边的县，都开始挖起地道，特别是任丘县，地道斗争发展得比较突出。可这时他们的直接上级九地委书记吴立人却认为是右倾，并汇报给了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将挖地道批评为“这是退却主义，既然抗日

就不怕牺牲！”紧接着就撤了王夫县委书记的职，而把博野县委书记王进学调来蠡县接替他。（此事发生在1941年春末夏初。）

王进学到蠡县后，根据吴立人的指示，把地道全部填埋了，还在群众大会上代表县委向群众道歉，承认错误，并说这是“右倾退却路线”，强调要和敌人拼命，提出每个人要一条枪两个手榴弹的号召，敌人来了就打，到房上去打，子弹打完了就投手榴弹，手榴弹投完了就用房上的砖头打击敌人。

在敌人面前不能落个“草鸡毛”，怎么样也不要钻地道。同时，要县、区领导机关都集中起来，随时和敌人战斗。

现实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1941年10月17日，发生了震惊冀中的“齐家庄惨案”，蠡县县委机关被敌人来了个“一锅端”。县大队除了五个轻伤员在中队长谷振海带领下突围之外，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县大队副政委陈叔恒、大队长丁砚田、政治处组织干事、保卫干事、宣教干事等等。县长王志远、公安局局长王勤、交通科长耿亚堂也都牺牲了。而县委书记王进学则被子弹从眼里打入，从耳朵里钻出，当时已死了过去，后经当地群众抢救苏醒过来，结果一只眼睛瞎了，一只耳朵聋了。

此事反映到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那里，针对领导机关内的不同意见，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来到蠡县。经过实地的调查，他完全肯定了地道的作用，并向冀中区党委做了汇报，由区党委下文件在全区推广，因而在整个冀中平原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地道战。

然而王夫的境遇并没有改变，此时他来到延

安中央党校学习，没有人向他说起地道的事。此后又有一些冀中的同志来到延安学习和参加“七大”，听他们议论说：中共中央把冀中的工作誉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向中央汇报的结论都是“哪个地区地道斗争开展得好，哪个地区的形势就好转得快。”甚至还有曾在冀中任过领导的同志争功的现象。王夫听了之后，不禁在脑子里直打转：不是说地道斗争是“右倾”、是“退却主义”吗？

在此期间，一个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团听说冀中地区这个消息后，对周恩来说：“你们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到这种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复杂程度国际上不知道，你们宣传不出去。从世界各国的古代历史上说还未有过。当前世界上只有苏俄战场上苏后方游击队有地下活动，但因他们武器等条件优越，所以地下活动没有这样复杂。”周恩来听了，说：“我们的根据地被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着，向外宣传也是很困难的。”美国记者说：“我们替你们宣传出去。”几天后，《解放日报》上刊出了美记者这篇文章，标题是《两个冀中》，主要意思是说一个“地上”冀中，一个“地下”冀中。王夫当时看了这份报纸，对其中的一些提法还认为不那么切合实际。

地道斗争的事一下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有意思的是，当初反对地道的刘亚球也来到延安，而且是冀中地区的负责人。党中央找到他问冀中地道斗争是怎么回事时，他说不上来，于是到党校二部找到王夫。据王夫的回忆：

刘亚球找我说：“你了解蠡县地道斗争情况吗？”我回答说：“我当然了解，是我亲自干过的事情吗？”刘说：“你能写出了吗？”（因我平时生活作风有些工农干部模样，也是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大老粗）我又带点讽刺的意味回答说：“我是师范毕业，能写出来的啊！”刘说：“那么你就把蠡县地道斗争的发展过程和各有关方面的情况都写出来吧！党中央要这方面的材料。”这时刘也带着有骄味的口气接着对我说：“冀中本来是个大平原，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仅次于法西斯德国希特勒最凶残的帝国主义，不知为什么竟然从冀中主动向外撤退起来？听到最近从冀中来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日伪对我们的地道没法对付了，因而撤退起来。好，你快写出来交给我。”说完刘亚球同志就回党

校一部去了。

接受这个任务后，王夫就将蠡县地道斗争的情况写成材料。稿子完成后，分别送给了在延安的冀中同志，其中包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吕正操于1944年7月18日还曾回信说：“王夫同志：地道斗争材料已看过，无甚修改意见……”最后将材料交给了刘亚球。

刘亚球看了这个材料后又到党校二部找王夫，表示对地道斗争认识有错误，并说：“我看了你写的这个材料，给我解决了一个问题，以前，我看到列宁著的书时，曾看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谁要是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谁就要碰钉子，甚至碰得头破血流。’我对这句话理解不了，看了你写的这个材料解决了。地道斗争这件事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其实，当王夫被撤职之后，刘亚球曾带着一个工作团到蠡县检查王夫的工作。刘随着新县委机关刚到蠡县境内的六区，就被敌人快速部队包围了，他由两个保卫干部保护着一直跑到当时冀中地区环境最好的安平县，才回到了区党委机关，险些被敌人活捉了去。当刘回到区党委机关后，王夫去征求他对蠡县工作的批评意见。刘不提地道斗争一个字，只是说：“蠡县地区敌我斗争非常尖锐，如果不是蠡县的党和群众基础好，早就被敌人搞垮台了。”随后就发生的“齐家庄惨案”，所以刘亚球说出“给我解决了一个问题”。

地道战确实是在一系列血的教训中被承认并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术思想。

王夫写的这份材料，刘亚球看后就交给了党中央研究室，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

可是后来在地道战的宣传上却很少提及这段“负面”的历史，这对全面研究抗战无疑是一种弊端。抗战不仅是“打鬼子”，还有“被鬼子打”，这才是历史。

清苑县计划在冉庄搞一个地道博物馆，地道战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宏大的规划。既然提到地道战，就不能囿于冉庄，而应站在整个冀中的高度，这样才能全面看到地道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 萧 徐）

张作霖与溥仪交往秘闻

○ 康艳华

曾几何时，他们一个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大清皇帝，一个是仰之鼻息、食其俸禄的小统领。事事无常，瞬息万变，未及几年，二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一跃成为手握重兵、权倾四野的风云人物，一个却失去江山、只剩下一个“末代皇帝”的空头衔。他们就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末代皇帝溥仪。本应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却演绎了一段你来我往、相互利用的历史短剧。

蒙龙恩，受封赏

早在张作霖千方百计接受清廷招抚起，便注定要与清廷皇室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而且张作霖内心是应该感谢行将末路的清王朝的，尽管该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却让出身低微的张作霖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接受招抚之后，张作霖便以清廷的忠实子民自居，先是剿胡匪，后是剿蒙匪，出生入死换取了清统治者的奖赏与重用。由此也有了他与刚刚登基的小皇帝溥仪的初次接轨。小皇帝溥仪赏赐张作霖顶戴花翎，并以总兵记名，擢升为洮南镇守使。此外，溥仪还赏赐给张作霖龙袍一件，可见对其的肯定与重视。

辛亥革命之际，张作霖果断决策，保卫清廷，镇压革命。心机颇重的张作霖此时并非真心维护那个从未蒙面的年幼小皇帝，仅是将此作为他政治上崛起的一次有利契机。但此举却让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感激涕零，小皇帝也再次对这位忠实护主的勇士进行破格升赏，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并再次赏戴花翎。

一心热衷于升发的张作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封赏，不禁受宠若惊，马上以“社稷之臣”的身份，联合冯德麟、马龙潭、吴俊升等三十三名武

将，给当时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拍电，表示要武装勤王。其电文说：“革命军酿成民乱，无视君主，徒逞其私利私愤，其行为殆与盗贼无异。朝廷只汲汲于大局之和平，虽有议和之议，但如斯缺乏诚意之和平，殊无讲求之必要，吾人所可取之途径，惟有武力而已。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誓当剿灭革命军，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不知其时的小皇帝是否懂事，如己懂事，恐怕也会被张作霖的“耿耿忠心”所感动。

不仅如此，当直隶张环芝来电约张作霖带兵进关“勤王”时，他“即电复允许，拟即自带巡防队数营赴直联合各军与民军交战”，只是由于赵尔巽认为他在“保安会甚孚众望，恐一日离省人心浮动，故特挽留”，因而未能前往。否则，张作霖其时便有机会挺进关内！

但张作霖的出兵并不能挽腐朽的清廷于倾倒，历史的车轮很快便进入了民国时期。

“隔岸观火”，张作霖“借刀杀人”

溥仪虽退位了，但很多清室遗民不忍清廷走向终结，故一直积极地进行复辟活动。曾沐浴着“浩荡皇恩”而爬上高官显位的张勋便是清廷的坚守者。纵观全国上下，张勋认为已升任为奉天省长的张作霖手握重兵，最主要是他曾深感张作霖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乃派人进行联络。张作霖欣然同意，并派代表副官长赵锡嘏参加了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策划复辟会议。由于在各省军阀中，“尤以张作霖与皖省长倪嗣冲赞成最力”，其代表赵锡嘏于徐州也备受优待。

这时，张作霖的谋士袁金铠为他出谋划策：“冯德麟因你升为督军，时有不平之色。莫若令其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诩之功，不

成以冯当之，卧榻前免去他人酣睡，亦调虎离山之计也。”张作霖对袁金铠的进言，“深以为然”。权衡利弊，不久前还举双手赞成的张作霖马上转为“高骑墙头”，“暂行观望”。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13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率“辫子军”北上，敲响了复辟的锣鼓，并于7月1日拥立溥仪为帝，重登宝座。顿时北京街头又高悬起清代黄龙旗，不少人又披上假辫，袍褂加身。紫禁城内重新热闹起来，并大加封官许愿，张作霖亦在其列：“任命执事为奉天巡抚，速向朝廷呈献贺表，并用宣统年号。”

张勋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丑剧上演后，立即引起全国的一片声讨。张勋走投无路，乃同王士珍、陈宝琛等人商讨救急之策。他们一下就想起了奉天重兵在握的张作霖，于是马上拟旨，封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几天前还只授张作霖为奉天巡抚，如今用得上了，马上以高官相诱。写完上谕得加盖皇上的“法天立道”御宝才能生效啊，偏偏印盒钥匙在载沣手里。陈宝琛下令：砸锁取印。并命在北京参加复辟的奉军旅长张海鹏火速出关送信，请张作霖派兵救驾。张海鹏受命后便“化装从小路绕道热河一带逃回关外”。岂料，刚出京就被讨逆军截获，圣旨离张作霖还远着呢。

其实，即使圣旨如期送到，审时度势的张作霖也不会再来救驾的。聪明如他，怎会担着与全国人为敌的风险为处于逆势的清廷张目。一见风头不对，张作霖马上命令其前往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嘏，晋谒段总理，”表示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段祺瑞听了大喜：“不料张雨亭，他还赞成民国。”就这样，张作霖摇身一变，又成了反对复辟的“进步人士”了。

在这场复辟丑剧中，溥仪下台，张勋出走。一直观望的张作霖却趁机扳倒冯德麟，驱逐孟恩远，向着他东北王的宝座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大赢家。

暗中交往，引来复辟之说

复辟失败后，紫禁城里的小皇帝和他的忠臣们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复辟活动。吸取教训，他们认识到：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

还是那些握有重兵的军阀们。

于是，溥仪开始在众多的军阀中物色他的支持者，首先他就选择了奉系军阀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张作霖之所以入选，其一，他是手中握有重兵的权势人物；其二，他对清廷有着一种莫名的“尊崇”，属可拉拢之人；其三，就在于他所统治的地区，是大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王室在那里还附有大批土地、皇产及庄园。对此，溥仪也曾承认说：“我记得这年（1919年）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阅使。”

对徒有虚名的溥仪抛来的橄榄枝，此时已登上东北王宝座的张作霖并没有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宣统皇帝虽然只剩下一个空名了，但其在满蒙地区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借助他“宣统皇帝”的名号增加自己统治上的光彩，为进一步夺取满蒙造势。就这样，两个各有所图的人开始了若即若离的交往。

1919年，紫禁城突然收到一笔巨款，溥仪的父亲载沣打开一看，原来是奉天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那时候紫禁城的开销全靠民国政府的施舍，或偷偷盗卖文物国宝度日，现在意外地收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自然对“总策划”张作霖感激不尽。随后，由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载沣的名义，派三品专差唐铭盛于10月前往奉天向张作霖面谢。来而不往非礼也，张作霖特派兄弟张景惠携带礼物，随唐铭盛赴京答谢。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人的交往很快为嗅觉灵敏的外文报纸所捕获，于是在这一年的报道中诸如“张作霖正策划恢复帝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秋季，使那位年轻的皇帝在沈阳重登皇位”等相关报道渐次出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9月9日，天津的《华北每日邮电》报，发了一篇题为《另一场复辟是否近在眼前？》的报道。到12月27日，《北京导报》更是直接披露：“最近几天，在当地的各个阶层中，尤其是在张作霖将军手下的军人中，盛传一种传闻，声称清朝的君主制度不久将在北京重新建立，以取代现存所谓的中国共和制政府……此次发起重建君主制的，是张作

霖将军。”对于这些报道，溥仪甚感兴奋：“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对紫禁城那样热诚”。看到希望的溥仪更加紧了与张作霖的往来。

充当小皇帝的保护神

面对外界的传闻，张作霖是置若罔闻，于次年的4月17日，再次托人给溥仪进呈了两棵东北人参。

此外，张作霖还于危难之际充当小皇帝的“保护神”。1920年7月12日，直皖战争爆发。14日，张作霖就派人入宫向溥仪通报军情，并一再声明要“巩固皇室”，宽溥仪的心。此举再次博得了小皇帝的好感。直奉战胜，紫禁城内得知张作霖马上就要进京，异常兴奋，马上派出内务府大臣绍英前去迎接。当听说张作霖要入紫禁城内给“圣上请安”，整个紫禁城都为之沸腾了。甚至为了迎接张作霖并给他准备赐品，溥仪的近亲重臣们还特意到醇王府开了个小会，最后决定应加大对张作霖的赏赐力度，要在“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口宝刀”，对张作霖的礼遇有加可见一斑。但事务繁忙的张作霖并没有进见溥仪，这让精心准备的紫禁城大为失望。

质问黎元洪，澄清复辟之说

奉系的各大将领与那些王公大臣们，也是打得火热，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打牌、吃饭……甚至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还和奉系将领、张作霖的把兄弟张景惠结拜兄弟。奉系将领张景惠、张宗昌还被授以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此前的复辟之说更是传得满城风雨。

1921年春，寓居天津英租界的前总统黎元洪，在寓所接待《字林西报》驻北京特派员记者甘露德，就时局问题发表了谈话；事后，甘露德撰文



张作霖



天津时期的溥仪

发表于3月14日的《字林西报》上。文中指出：“据称，复辟帝制的计划已实行至这样的程度，那位满洲独裁者（张作霖）在中国各地的军界伙伴中的许多人都知道，在6月之前，一定会发生一场支持清帝的公众示威活动。而且，这场示威在任何一天都可能爆发。”

之前的复辟之说并无根据，只是人们捕风捉影的猜测，所以张作霖也没有放在心上，但这一次不同了。因为这一消息是出于前总统黎元洪之口，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煽动性。张作霖对黎元洪如此信口开河怒不可遏，马上拍电质问黎元洪。已是江河末日的黎元洪，哪里敢招惹这位日益显赫的东北王啊，立即回电，矢口否认，“鄙人无此言论，详情已于天津《益世报》登载，声明无此事实。现将该报另信寄。希阅。”除此之外，张作霖还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进行辟谣：“作霖以爱国为天职，凡有破坏我共和政体者，将挺身而击之。”事实上，深谙政治的张作霖也不会逆历史潮流而上，为无权无势的落魄皇帝而丢了大好前途。

投桃报李，礼尚往来

但是该利用还得利用。因此，在复辟之说渐渐平息之后，张作霖还是不会拒绝与溥仪的往来

的。而溥仪也仍将其视为重登帝位的希望所在，两人之间来往不断。

1922年3月，张作霖做寿，溥仪特备两份厚礼送去。第一份是寿幛一轴、如意一柄、第二份是墨两匣、砚两方、宣统五彩瓷盘两件、三镶玉如意一柄、库缎衣料四件。

1922年12月1日，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盛典，张作霖马上派人送去大洋一万元“恭贺新禧”。

1923年初，张作霖嫁女，溥仪差人备了两份厚礼：一份是给“张巡阅使”的，三镶白玉如意成匣，大卷绮霞缎八端，绿绣喜字中堂成轴，绿绣红缎喜联成对；另一份给新娘的是：细绣喜字中堂一轴，细绣喜对一副，化妆品两匣，衣料八件。

到了3月28日张作霖生辰，溥仪又送了一份大礼，并命人在大红礼单上写道：张总司令2月12日生辰，宣统皇帝致赠：福寿条一件、寿画一轴、如意一柄、五彩瓷瓶一对、洋烟一匣、衣料四件。

随着奉军实力大增，溥仪感到张作霖已有雄霸关内的实力，乃于1924年张作霖寿辰之际，花了血本送了重礼：无量寿佛一尊、三镶玉如意一柄、五彩九桃瓶一对、五彩双象耳瓶一对、五彩小瓷盘一对、青玉大吉葫芦小插屏一对、打簧洋钟一对、洋烟一匣、红雕漆圆盒一对、绮霞缎衣料八端。此外，溥仪还于一星期后补送“万古英风”匾额一面，并福寿字及古玩等多件。数量之多、礼品之贵重，在溥仪的“送礼史”上恐怕也属罕见。

密见庄士敦，图谋恢复皇帝特权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撵出紫禁城，并把他的软禁在醇王府内。得知此消息的张作霖很是愤怒，并马上进行斡旋。很快，驻守醇王府的国民军日渐撤离，门禁放宽，醇王府又呈现出“一种暂时的小康状态”。等到张作霖一进京，他立刻撤换王府的大门卫队，解除监视，并派人慰问溥仪。

此次入京的张作霖，俨然是北京城内说一不二的人物。如果他愿意帮助溥仪恢复皇帝尊号，返回清宫居住，按其权力来说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东三省世荣等名流五十人联合致电张作霖，

要求“恢复原有优待皇室条件，以昭大信而服中外之人心”。

11月26日，张作霖派密使约小皇帝身边的红人庄士敦与张文治到帅府一叙。庄士敦马上与溥仪商量，张大帅有请，必有要事啊，哪有空手去的道理。溥仪想了想，让庄士敦带了两样东西交给张作霖：一张由溥仪亲手签名的照片，另一样则是一只镶满钻石的黄玉戒指。但是张作霖只收了照片。张作霖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小朝廷来的客人。然后与庄士敦单独密谈了数小时。当庄士敦把皇上的礼物拿出来，送给张作霖时，张拿着那帧照片，端详很久并沉思着。最后决定：收下照片，退回戒指。

庄士敦与张作霖的这次密谈，带给溥仪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张作霖承诺将设法“帮助皇上并挽回残局”，恢复皇帝的特权。但要特别小心，不要因此“引起共和派猜疑”，以免复辟君主制度之嫌。

得到张作霖承诺的溥仪马上命罗振玉写了一份《赐张作霖诏》：“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濒临绝境的溥仪“小朝廷”，由于张作霖的鼎力相救，不仅得以绝路逢生，而且重燃复辟之希望。

但是，沉浸在美梦当中的小皇帝很快发现，张作霖不过是“空言示好”，却并无实际行动。于是，溥仪潜往日本使馆，这就是所谓的“真龙起飞”事件。

得知溥仪出走的消息，张作霖大发雷霆：我已经主动向你示好，并承诺对你予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你悄悄跑到日本领事馆，这不是信不过我张作霖吗？

张作霖的这种不满，在再次会见庄士敦时得以宣泄。庄士敦受到了与第一次拜访时大相径庭的待遇。站在庄士敦面前的张作霖，已经“不再是一位温和、富于同情心、温文尔雅的中国将领，而是一个傲慢、举止粗鲁、暴躁的满洲土匪”。看到庄士敦进来，张作霖没有任何客套话，“他一开口就因把皇上带到使馆区而对他大加斥责”。庄刚想解释，张作霖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并厉声质问：“只要我张作霖在北京，难道还会在醇亲王府发生损害皇帝的事情吗？”

天津再见，张作霖幡然下跪

1925年2月后，溥仪转居天津，住进日本租界地内的张园。从此，天津的张园，成为保皇复辟派的老窝。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溥仪到天津时，正值奉系打败曹、吴占据天津，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志得意满的张作霖再次联系溥仪，先是由奉系将领、直隶督办李景林以地方官的身份拜访了溥仪，以示友好；又派亲信阎泽溥通过荣源（溥仪的岳父）给溥仪送了十万元钱，以解其经济拮据之苦，同时提出希望能在行馆里和溥仪见上一面。这一提议却遭到迂腐的清廷遗老们的坚决反对：至高无上的皇帝那有屈尊去见一个民国将领之理？

没想到张作霖锲而不舍，第二天派阎泽溥亲自登门约请，并说张作霖正在住所等着他呢。溥仪力排众议，趁天黑之际前往曹家花园密见张作霖。

来到曹家花园，溥仪正往里走之际，身着便装的张作霖便快步迎了上来。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溥仪马上认出了他。正在溥仪为用什么样的仪式对待这个民国大人物而犯难的时候，张作霖却毫不迟疑地走到小皇帝的面前，趴在地上就磕了一个响头，毕恭毕敬地问道：“皇上好！”溥仪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给他磕头，受宠若惊之余，赶紧弯腰扶起张作霖，连说：“上将军好！”两声不协调的问候，道出了当时的滑稽。两人肩并肩地步入客厅坐下，亲热地攀谈起来。张作霖先是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那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国宝文物的，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要弄去，一体保护。溥仪对张夸奖一番，感谢他对祖宗宫庙山陵的费心保护。

话题一转，张作霖就有些见怪地对溥仪直言说：皇上，你不该在我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往日

本使馆里跑，我是有足够力量保护你的。溥仪忙解释说：当时冯玉祥军队还在，我实是不得已才进日本使馆的。听溥仪这么一说，张作霖马上接道：“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溥仪最爱听这样的话，他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张作霖又表态说：皇上以后缺什么，尽管吱声。

谈话结束，张作霖亲自将溥仪送到门口。这时，他看见一个日本便衣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不用问，肯定是来监视溥仪的。张作霖乃故意大声说道：“要是日本小鬼子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溥仪作文字诗

1926年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派人取回藏于景山寿皇殿的数十轴清朝皇帝和皇后画像等珍贵文物，溥仪就此事向安国军总司令告了故宫博物院一状，说他们锯锁闾宫抢劫大清列祖列宗的“圣容”。张作霖当即“严电”北京卫戍总司令于珍和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拿办”，继而又派兵护送“圣容”安全运津，令溥仪十分感激。

张作霖虽然尊崇溥仪，但他最终是以利己为原则，不会甘心在“宣统皇帝”脚下称臣。溥仪最终也看清了这一点，还写了一段题为《张作霖记事一件》的文字游戏：“张大元帅作霖祭天于天坛之祈年殿；大元帅行誓师典礼于天安门，宣告讨伐共产军；大元帅受各将领觐贺大典于太和殿；大元帅移蹕宫禁；大元帅升乾清宫御座受外国公使之入贺；大元帅以养心殿为行辕；大元帅受玺于文泰殿。”此后，溥仪已不把全部希望完全放在张作霖身上了，而以大量古玩和现款直接笼络张作霖的部将，如张宗昌、许兰洲、李景林、马占山等人。

但张作霖毕竟对溥仪是有过帮助的，因而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殒命身亡后，溥仪还特意派人送去“御笔挽幛”，以尽悼念之意。■

（作者为辽宁张氏帅府博物馆馆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4日

我不久前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回来，看到人家解放后，一心一意建设了三十多年，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硬性地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把我们国家搞成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同南、罗不能比，更不能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作为中国人，作为共产党员，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吃香，国家这样落后，实在使人痛心，想起来都要掉眼泪。对于这一切，毛主席要不要负责？都说成是刘少奇的过错，太不公平。至少这十年和刘少奇没有关系。我同意90号简报上李洪林同志的发言。我同意小平同志的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确切地理解这句话，是说没有毛主席就不能在一九四九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即使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也迟早是要胜利的。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付出的代价很高。希望今后在建设时期少付一些代价。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所付的代价比任何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

家都高，甚至超过了苏联。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不能损害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同样，一九五八年以后他的极“左”思想和错误也是抹煞不了的。不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账搞清楚，我们就不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前进。正如为了更好地往前走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来的路一样。我们要为第三世界作出榜样，希望将来他们革命时，不要再产生第二个波尔布特。主席曾经说过，西欧国家和美国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呢？是因为那里生活太好了。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与“越穷越革命”的理论有关系。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之所以不起来革命，我看是因为苏联、中国的榜样不好。搞阶级斗争死那么多人，生活水平那么低，生产发展不如人家，你比下去了嘛。（林韦同志插话：在我们这里革命本身就是目的，人民生活的提高倒不是目的。）

主席的话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原来就讲错了。比如，毛主席关于理论

（上接94页）保护的制度化力量，导致很多人受到伤害甚至因此蒙难，改革开放之后，痛定思痛，重建法制，但离真正的法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追究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发现还是人身权、财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由于财产权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强行侵占、剥夺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时有发生，已引发社会的深重担忧和强烈不满；许多人对财产安全不放心，将财产转移海外，造成资产大量外流；城市居民房屋被拆迁、农村居民土地被征用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自焚、流血的悲剧因此不断上演。在人身安全方面，尽管2003年的孙志刚案促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但近年因媒体披露而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在派出所、看守所、收容所遭遇“非正常死

亡”的死法还是触目惊心，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洗脸死、摔跤死、喝水死、骷髅死、针刺死、激动死、鞋带自缢死等等耸人听闻的名目，这些实际上都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体现。归结起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是公民权利没有保障而引起的。

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遵循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扩展民众的权利，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经验或模式；而解决当前社会存留的问题，中国也要回归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通过保障和扩展民众的权利使社会得以良序发展。

问题的指示说，我们现在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这和旧社会差不多。我们知道，经济学上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等等范畴，说的都是生产关系。怎能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差不多呢？这话如果是我孙冶方或任何别的人说了，岂不要被打成大右派吗？

又比如毛主席说：要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哪有与政治无关的思想（指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哪有没有思想的政治？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怎么能分清呢？我们的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始终没有执行。就从反右说起，最右的右派无非是主张“轮流执政”，既然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人家可以这样讲嘛。我们也可以批嘛。反右的结果是人们不敢讲话、不能讲话，不讲话怎么能分清是非呢？主席听不到大家的话，再加上个康生“判决”，事情就搞坏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在于要分清是思想、言论问题还是违法乱纪的问题。言论自由要保护，违法要依法处理。我这样讲大概是会惹人的。听说张耀祠说，他不“心慈手软”，我也不怕再进秦城。顺便说，康生的问题，我也还是要揭的。据说汪东兴在中办说过，谁再讲康生问题，要关起来。如果还是要他当家，我难免再被关进去。

又比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是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的，怎么说得通呢？实际上这个话并没有错，我记得斯大林就这样讲过。（林韦同志插话：列宁讲过近似的意思。）当然斯大林讲得不完全，计划、管理方法等等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但是既然经过革命，生产关系已经大大改进了，主要的任务就成为发展生产力。主席过去很强调发展经济，特别是毛选第四卷多处讲到取得政权以后就要讲发展生产问题。以后天天讲阶级斗争，和过去的思想是矛盾的。

我很赞成马洪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是真正懂得搞经济建设的。有个柯庆施，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胡搞，但主席很看重他。三年大困难后，陈云同志根据耕畜繁殖的速度等，认为农业的恢复必须有三几年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柯庆施认为陈云的意见右了，保守了。基本建设要缩短战线，打歼灭

战，这是主席自己多次讲的。根据这个意见，经总理亲自审定，下了一些项目，当时主席也是同意的，但是后来主席却出尔反尔，大批“下马风”，实际上矛头是针对总理的。

第二种是原来并没有讲错，但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变成谬误。其中有些东西是主席自己强调过分的。例如，“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运用到建设事业上来大不妥当。物极必反，强调过分，使得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被否定了。

例如“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我还能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的话，我要把这一条写进去。中国落后，没有那么多现代设备，继承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旧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半土半洋，搞许多中小型企业，不能只靠买许多大洋设备，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是需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我们有丰富的劳动资源，小、土企业可以使用那些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工资低些，但是，这个原则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小、土企业不需要高价的设备，可以使用比较简单的不熟练的劳动，工资比较低，当这两个方面节约的开支可以抵消小、土企业不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这个限度以内，是合乎价值规律的，而且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胡闹，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搞“后院炼钢”，后来搞每个省、每个专区都办汽车厂，浪费了多少资金，多少原料！这样，由于强调过分，结果把本来正确的方针、原则否定掉了。

第三种是讲得对，但没有照着做。毛主席过去非常强调理论不要脱离实际。我早就认为，王明那一伙人脱离实际，搞本本主义，成不了大事，早就怀疑中国革命在他们手里能不能胜利。后来听说毛主席来领导非常高兴。四十年代整风时，我在新四军听到毛主席关于改造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的谈话，认为真是切中王明的要害，对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文化革命这十年，主席是怎么联系实际的呢？例如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这个话讲得很好，从五十年代开始提倡，讲了二十年，结果却是越来越一言堂，而最大的一言堂就是主席自己。他在讲这个很好的话的时候，是针对别人的，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从最上面的一言堂一直贯下去，贯到

省、地、县、社、队。我曾同一个小青年讨论农业问题。我说，第一条要解决社队土皇帝、恶霸的问题，第二条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小青年说，第一条你就办不到，县委就是那样搞，你怎么整得了下面的书记？现在好了，三中全会和工作会议上，华主席作自我批评，不搞一言堂，这就好了。

另外，对一些提法或正在批的一些话，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

如“全面专政”的问题。我看现在没有批到点上。张春桥那些家伙的搞法，主要是把专政的对象搞错了，把专政的方法搞错了。关键不在于“全面”二字，无产阶级专政，是讲政权的阶级性质。这个政权应该管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教、科、工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在内，不能留有真空地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四人帮”的封建行帮的法西斯专政。难道在这些领域，我们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吗？或者这些领域不搞什么专政，是空白的吗？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搞法。举个例子。马克思在英国生活很久，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那里写成并公开发表的，他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国际，参加工人运动，还在海德公园骂过英国首相。但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抄他的家。这能说英国资产阶级没有对马克思实行专政吗？当然不是。人家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手中没有真理，还能用这样的方法专政。而我们是怎样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呢？我看毛主席的话，有的说得不对。什么“不准乱说乱动”，为什么不能人家说话呢？乱动看怎么个动法，不违犯国法，为什么不能动呢？我们把“专政”的面搞得太大，以至于“专”到了党内来。好像拧螺丝，越拧越紧，大家都动弹不得。弄得不得人心了。毛主席把英国首相对马克思没有用的办法都用到党内来了。难道我们掌握的真理比当年英国首相还少吗？不是嘛，是把专政的对象和方法搞错了。

又如“继续革命”的提法。乔木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提出了疑义。我觉得那个提法本身并没有错。毛主席讲过，好像列宁也讲过，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说继续革命是继续夺取政权，那是“四人帮”的解释。要继续革命就是要保卫已经夺到手的政权，防止复辟，要不断改进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尤其要大搞技术革命，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证明这话

没有错。如果我们不抓“四人帮”，复辟就是眼前了。抓“四人帮”就是一场革命。现在还有“帮四人”，还跟着康生的阴魂转。不继续革命行吗？

还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提法。“整个”、“始终”四个字肯定错了。不然，那就是在到社会主义建成时，一觉醒来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没有阶级斗争了。（林韦等同志插话：毛主席有一句话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种话是没有经过思考说出的。）据说“始终”二字是别人加上去的，但既然“整个”，那也就始终了。社会主义阶段肯定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是谁对谁斗、怎样斗法。

再如“现代迷信”的问题。有的同志讲，现代迷信是林彪搞起来的，我看是把林彪的身份抬高了。文化革命前，我们党内的迷信就盛行了，包括我在内，我对毛主席的信服实际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追根溯源，现代迷信是斯大林搞起来的，毛主席喜欢它，接过来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是有份的。（林韦同志插话：五八年刘少奇还讲过，我们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呢？）现代迷信、一言堂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现在要纠正过来。

我还有一个看法，毛主席维护斯大林的招牌，怕“丢刀子”，就是维护他自己；维护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维护对他自己的迷信。文化革命中江青讲过：七千人大会那口气，直到现在总算出了。我看这话是代表毛主席说的。当年江青她算老几。实际上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承担责任，那是硬吞咽的一口气。我看对斯大林、毛主席都是要一分为二的。至于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几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的不能丢掉，不对的就是要抛弃。

日本人没有“批评”一语，西欧文字中，“批判”、“批评”是一个词。用“批判”一语比用“批评”更好些。问题在于多少年来，我们把“批判”的原意糟蹋了，一提批判就是斗争，不许答辩，“不准乱说乱动”，比法院的判决还厉害。判决还允许上诉，可是被批判了就只许检讨，不许答辩了。要给“批判”恢复名誉。以上我的一些看法，欢迎同志们批判，我只要求允许反批判。同志们批判对了，我感谢。■

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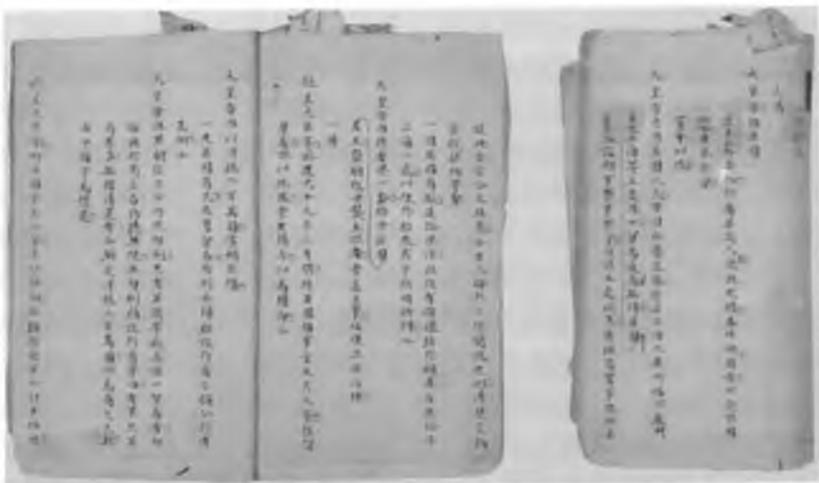
○ 洪振快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探求强国御侮之道、重塑民族尊严的历史。为此，中国人遭受许多挫折，走过不少弯路，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学费。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国运兴衰、民族荣辱的规律，其实就隐藏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或称第一款）中。

一、《南京条约》第一条：被忽视的重要条款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双方在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签署停战协议，史称《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13条。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南京条约》是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见证。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南京条约》也有其复杂性。比如其第一条，中文本是这样表述的：“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这就是一条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条款。一般人未必看过《南京条约》原文，自然不可能引起重视，而专业的研究，如一部以65万字的宏大篇幅“对《南京条约》及附约的每一款项的来龙去脉进行逐次的考辨”的专著——《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一书（郭卫东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这一条也仅有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南京条约》第一



《南京条约》抄本（局部）

款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然而，这一条难道真的仅仅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吗？

以笔者愚见，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这一条款实际上隐藏着国运兴衰的规律，深刻领悟了这一条的内容，也就破解了国运兴衰的大秘密。历史曾经给了我们提示，却因为我们缺乏悟性而错过了机遇。

从表面上看，这一条款的前面部分——所谓的“永存和平”、“彼此友睦”只是套话，它看起来确实像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但是，它的后半部分“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却不简单。何谓“身家全安”？《南京条约》中文本的表述是模糊的。英文本《南京条约》第一条全文如下：

ARTICLE I. 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

中文本的“身家全安”，在英文本中是“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句英文的意思，是说人身 (persons) 和财产 (property) 要得到完全 (full) 的安全 (security) 和保护 (protection)。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原来，它的意思是人身权 (本文中所说的人身权主要是指人身安全的权利) 和财产权要受到保护，而且这一点要由政府承诺并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一条的要义是，英国公民在中国，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样，中国公民在英国，英国政府也承诺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

英国人将这样的内容列入《南京条约》第一条，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这一点，而这在英国方面早在 1840 年 2 月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确并确定下来了。1840 年 2 月 20 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侵华英军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与义律的训令的第 3 号附件——《对华条约草案》中是这样表述的：“第一条 自今以往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陛下以及两方臣民之间和平敦睦，两方臣民各在对方疆土之内得享人身、财产之完全的保障与维护……”（《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60 年 8 月版，第 135 页）除去中文翻译的表述差异，《对华条约草案》这一条与《南京条约》第一条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由此可见，英国方面对这一条是如何看重，是一定要在条约的第一条加以强调的。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却对这一条的深刻内涵完全没有领会。以钦差大臣耆英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将之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的原因，而负责翻译的人也根本不可能领会那几个看似简单的英文单词后面隐藏的重大历史奥秘。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国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 169 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

二、人身权和财产权：现代文明的根基

英国人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南京条约》第一条，典型地反映了英国人的思维，这个思维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一个英国人极其引以为豪的历史传统。

英国对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重视，可以追溯到 1215 年的《自由大宪章》甚至更早一些时候。1215 年 6 月 15 日，一群英格兰贵族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块牧草地上迫使国王约翰在一份包含 63 个条款的文件上盖上王玺（历史学家认为约翰未在《大宪章》上签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会写字，但肯定盖过王玺）。这份被称为《大宪章》的文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甚至可以看做是英国宪政乃至世界各国宪政的母体。当然，仔细追究起来，《大宪章》虽是 1215 年签署的，但它不过是对旧时英格兰国王与贵族权利、义务的重申，因此《大宪章》的思想早已存在。《大宪章》的意义，是以条文的形式将这些权利、义务明确下来，将习惯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而这开启了制度化约束王权的新篇章。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温斯



《大宪章》抄件(局部)

顿·邱吉尔在1936年写道：“这是超乎君王之上，甚至连君王也不可抗拒的一条法律。”学界早有定论，宪政的真谛乃是“限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最关键的是限制最高权力，《大宪章》开启了制度化限制最高权力之门，所以它受到持久而热烈的尊崇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英国作家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将《大宪章》列为“改变世界的12本书”之一，并写有这样一段评论：“《大宪章》所受到的尊崇已经维持了近800年的光阴，且不但在英国，也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想要甩掉暴政、在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立国的其他各国中，奠定了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宪法基础。如果说有一件文书，通过长时间的法律试用和它如神话般强而有力的影响，塑造出一个凡是自由男女尽皆向往的世界，那就是《大宪章》。它所得到的共鸣是超乎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梅尔文·布莱格著：《改变世界的12本书》，中华书局2010年8月版，第46页)

1989年，法国在巴黎举行《人权宣言》颁布20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自豪地说，世界的人权产生在法国。当时有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将在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顾外交礼节，马上站起来说，不对，人权产生在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人权产生在英国，理由是充分的，就是因为英国早在1215年就签订了《大宪章》，确立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两项最重要的人权的地位。而撒切尔夫人此举，更是传神地表现了英国人以《大宪章》为荣的情怀。法国人以《人权宣言》为荣，英国人以《大宪章》为荣，则更凸显世界文明主流的价值观乃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

《大宪章》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是第三十九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做出合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损害。”该条确立了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其他形式的伤害等人身保护权，由此，英国国民的人身权利逐渐被确立起来。

《大宪章》第二十八条规定：“余等之巡察吏

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该条规定对国王及其下属侵夺民财进行了约束，是对财产权的确认。

《大宪章》缚住了英国国王的手脚，在其签署后的数百年间，英国的国王们一再试图抛开这套绳索，而英国的贵族和平民则奋起抗争，一次次迫使英王重申《大宪章》的约定。据统计，在《大宪章》签署后的200年间，历代英王曾44次重申《大宪章》。可以说，英国宪政的发展史，就是英王和贵族、平民围绕着是否遵守《大宪章》而展开的斗争史。

约翰签署《大宪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墨迹未干就拒不执行，好在他次年就去世了。其继任者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因年少而无力与贵族们相抗衡，但其成年后也渴望专制王权，不希望受《大宪章》的约束，因此多次与贵族发生冲突，直至兵戎相见，但最终是贵族的力量占了上风，议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英国议会的发展，是贵族、平民限制王权，特别是征税权的结果。

1628年，英王查理一世要求开征新税，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列数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利的法律，强调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非经依法审判，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和剥夺财产及受到其他损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人，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重申《大宪章》对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保护的规定。查理一世批准了这一请愿书，但无意真正执行它，当议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下令解散议会，议会的抗争引爆了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权利请愿书》的内容得到了重申和确认。经过“光荣革命”，英国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到18世纪王权彻底被限制，不再对议会权力形成挑战，英国宪政趋于成熟。

从13世纪到18世纪，英国从中世纪转型到近现代文明社会。英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就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有力的保护。人身权的保护，使人们避免未经依法审判即被逮

捕、监禁和其他侵害，使生命安全获得保障。财产权的保护，可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独立，也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政府征税权力和财政收支预算的监督和控制在，是人民约束政府权力的有效武器。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根基。

与英国相似，世界各国在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时刻，都选择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七条为“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十七条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剥夺，私有财产只有在为公共利益且经合理补偿方可征用。

三、产权保护：西方兴起的关键

关于财产权的保护，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促成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所在，这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共识。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权利，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的绝对支配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四种基本权利。产权在英文中写为 **property rights**，而 **property** 就是财产，因此产权在核心意义上就是财产权，即“产权是以人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控制和处理财产的权利”。

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好的制度，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而市场经济的效率首先来自明晰的产权安排。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能够消除或减弱不确定性，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因而是最有效率的。

产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激励。一个社会必须刺激个人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才能实现发展。要刺激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必须提供激励。良好界定的产权使人们将各自资产投入市场竞争以追求最大

收益成为可能，对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良好的激励。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其与罗伯斯·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总结近代西方世界兴起时有一个简洁有力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包括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金融体制、财税制度等，其核心是产权保护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就不可能促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近代西方世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强大到拥有对西方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支配力量。

历史实践比理论推演更有说服力。“西方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仅就西欧各国——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来说，其历史命运就很不一样。在近代世界竞争中，英国、荷兰是两个成功的国家，由于“已确立的产权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刺激，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的活动”（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1版，第169页），因而在近代获得成功，荷兰在17世纪是世界头号强国，而18、19世纪则是英国称雄世界。相对来说，法国、西班牙在近代则是两个不成功的国家，情况与英国、荷兰相反。

法国的失败是由议会失去对国王权力的控制引起的。法国在14世纪初也发展出了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是，与英国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不同，法国的“三级会议”后来实际上名存实亡，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其起因，是战争的需要。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法国国王要求“三级会议”允许其征收特别税（交易税、盐税等）。“三级会议”希望尽快取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结束法国的社会动荡，所以同意了法国国王的要求。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但是随着紧急形势的过去，征税权却随着法国国王权力的扩张而被延续下来，脱离了“三级会议”的控制。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三级会议”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但均

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爆发了大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夺回这项权力。

由于法国国王的征税权失控，法国的私人产权不像英国那样受到保护。为了保障税收，法国国王向行会转让某项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因为需要行会以交纳稳定的税金作为回报），行会则试图利用垄断保护地方市场免受外部竞争，其结果是垄断加强，而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抑制，导致贸易受阻、生产性经济活动下降。此外，法国还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享受免税的特权阶层和保守的官僚队伍，他们不仅消耗税收，还成为法国政治结构中的顽固力量，阻碍了社会变革。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西方世界的优势是通过工业革命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法国，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许多人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由技术进步——纺织机器的改良和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推动的，的确，技术进步对工业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作用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需要条件的，这里面不能不提到英国的专利制度。实际上，专利保护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非常大，因为技术发明如果不能被推广则对社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而发明的推广需要企业家的投资，企业家的投资只有在获利机会较大、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要降低风险、增加获利机会，就需要对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使在一定时间内（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为14年）能够通过垄断该技术而获利。工业革命的两项关键性技术，阿克莱特的纺织机专利申请于1769年7月获准，瓦特的蒸汽机专利证书于1784年4月拿到。专利是一种知识产权，是产权的一部分。因此，推动工业革命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技术后面的产权保护制度。

1835年一位英国作家写道：“英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阿克莱特和瓦特的功劳比纳尔逊和威灵顿更大。”纳尔逊指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的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海军上将，他在1805年10月指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战胜法国、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威灵顿指威灵顿公爵（first Duke of Wellington），是他指挥英国陆军在

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这两位都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英国人认为“阿克莱特和瓦特的功劳比纳尔逊和威灵顿更大”，但阿克莱特和瓦特能够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却有赖于包括英国专利制度在内的产权保护制度。

英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依赖于从《大宪章》开始的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宪政制度。英国经过“光荣革命”，“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限制皇权、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最终，“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的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四、中国经验：回归现代文明还是自创新路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839年，中英双方因鸦片问题而产生了碰撞和冲突。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18日发布禁烟文告，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由于鸦片贩子不配合，21日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迫其就范。到25日，大部分烟贩屈服，只有英国人仍然坚持。在林则徐下了最后通牒后，28日他们终于屈服，同意交出鸦片，但拒签保证书。

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完全正当，中国有权这么处理鸦片贩子。林则徐提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也完全合乎大清官方的思维方式和通常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注重程序，是英美普通法的传统。基于“正义需要一个严格的程序来实现”的信条，在英

美法系国家,审判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又严格的程序过程,无论是从法官的选任到陪审团成员的选择,一直到法庭上辩护双方的激烈争辩,都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认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的审判才是正义的。这种观念后面的逻辑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否则政府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任意和武断的,个人的权利无法保障。而“人即正法”,未经合法审判、未定犯罪轻重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看重的程序正义的原则,所以他们不可能按此要求签署保证书。从更深层次去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被剥夺生命,这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从《大宪章》以来就形成的传统。而“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做法明显与之冲突,所以英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做法的。由于英国人拒签保证书,林则徐围困商馆、断绝饮食,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以政府的名义担保,让英商交出鸦片,这又涉及在华英国人的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问题,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

鸦片战争的前因后实颇为复杂,绝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这里姑置不论。我们所需深究的,是英国人将“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一句话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上的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后面的重要历史启示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自强之道,但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中最大的认识偏差就是看重“船坚炮利”之类的科学技术,而对制度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制度建设要以保障和促进个人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为旨归缺乏认识。

如果以汤因比的文明观来看,晚清以来的自强运动,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是追求器物层的现代化;甲午战争失败促使反思,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追求制度层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追求国民精神层的现代化。五四以后的中国一度迷失,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提“四个现代化”,但显然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仍是偏重于器物层的现代化,对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现代化重视不够;在制度层的现代化方面,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促成了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仍有许多路要

走。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的萌生、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民众权利的扩展。英国的政治权力,从大趋势看,自1215年以后,逐渐从国王手中转到议会手中;议会有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之分,通过议会改革,政治权力逐渐从上院转移到下院。在选举权方面,从一小部分人享有选举权,到逐步放宽选民的财产限制,到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到妇女享有选举权,直到18岁即享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可以看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演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逐渐下移,或者说政治权力逐渐由民众掌握、民众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终极的体现是普通民众权利的扩展。民众权利的扩展是社会良序发展的根基,如果历史发展有规律,那么这可以说是第一规律。凡是循此规律者,社会必会健康发展;与此规律背道而行,社会发展必遭挫折。

观察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验证这一规律。60年分成了较明显的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世界文明发展经验——社会进步首先要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表述,这至少说明那时是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私有财产权逐渐被剥夺,及至养一二只鸡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包括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可以设想,如果私有财产权不被剥夺,这样的惨剧是不可能发生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其基本经验就是重新回到承认和尊重产权的道路上来,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到2004年修宪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到2007年通过《物权法》,中国经济成长中的健康因素,无不与产权保护密切相关。历史经验早已昭示,市场经济的成熟要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不保护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公民人身权利方面,前30年由于没有公民人身权利(下转86页)



个人
出书
历史
见证

两千元起编辑出版：回忆录、自传、个人文集！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家谱：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二千元起，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家族
出书
文化
传承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史传记、家谱族谱！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相关说明：1、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 2、出版附赠光盘，需要整理文稿、专题创作或录音摄像的另行协商。
- 3、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咨询赠送样书。

服务热线：010—68920114 68920399

编辑接待：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文化步行街25号（大明岛眼镜城）三楼

出版展示：海淀图书城64号（雪芦书画社）二楼大厅 邮编：100080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zsc.com）家族出书网（www.jzsc.net）

长途免费电话
400 633 2311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代理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策划宣传推广 录入排版设计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印刷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s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

2011年2月16日上午，一年一度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京举行，会议由杜导正主持，吴思汇报杂志社情况。关心杂志社的老朋友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对进一步办好《炎黄春秋》提出了希望和建议。出席联谊会的来宾有（按姓氏笔划排列）：

| | | | | | | |
|-----|-----|-----|-----|-----|-----|-----|
| 丁东 | 马立诚 | 马仲廉 | 马英华 | 王才 | 王义堂 | 王克明 |
| 王宏志 | 王强华 | 王建勋 | 白介夫 | 冯健 | 刘元生 | 刘仰东 |
| 刘志琴 | 刘苏里 | 朱良 | 庄重 | 毕苑 | 华仲慰 | 齐明昌 |
| 何方 | 何燕凌 | 余焕椿 | 陈大斌 | 季音 | 吴象 | 吴塘 |
| 吴敏 | 张鸣 | 张思之 | 张秋石 | 张素芳 | 张培森 | 张希清 |
| 张惠卿 | 李乔 | 李虹 | 李锐 | 李焱 | 李永忠 | 李世强 |
| 李建华 | 李胜平 | 李树桥 | 李维民 | 杜光 | 杨杰 | 杨天石 |
| 苏双碧 | 沈志华 | 谷秀敏 | 辛子陵 | 邵燕祥 | 屈忠 | 孟醒 |
| 周有光 | 周晓军 | 保育钧 | 姚力文 | 姚监复 | 施亮 | 郝怀明 |
| 赵淮青 | 赵德润 | 钟沛璋 | 郭宇宽 | 袁鹰 | 展江 | 钱行 |
| 顾骧 | 高放 | 秦晖 | 秦肖娜 | 资中筠 | 郭道晖 | 浦志强 |
| 陶斯亮 | 徐汝芳 | 黄钟 | 梁衡 | 崔卫平 | 曹思源 | 章立凡 |
| 章诒和 | 彭迪 | 韩钢 | 鲁諄 | 蒋彦永 | 程建宁 | 雷颐 |
| 詹小洪 | 霍福成 | 戴煌 | 魏久明 | | | |



鲁諄、周有光、李锐、何方、郭道晖、张思之、资中筠、保育钧、魏久明、沈志华、吴象、曹思源、韩钢、张鸣、秦晖、辛子陵、詹小洪等同志先后在会上发了言。杜导正做了总结发言。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鲁諄



周有光



李锐



何方



郭道晖



张思之



资中筠



保育钧



魏久明



沈志华



吴象



曹思源



韩钢



张鸣



秦晖



辛子陵



詹小洪



杜导正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1年第**3**期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

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北京郊区友好公社对外交往琐事

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8.00元